

保尔·朗格朗著

终身教育引论

书籍来源于网络，转载于《喜书公寓》(<http://likebook1314.blog.163.com>)，
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书籍来源于网络，转载于《喜书公寓》(<http://likebook1314.blog.163.com>)，
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社 136—68〕 统一书号：70220.8 定价：0.80 元

终身教育引论

保尔·朗格朗 著

周南照 陈树清 译

王遵仲 校

书籍来源于网络，转载于《喜书公寓》(<http://likebook1314.blog.163.com>)，
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Original Title
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
©UNESCO 1975

责任编辑：张元一
责任校对：黄素芬
封面设计：李志杰

书籍来源：终身教育引论 转载于《喜书公寓》(<http://likebook1314.blog.163.com>)，
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保尔·朗格朗 著

周南照 陈树清 译

王遵仲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4.875 字数：131(千)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统一书号：70220.8 定价：0.80元



被译成十七种文字出版就是证明。当作者看到他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时,尤其感到愉快。在他看来,在社会建设中已经完成并将继续完成重大变革的人民中国,对终身教育观点及其所含的改革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关注是很有意义的。在未来的年代,作者和所有期望教育能有益于每个人个性和谐发展的人们,将倾注最大的努力去研究在成人教育方面能够完成的工作。

保尔·朗格朗

1983年6月于巴黎

新学
PDG

原书序

本书旨在阐述终身教育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意义，说明促使它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力量，探讨它的涵义和内容，指出它对人类整个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将会产生的后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五届大会就国际教育年向其成员国提出的十二个供思考和行动的主题之一，就是终身教育，因此，本书无疑切合国际教育年的内容。

本书作者保尔·朗格朗是成人教育方面的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他一方面自1948年以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成员，另一方面又通过个人的研究工作，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系统阐述都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还积极地致力于使终身教育思想为人们所了解。

书中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目 录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

原书序

前 言

终身教育探索..... 1

第一部分 全面综述.....19

 现代人面临的各种挑战.....21

 起作用的力量.....33

 终身教育的重要意义.....44

 内容、范围和目标.....53

 关于终身教育战略的建议.....65

 集体的事业.....77

 结论.....82

第二部分 论证和实例.....85

 与终身教育相联系的各项目标.....87

 内容和方法..... 100

 特殊情况：正规教育..... 114

 着眼于企业管理的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 123

 石头和人..... 136

 与作者的谈话..... 140

终身教育探索

我们在年方二十的时候，对人生怀有什么样的期望呢？首先，我们总是想度过富有意义的人生，这种人生不仅能带来生活的各种乐趣，而且能为我们提供在知识、情感、艺术和诗歌的道路上永远长进的机会。然而，我们期待于人生的又远不止于此。我们还有志于为创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这种美好，不仅是对我们而言，也是对其他人和对整个人类而言。确实，对人生的这种种希望与渴求又怎么能互相分开呢？因为当世界不少地方还有暴政和恐怖在肆虐的时候，想为自己建立一个安乐窝是既不可取，也难以接受的，这种想法甚至也不现实。下边的历史事实恰恰证明我们是不幸而言中。

那是早在三十年代的事情，文明已经濒于危机，这正好表明：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么多的关于危机的谈论，并非什么新鲜事。

我们曾处于特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我们不能适应一个我们不能接受其目标和准则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某种方式来避免出现更坏的情况，也就是不能让种族偏见和其他不合乎理性的东西获得胜利，不能回到野蛮状态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决不能在即将来临的决战面前袖手旁观。

我们在改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和条件方面所用的手段无疑是政治性的（对许多人来说全盘都是政治性的）。我们从权力、更具体地说是从关于权力的假想来考虑形势和问题。既然在一个盛行特权和到处混乱的过时社会中，障碍存在于其组织体制和机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社会。

在那个时代，人们想象只要能改变制度和机构，改变政府的性质，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坏人将被驱逐，无能的将被撤换；善良和诚实的人们将扬眉吐气，彻底根治腐败，并以良心和忠诚来治理共和国；正义将凭借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关系在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居统治地位。

经验和对那个时期的回顾很快就引导我们以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确，我们之中没有谁怀疑过、或者能够怀疑政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和基本作用。它提供了战胜反对派的力量和手段，而当我们回顾现代文明所取得的最重大、最有价值的进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们并非智慧和理性的结果，而是由于各种政治利益和野心、各种要求和反抗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的结果。

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外界影响下很快改变了考虑问题的途径。虽然他们继续承认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中各种力量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他们又不得不在展望如何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的问题时考虑到一些其他的因素。他们观点的变化在于对教育的认识，更具体地说，就是对成人教育的认识。

我们也许都能同情这种观点的变化。政治行动要求简洁明确，它避免微妙的差别，也不赞成模棱两可，要达到的目标总是一清二楚地摆在那里，而人们就根据不同的目标决定支持谁和反对谁，决定自己的敌友和好坏。这种状况也许是必要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然的。许多人，也许是人类中的大部分人，都对这种分野处之泰然，但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不能不意识到人类本性的复杂性，意识到那许许多多的矛盾，意识到深入每个人（不管他是站在哪一边）个性中的理智和愚蠢、慷慨和自私的混合。战斗的召唤可以迫使我们暂时忘却自己的真实感情，但是，一有机会，这些感情就会带着它们原有的力量重新出现。

也许正是由于我们有这种对人类情况的差别和普遍性作出反应的特质，我们才能逐步地为自己确立政治斗争目标以外的目

标。让我们把这叫作对长远利益的关心。不管一个人的生命如何短暂，它总是由无数的事件所构成，总是要经过许多的阶段。它总是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我们不相信人一生的雄心大志可以压缩为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不管这一目标有多么崇高和宏伟。

最后再说一下人们的不同气质、思想和观点。有些人集中注意人类现象的集体性方面，他们的兴趣全部贯注于群众，贯注于各种现实力量，贯注于组织体制和机构；他们认为重要的正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个人都溶化在这些广阔的模式和概念之中。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主要意识到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人类经验。使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个人自己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经历，是一种意识的觉醒，是个人所特有的一整套思维方式、感情、他与自身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是他自己解决在外部和自身内部遇到的问题的特定方式，而这些方式是，并将永远是，与其他人不同的。

归根到底，在可以称作社会学的方法以及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可以称作心理学或哲学的方法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职能分工。显然，这两种方法无优劣之分，每种方法都对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尽管如此，如果人们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品质、发展身体、陶冶性格，那么，应该说第二种方法在很专门的意义上是教育工作者的方法。思想、身体、性格，这些东西毕竟只能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人，而个人的范围既有限也无限，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除此而外，它们还能归属于何物呢？

如果关于不同思想、不同兴趣的这些考虑，不符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促使我们得出的结论，那么，这些考虑本身就不足以使我们坚定地走上教育行动之路。在人类的历史上，至少是在世界某些地方的历史上，确曾有过安定和平的时期，但对我们西方世界来说，这样的太平盛世还不曾是我们的福分。

人们也许会把 1935-1945 这十年看作是历史上最重要、最风

云变幻的时期之一。在那个暂短的时期内，一切都濒临灾难，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命运都危若累卵。甚至善和恶也象两军对垒，泾渭分明，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一方面是对两千年来想使人类摆脱奴役和偶像崇拜的艰苦努力的否定；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的联盟，决心不让兽性得逞，不让愚蠢、对人的蔑视和对权力的贪欲的魔鬼联盟得逞。这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即由斗争和牺牲、组织的力量、技术的革新以及战争的命运等汇集起来的因素在这十年的末期改变了力量的平衡，使形势有利于人们称之为“善”的方面。只要想一下如果另一方面取得了胜利，世界的命运和前途会是什么样子。在胜利对我们来说就是解放，带来的欢欣之中，我们的很多同伴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应该充分利用看起来有利于他们掌握政权的形势；他们认为，主要的目标是改造各种组织机构及其结构制度，而这一目标应比其他一切都要优先。取得控制权的手段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反抗。自然，人们没有排除暴力和专政，即使他们并不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去追求它们。

当时我们为什么没能采取这种观点呢？今天，理由据我们看来是很清楚而有力的，但在当时事情却并不能使人一目了然。相反，我们当时只是听凭自己的直觉，我们更多地是从自己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来提出我们的论点（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能赞同某些狂热的感情或表示喜悦）。

在我们看来，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对政权进行根本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这种变革看来是多么令人向往。

事实上，尽管进行了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改革，而且也取得了若干成绩；尽管国家收入有了稳步增长，从而为许多社会部门带来好处；但无论是财政、工业还是政治，决策的权力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而且这些人越来越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我们远没有在自由和责任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相反，我们在所有问题上提出咨询性意见的权利看来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而广泛听取公

众意见正是公共生活的实质所在。

我们在那时并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从那时起到现在会走什么道路。那些比我们更有条件预察未来的人也许能预见到民主的机构、道德、观念等的衰微。我们受当时的“智慧”限制认为革命不会立即发生——我们这种预测即使对了，也不会使人心满意足。

然而，我们还是由此得出了某些结论，作出了某些抉择，这些结论和抉择与工会或政治团体的不同，而它们认为必须使工人及其同盟者处于随时准备迎接决战的状态，处于战斗的或接近军人的精神状态。

众所周知，不论军人精神的根源是什么，它总是明显地趋向于直截了当和简单化。它不能容忍冗长的讨论或者主观的解释。它通过命令和指示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除了在策略和手腕的有限范围，不允许有自由或灵活性。它是对教条主义态度的一种肯定，从短期来看，这不无优点，但从长远来看，则会带来灾难。激进的“斗士”可以指望他们领袖的忠诚和发号施令的热情，但却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关形势和动机的准确情报。

鉴于上述的个人理由，我们感到难以加入这种旗号下的队伍；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不相信这是能够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道路。

我们只能认为军人精神具有极为有限的价值，即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暂时必须如此。然而，当激发军人精神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时如果它仍然存在，它就丧失一切存在的理由，变成一种绝对有害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尽管行动是出于良好的信念，做事也常有高尚的理由，但他们没有努力在工人中培养那种自由的探究精神，培养那种善于提出问题的、富有独创性的看法，而这类看法正是对现实和行动都采取科学态度的标志，也是对思维和存在的认识成熟的标志。由于他们对政治活动抱有一种神秘的观点，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对群众严加管理，

而其前提条件自然就是教条式的思想灌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呢？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已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连在一起，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工人阶级同甘共苦；而且，虽然我们在教育程度上有起码的长处，但常常缺少人类的实际经验。抉择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可以一直保持沉默，听从命令，参加并加强维护劳工利益的阶层，这个阶层尽管处境维艰，但还是通过日常活动一点一滴地保卫劳工的利益。

这是职责的召唤。即使人们要以远不止是时间和精力牺牲来为它付出昂贵的代价，即使它意味着丧失了人的一部分灵魂，但它还是有自己的伟大之处，有自己的存在价值。有些人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些人已经开始觉醒，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没有勇气去作出这种牺牲；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是充分利用我们特定能力和经验的方法。我们是职业的教育工作者；这意味着，二十年的学习、实践、会议、交往、读书、研究已赋予我们进行教学、交流思想、掌握交流语言的能力。由于爱好和职业形成的禀性，我们已与形形色色的人们建立了联系，并且不断地发展了与他们的对话和交流；而战争给了我们（如同给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与社会背景、工作条件跟我们大相径庭的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机会。有了这样一种锻炼和准备以后，我们觉得自己在技术上和精神上可以随时为某种教育作出贡献，在这种教育活动中，我们将能继续进行在成人中间的交流并加深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人经历并实践了这样一种工作，他就会对它产生一种志趣，而这种志趣将会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始终保持下来。但我们也开始感到，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不管怎样重要和必要，它都只是一种准备，只是真正的教育过程的一种不完美的开端。这种教育只有在成人中进行时，才能体现它的全部意义和发挥它的全部潜能。我们感到，教育的整个未

来是与建立并实施教育和培训中的这种新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的形势有利于进行这样一种冒险：出于与占领军斗争的需要和机会，一大批青年人集中到我当时工作的东南部的一个小城。他们不同程度地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出身各不相同，社会、教育、文化的背景也不一样；他们中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有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有工程师、技术员、几个哲学家和几个文学家。很少人已有工作，除了各自的指挥和组织经验外，他们的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初学者”。

总的说来，他们是异常的成熟和天真的纯朴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实际上，这正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时候，正是给人以气魄、使人羽翼丰满和充满想象力的新生和再生时期，甚至对于最不可能进行这种冒险的人和那些因性格而在那种制度中处之泰然的人来说，也是这样。

我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真正愿意深深扎根的职业并不在教育方面，而是在技术事宜和政治方面，这一点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但是，作者的目的是写历史，这里也不是写历史的地方。我只想说，尽管这些青年在背景、工作、兴趣、哲学和政治信仰等方面各不相同，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是他们都已和教育发生了联系。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抵抗运动，他们从中获得了那种独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在它影响所及的一切人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抵抗运动”一词当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因素、感情和利益，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但是，对于那些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运动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从中体验到两种基本的渴望：渴望改革，渴望人类的兄弟般友爱。对改革的兴趣是由以下这样一种感受激发出来的，即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瓦解，传统的组织体制、机构、信念、幻想和各种关系等等建成的大厦不再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即使在那些自命为这座大厦的护卫者们的思想和良知中也已经不复存在。它也许只是一种

幻想，更确切地说有一半是幻想：虽然确实没有出现什么新世界来取代旧世界，但旧世界还是继续在衰败，继续在失去民心。我们每天每时都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在整个制度的裂缝中，时时发出巨大的爆炸，昭示着一种新的时代潮流行将在各地出现。

然而，也有某种东西并不是半幻想，这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汇合”。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情节复杂的长篇故事。简单地说来，这些快进入成年期的年轻人已在一起连续生活了几个月，他们已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战斗行动，但也经历了无所事事的漫长岁月的等待。当时发生的就是人们在这种形势下常见到的情况。摆脱了陈腐偏见的人们发现了一直为陈规陋习和重重限制所窒息、得不到表现机会的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从此，为生活磨蚀了锋芒的人们显露了才华的闪光，他们的个性恢复了本来面目，职业能力也得到了表现。

这三种因素——具备许多不同才能的人形成集体，激励人心的历史背景以及来自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一系列要求——结合在一起以后，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法国几乎前所未有的成人教育试验。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能同这一试验发生联系，并且承担了许多职责和工作。我曾负责建立并管理一个职工教育中心，办公室就设在工会办公楼内。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培训工会负责人，同时，通过较为一般的方法为在抵抗运动中形成的新社会机构培训领导人员。因此，我们的工作有明显的实用倾向，这是环境使然，而且这种倾向适应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我们大家在有时间进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时间进行实验的那个时期或多或少为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们认真地考察了法国所谓的大众文化的历史上取得何种成就，决心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我们看来，激发过去几代人热情和活力的大部分活动所具有的弱点和由此而来的经不起挫折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我们的前辈一直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奴隶，他们

囿于旧观念，到头来就难免失败。他们把文化看成是自成一体、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认为它就是人类历代积累起来的知识总和，是科学、艺术、文学等各部门经验和成就的总和。既然它是一个领域，那么，人们既可以进入这个领域，也可以留在这个领域外面。人们一旦进入了这个领域，就可以靠机会并根据所受教育的类型、爱好和兴趣在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占有一席之地。有些人可以成为历史家，有些人可以成为地理家，其他人可以把数学、文学等等作为自己的专长。

如果人们在文化上采取这样一种“地理的”观点，那么，很显然，过“有文化”生活的机会很不平等。有文化上的富人和穷人，有文化上的享特权的人和牺牲品，有学到了知识的和没有学到知识的；有受完小、中、大学教育、学会了思想交流的方法和语言的人，也有知识材料和工具十分有限的人。

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一代又一代地致力于为平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只有一个主要的目标：缩小不平等，广开大门，拓宽通向文化的大道。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看成是复杂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是编码式的）知识体系的销售者。要推测我们持批判态度的理由和基础将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我们一方面承认，他们的意图是高尚而令人尊敬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种态度和方法中看到一些谬误之处：对知识和文化的本质在认识上的谬误；把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经验的具体模式当成文化本身的谬误，而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把资产阶级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形成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强加于社会其他阶级的谬误。后者不能从对他们的说教中认清自己，因而只能作生活的旁观者；要不然，如果他们被资产阶级的某些说教所迷惑，那么，他们从文化的丰盛筵席上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些残羹剩饭。总之，这种使工人接触文化的尝试在指导思想上就是错误的，因而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对文化和文化生活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激励着我

们的行动。我们力图不用先验的方法去向人们灌输现成的、陈腐的文化；我们深信，教育工作者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特别是成人能提供的帮助就是给他以工具，将他置于一种环境，使他能够依靠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自己的日常经验、斗争、成功和挫折来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独立思考，并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个性，使个性的各个方面得到充分的表现。换言之，按照这种观点，进行思想交流、独立思考、参与共同事业的能力已成为和学习的能力同样重要的事情，不管这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好奇心还是为了提高自己工作或工会或政治活动的效率。这样，我们就赋予人——在完全意义上的人——以最重要的地位，也是他当之无愧的地位，并把文化的获得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而这意味着，只有当文化成为活生生的、战斗的人的有机成分、成为一系列有独特个性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它才会相对地变得有意义。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了这些原则？当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原则当成凝固不变的最后结论。建立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需要比我们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多得多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在职工教育中心的整个试验过程中，还是力图“讲求实效”。由于我们人员的多种才能，我们对有关职工当前的和具体的需要进行了研究。这些职工当然参加了这项工作。很自然，他们都希望学习企业管理和劳工法。除此以外，我们另加了一门劳工运动史的课程，而这门课程在学校教学大纲中通常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显示了也许是最大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是在智力训练方面。由于我们的集体工作有技术员、工程师、普通工人、专业教师和一些哲学工作者参加，便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智力训练”这样一个实用名称的方法，不管这种训练是职业方面的还是娱乐方面的。为了当前的目的，我们只需说明这样一点：这种方法力图培养智力活动的某些习惯和反射，这一目标的出发点是对各方面智力活动中大脑主要作用所做的分析，它不再考虑各门学科之间的传统分工。因

此，只要举一个例子而不需要详尽地描绘训练的各个部分，就足以说明分类是如何进行的，同时再借助于目前语言的因素、组织工作，或是各门科学的分类来进行传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反映各行各业、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分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因此，这种方法是把生活的逻辑和生活的语言有独创性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逻辑和语言是和实际活动的需要和环境紧密地联系着的。无须说，既然这种方法将培养个人的判断和思维能力，既然它是建立在自立的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既有赞成的朋友，也有反对的敌人，特别是在政治界，由于他们不喜欢这种智力的独立性，因而更偏向于信任正规教育及其训练智力的传统方法。

严格地说，职工教育只是我们集体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文化中心，这个中心虽然用的方法和开展的活动不同于职工教育中心，但它也力图适应一种发展中的文化的需要，从人的工作和现代艺术的各种成就着手，把构成现代社会的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为了在不同部门之间和教师与教学对象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对话，还建立了一个部门间的中心，组成了一个协会来协调这项工作的各个方面，取名为“平民和文化”。这个协会很快发现，它的工作适应全国性的需要，没过多久，该协会办事机构便离开地方“进京到了巴黎”。迄今为止，它在巴黎已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与它一起从事大众文化工作的还有其他机构，但它始终保持着处理问题的独创性，保持着理论和方法上的创造性。

这些年来，我们出版了一些书刊，这些出版物一直没有失去它们的活力和意义，特别是“平民和文化”运动的宣言和关于智力训练的一本教材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建立的机构是短命的；它们在抵抗运动的精神消失时，在受到某些政治通牒以后，就再也经受不了，除了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在巴黎定居下来，现在还在做着全国性的工作以外，协会的其他人都回到各自的事业上去

了。

自那时以来，我在成人教育方面有了将近三十年的实际经验，并就这些经验进行了反复的思考。我取得的大部分成绩都应归功于“平民和文化”的实验，这个实验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至今还是依靠这些方法，得益于这些思想。就个人来说，我不能接受这个运动中我的同事们所选择的政治活动路线。我不得不离开了那个工作集体，从此开始了国际活动的生涯，其间只因本国的活动有过短暂的间断。在此期间，“平民和文化”实验运动继续存在着、战斗着。人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一小批人的多方面贡献，他们的贡献不仅是对平民文化的贡献，而且也是对发展国家知识生活的贡献。例如，正是在这些成人教育实验者中间，文化政策和业余生活的社会学包含的一些充满意义和前途的思想发展到了成熟的程度。“平民和文化”运动始终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始终站在创立现代文化的、战斗的前列。

不过，我们还是得承认，我们的事业尚未成功，我们的期望也没有实现。那么，我们的雄心大志又是什么呢？如我们在开头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努力建设更美好的生活，而鉴于前述各种理由，我们寄希望于教育。我们把希望维系于教育上，但是，今日法国和我们作过研究或有确切了解的大部分国家的现状又如何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成人教育至今还处于初级阶段。

甚至是对许多国家的教育现实持最乐观态度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成人教育不但本身还处于不成熟状态，而且与其他教育部门比起来也相形见绌。所有儿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受到了教育，而且学校教育的年限有增无已，但不管学校教育期限有多长，到底有多少人在离开学校以后继续学习、继续自学、继续吸收新知识、继续通过持续而有组织的努力来发展自己已有的技能和才智呢？虽然由于“非正式”教育极为多样，因而即使提出一个粗略的估计数也难以做到，但是，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样

的人在社会上所占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人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国家生活中也有一些重要的领域是取得了成绩的。职业训练就属于这样一个领域。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地理上的流动性以及失业的威胁造成了一种有利于教育工作的形势。在这一领域，对训练的需求和供应继续增长；而且，由于在这方面有立法，有行政措施，有资金，因而有可能预言：在相对来说不远的将来，需求和资源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

但是，其他领域的情况又如何呢？在智力和情感的训练方面，在审美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我们又看到了什么成绩呢？诚然，某些积极的中坚分子做出了值得最密切注意的工作；但广大群众的情况又怎样呢？说到底，真正举足轻重的正是这些群众，组成社会、民族、国家和建设文明的正是这些群众。这里不宜赘述人们看到的惰性和消极状态，以免对各部门正在取得的显著进展显得过分悲观，太不公正。肯定无疑的是，负责组织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一方面的机构只是在社会的边缘进行了一点行动迟缓的工作，它与社会生活的其他组织机构如政党、教会、工会、大学、专业协会和势力集团相比，只代表一种微弱的力量。

这样微弱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尽管成人教育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却没能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没能在我们这些国家奠定坚实的根基呢？这是我们中那些不满足于暂时成功和微小成就的人一直不能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们往往容易责怪政府当局的冷漠和有时候甚至是敌视。的确，这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所有当局在本质上都不信任一切有可能导致他们所谓的不合作态度（也即批判态度）和不尊重现存秩序的事物。显然，这个因素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尽量缩小；但是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它应该处于从属的地位，起第二位的作用。把缺点归咎于一些人，他们在本性上以及由于职责之所

在，不想或没有理由去改变有利于(或他们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形势，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对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必须考虑法律意义上的“有关当事人”，也即成人本身。在这方面，事实迫使我们得到了若干个相互影响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成人教育之所以没能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之所以缺少活力，基本原因就是它没有适应人们的愿望，或者说也没有体现人们的决心。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生活中，儿童教育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满足了普遍的愿望。每个成人，不管他的发展水平和觉悟程度如何，都知道和懂得教育和训练对自己子女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学校和更多教师，以及使教育更普及的愿望都体现在政治性的要求上。就政府方面说，它们总是颇有信心地把学校看作是财富的源泉，国家安定和团结的因素，以及正确行为和思想的基本保证；既然公众和个人的动机恰好吻合，因此，学校教育就有十分稳固的基础，有不可抑制的活力。如果政府对成人教育的态度从冷漠变为浓厚的兴趣，如果能给予成人教育以适当的组织体制和机构，给予它充足的人力财力资源，那么，即使不是为整个社会，至少也是逐步为社会的重要而有影响的部门所需要。只有当成人教育有集体的意志作坚固的基础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它才会充满生机，才会兴旺发达。

但是，我们必须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既然成人作为个人和各个社会集团的成员迫切需要知识、需要不断的信息输入、需要训练以增强其理解力、感受和交流思想的能力，那他们又为什么只考虑其他人、特别是他们负责照看的人和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呢？为什么他们躲开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教育活动呢？为什么他们对各种教育机构有这种冷漠、甚至常是敌对的态度呢？人们怎么能不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即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教育经历都是不愉快、不成功的。

事实上，我们这些从事成人教育的人会从自己的分析和认识

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事业之所以弱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人到成年时容易出现的某种冷漠或惰性；毋宁说，乃是由于一系列挫折、精神创伤的经验和坐失良机的结果。看来很明显，如果一个成人对自己的教育失去了兴趣，如果他除例外情况以外总是对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没有热情，那就是由于他在易受影响的年龄即青少年时期没有从提供给他或强加给他的教育中发现他所需要和期望得到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由政府和家庭或由学习某种职业的需要所造成的压力和义务一旦消除以后，就只有少数热心者才会坚持不懈地学习。从这些人所共见的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而不是其他的结论：目前这样的教育走错了路、造成了精力、热情和资源等方面的浪费，这种浪费是国民生活的其他任何部门（军事计划和重点项目当然除外）所没有的。

作为成人教育工作者，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整个教育事业。这是我们所做事情的逻辑发展；否则，我们就会迫使自己接受一种荒谬的东西，也就是使自己的工作对象局限于有伤残的、缺乏正常创造力、身心不正常的成人；而健康的正常成年人却是永远不会停止对外界的探索，不会停止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近些年中，我们在继续进行成人教育工作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考虑整个教育，考虑教育各阶段的连续性和相互关系。当我们说到终身教育的时候，我们脑子中始终考虑的就是教育过程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可以看到，我们完全没有把终身教育等同于成人教育，遗憾的是人们常常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为什么还要为已经有一个术语清楚表明了其含义的事物另行命名呢？尽管终身教育一词含有多种不同的意义，但为什么还要在大众教育或大众文化、群众教育、社区发展、基础教育等等一连串已经很多的名称后再加上另一个名称呢？现在这些名称造成的混乱已经够多的了。我们所说的终身教育是一系列很具体的思想、实验和成就，换言之，是完全

意义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各个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

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成人教育正在衰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反，它因此而获得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和重要地位。首先，要求受教育的成人越多，他们就越会自然地感到有必要组成协会，从专门从事这种教育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中取得帮助和指导。但不仅如此，在终身教育旗帜下、遵循终身教育原则而执行的每一个项目的成功很清楚地有赖于一个巨大的供成人使用的文化教育设施网。只有任何已知阶段A的教育，在其后续阶段B时仍继续进行，阶段A的各种教育改革实际上才有可能实现，甚至也才能有设想的可能。其后阶段的教育改革也同样如此。如果个人在离开学校或大学以后，就只剩下自己掌握的教育手段，他们在周围环境中没有各种工具和组织形式来进行适应不断发展的生活的活生生的教育，那么，很清楚，就难以摆脱追求百科式知识的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有一种虽然是违背教育原则的、不合理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要求成人去贮存知识、积累对从未认真提出过的问题的现成答案。人们会懂得，终身教育的概念是圆周式的：只有当人们在儿童时期受到了良好而合理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实际生活的需要为基础，又为社会学、心理学、身心卫生的研究成果和数据所阐明，他们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终身教育；但是，除非成人教育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除非它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否则就不能完成这样一种教育。

然而，即使是现在，成人教育对整个教育的贡献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别的教育所无法替代的。我们都知道，正是由于人们在成人教育方面首先对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工作的性质、环境、进展以及遇到的障碍作出了一系列的分析，才提出和制订了终身教育的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发展了终身教育的实践。但是，

成人教育的计划和活动已经同样对教育界作出了具体而直接的贡献。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教育革新正是在这一领域开展的。正是在这里，集体的学习和讨论代替了单纯的正规讲座、上课和练习。除了只是代替和补充学校教育的情况以外，成人教育不讲什么分数、名次、惩罚、奖赏，它力求避免重犯过去年代因袭下来而我们的学校至今还在庇护着的一切弊病。在这里，教育作为思想交流和对话的过程显示了其真实的意义，每个人都按他自己的身分和具体技能及才智而不是按刻板模式，积极地参与和促进这种交流和对话。没有严酷而费时费力的遴选，也没有歪曲教学过程和因害怕通不过而损害个性正常发展的考试和文凭。在成人教育中，不存在方法上的等级差别，非正统的教育方法，特别是直观教育法为成人教育机构所长期采用并非出于偶然。总之，成人教育，至少是具有自身生命的成人教育，没有因职业的、政治的或党派的原因而从外部强加的异己模式的成人教育，是自由的教育，为自由和以自由为手段的教育。

然而，有些问题还依然存在：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必要的变革？克服障碍和惰性所必需的力量在哪里？既然那些负责教育决策和行动的人恰恰就是其利益在于不使教育发生变革的人，就是维护传统模式的人，正是这些传统模式使他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同时又支撑着他们的地位和声望。既然是这样，传统的成人教育政策难道不是一个具有强烈生命力、十分难以攻破的领域么？我们也就这样找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而这个本质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只有政治思想不断演变，只有对政府和公民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管理人员和被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才有可能确立新型教育的目标，才能产生以创造性的革新代替衰退的传统所需要的力量。这并不妨碍我们批判，也不妨碍探讨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但是，从长远来说，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在于建立一个彻里彻外地渗透着终身教育原则的社会，在于实施一种与社会的进步和成就紧密相联的教育。

第一部分 全面综述



现代人面临的各种挑战

对于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生存从来就是意味着一连串的挑战：年老、疾病、失去亲人；交往，首先是男女之间的交往，终身伴侣的选择；其后果是任何一代人都难幸免的战争和剧烈的变革；生育小孩；生命的难解之谜和宇宙的不可思议；生命的意义，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物质世界的关系；职业，挣钱，付税；竞争；宗教和政治的义务；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奴役与自由；梦想和现实。

我们仍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其压力有增无减，也还是那样直接，那样持久。当然，在每个不同的人的生活中，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些挑战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和依照不同的轻重缓急出现。但是，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在人类生存的这些基本因素之上，又以越来越尖锐的程度增加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决定个人和社会命运的条件，使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同时危及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和自身行为的传统解释方式。

在那些新的因素中，其中大部分以挑战的形式出现，最重要的因素在今天无疑将是以下这些。

变化加快

世界正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这样说并不是什么创新，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古希腊诗人兼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当时就曾说过：“万物皆动”(*Panta rei*) (一切事物都在运动。——B.罗素)。事实上，自古以来，生活的图景总是因年代的不同而异，思想、

习俗和人们的观念也一代又一代地发生了变化。古人和今人之间的差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然而，现在事物的变化也有新的特点，这就是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前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革新现在只需一代人就可以了。在十年间，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致昨日的理论不再能适应需要。

而且，人们的思想又常常落后于发展着的外部世界。

世界不再符合人们从童年起逐步建立起来的形象，它已变得为他们所不可理解，而且不久将会变得带有敌意。如果要在生活的现实和每个人必然有的对生活的认识之间保持平衡，那就必须不断地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变化的动态来认识宇宙。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会变成自己生活环境的陌生客人，他们会认识不到自己生存的价值和特点，到头来甚至不再了解自己。解释这个世界的变化因素需要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今天，获得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对于影响我们变化着的命运的任何一个因素无论怎样强调，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使教育和教育工作者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需求，这些问题和需求的广泛程度和复杂程度将动摇整个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的传统基石。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和方法，把适合于每个社会的知识和实际技能从父亲传递给儿子，从年老的一代传递给年轻的一代，而如今，这些体系和方法的大部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验；传统的体制和方法严重失灵，以致教育过程的作用本身和它的传统功能现在已成了批判性评估和调查的对象，教育已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

人口增长

人口的急速增长是大部分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这种增长的第一批后果中有一个最为明显，那就是量的问题，即对

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且,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人有受教育之权”,而这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要求,情况就更是如此。与人口增长的同时,人的寿命也在延长,在有些国家,男女人均寿命已达到或超过七十岁,即使有些国家的人均寿命还远低于此,但也在很快接近四十岁,不久将达到五十岁,而这都是医学进步的结果。

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不仅教育的数量需要发展,而且,教育的职能、甚至它的性质也需要改变。

不管传统教育制度的成就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现有的大中小学再也不能适应目前的紧张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将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使教育体系满足潮水般相继而来的儿童和青年的需要。教育工作将不得不延伸到超过离校年龄以后很长时期,以保证传播知识和进行个人及社会越来越需要的培训。只有通过超越教育的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求助于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手段来传播知识和提供训练,才能设想使满足人口需求的教育行动成为现实。

而且,也只有通过对我们这个行星全体居民的知识和能力大量投资,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保存和利用。

如果我们都接受这样一种原则,即人类的数量增长应遵循合理的标准,应考虑需要和可用资源条件之间的平衡,那么,看来只有教育才能为影响人类尊严及其生存条件的问题提供有效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改进正在逐步地影响整个人类。人们的注意力已时常转向技术领域发生的迅速变化。1965年7月,一批各国专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工程师培训的问题。与会者发现,仅仅在一、二十年以前还处于科学进步前列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工艺在很多情况下都已变得过时了。真空管已为晶体管所淘汰,而晶体管又正在由微型电路所代替。

因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说，如果目标是要培养工程师使之能够使自己适应明天的技术，那么主要的力量应放在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因为学生将不得不活到老学到老。如果对工程师来说应该这样，那么，这对医生、经济学家以及推而广之地对每门学科的专家，无论是文化方面的还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也就同样适用。今天的语言教学方式已不同于二十年前的语言教学，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已发生了完全革命性的变化，它在研究作品、作家、流派和趋势时已借助于性格分析学、社会学、现象学和比较文学。

一个人如果不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那他就注定要落伍，切不要认为这条规律仅适用于学者或高级技术人员。在工业和农业的无数个部门中，各级生产都迫切需要时时更新理论概念和技术。

在世界各国，对有活动能力的大部分人来说，技术达不到要求的威胁是经常性的忧虑；它也是整个成人教育的主要出发点之一。

政治挑战

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中，政治现实无疑是一个主宰性的因素。

在世界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也发生了同样频繁的变化。除了一些幸运的国家以外，今天年龄在五十岁的人都赶上过两、三次战争、几次革命和无数次的政权更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31个会员国【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是在过去十五年间才取得独立的。很难设想我们今天的世界会以目前的各种形式保持长期的稳定。我们这几代人会年年、有时是天天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有着不同类型的政治机构、法律机构或社会机构的社会；社会各阶级的结构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出现新的统治阶级，在公

【注】截至1984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已达161个。——译注

民和政府之间出现新关系。

毫无疑问，对教育来说，至关紧要的政治选择只是间接起作用的事情。有的要求进步，有的希望稳定；有的主持正义，有的主张秩序，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由于许多远远超出个人好恶、亲属关系和主观愿望的因素强加到个人的头上。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是自身利益、热情、思想、反抗和顺从。在事件的进展中，教育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也在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面参与事件的准备、利用和最后结果。

从一开始就出现的一个因素是纯属精神性质的：与组织机构的更迭变化相比，人们的思想常常是落在后面的。但事情并不至此为止：政治舞台上的变化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职能，这种改变有时是根本性的；而只要个人不是消极的旁观者，不管这种旁观者多么有知识和多么聪明，他就必须承担起在社会中的那些作用和职能。

一般来说，公民这一概念(和作用)的内容总是经常不断地成为人们争论的问题。权力的实质和形式、自由的范围和等级、对行政机构和政府的态度等等，没有一样是一成不变的，也决不可能是只变一次就一劳永逸的。人们的思想、态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都应该成为不断调查的对象，这种调查所导致的抉择和立场观点不一定与五十年、二十年甚或十年前公民们所作的抉择、所取的立场观点雷同。

政治的基础和结构中发生的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要求公民，而且将越来越这样要求，承担只有经过适当训练才有能力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各级都拥有越来越多的、能赋予理论上的社会结构以生命和具体内容的、能恪尽职守的领导人，在这种条件下，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现代民主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工会的书记、社团的经理、国会议员或市长都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以必要的权威和能力完成他的职责所要求完成的工作；因为当代社会复杂结构的管理和运转越来越

越不容许漫不经心和轻率从事。

从总的方面来说是这样，但对政治问题接踵而来并且特别尖锐的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来说，这一点就更突出、更重要。在许多情况下，问题在于建立起实质性的经济文化和物质设施，以巩固基础必然脆弱的新独立国家的地位。必须在人们中间培养一种公民感，而这一过程常常需要顶住与现代国家的思想相悖逆的传统。如果社会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想不再只是空架子，那么，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就必须毫不延迟地培养自己的高级和中级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要能够保证计划、行政管理和事务工作的正常运行。这就是真正的、实质性的独立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些国家近年经历的革命不只限于政府部长们的人事更迭，而是影响到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国家也遇到了与上面所说的性质类似的问题。光是颁布新的宪法、建立新型的行政机构是不够的：必须把主要的力量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道德风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

个人和社会还必须面对由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带来的后果。通过报刊、特别是通过广播和电视，所有的人现在都与世界上的每个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战争、革命、政党的代表大会、经济危机、有影响人物的逝世等等事件，在不久以前还需要几周甚或几个月之久才能传出国界，而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观众或听众却可以在事件发生后立即知道，而且使他们如临其境。

这种情况产生了深刻的反响。在我们面前，一个全球性的文明正在产生和发展，在这种世界文明中，除了在消息传播的道路上有政治性的障碍以外，每个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与其他人有关，都与其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互相联结、互相影响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形

成以人类亲密关系为特点的文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情况千差万别，但还是出现了人类的兄弟般关系，人类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也日益显示了它们的共同性。现在来说明和衡量这种现象的无数含义还为时尚早，但是，从长远来说，国际间的了解和合作总是有益无害的。

然而，只有在同时进行认真而持续的训练时，信息才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接收的信息和数据的理解、阐释、吸收和利用，要求每个个人掌握语言——视觉语言、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以进行符号阅读的实践，而且，最重要的是养成一种批判力和选择力。无论是判断真理的重要程度或消息的可靠性，还是给信息以与发展和加强个性的其他手段相对而言应有的地位，每一步都需要进行选择。

闲暇

对世界上许许多多居民的生活状况往往起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闲暇时间，虽然它不是象前边所列的因素那样普遍的现象。现代形式、范围和内容的闲暇是工业社会的一种产物。在农业类型的传统社会中，闲暇和工作——或者换一种有人喜欢用的说法，生产活动和娱乐——在许多情况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尼日尔河两岸的多贡人中，经济活动的高峰期，也即捕鱼期和收获期恰好与节庆活动和礼仪活动的时间一致，生产活动和娱乐总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同样，即使在工业社会中，不同阶层人口中闲暇时间的分布也是很不平衡的。大学教授和农业工人之间就有千差万别，前者每年有六个月的假期，而后者则生活则是连续不断的劳作。只是到近年，许多国家的工矿企业工人才取得了两周、之后是三周、最后是四周的带薪休假。就家庭来讲，男女享受的闲暇时间也是很不平等的，有人甚至曾宣称，某些人的闲暇是与其他人的乐趣完全抵触的。

不管这种情况如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能受益于时间的某

种新的安排，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从个人的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说，人们都应该恰当地利用那一部分时间。

当然，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种主张，即各类建设者(建筑师、城市规则人员，等等)和使用其劳务的人，如市政及地方当局，只有在首先考虑人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以后才能着手进行某项建设事业。如果儿童、青年和成人在满足自己的社会交际需要方面没有可供选择的形式来替代马路、酒吧或附近的电影院，那么，无论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的巨大努力多么富有建设性，他们的工作都将等于零。

然而，主要的责任还在教育工作者身上。人们有多不胜数的场合和机会来获得文化教养，但是，如果人们不掌握得以接近这些精神财富的钥匙，那么所有这些财富仍然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不会产生效果。城镇、农村、人类自身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生的任何时刻都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但对这些信息必须加以阐释，同时，人们还需要掌握绘画、音乐、诗歌、科学和同其他人交流的语言。

这就是教育工作者在闲暇问题上的基本任务，即通过为人们提供认识、思维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来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那些由于命运不佳、缺乏意志或由于厌倦生活而没有跨越文化探险之门的人，也就不知道如何利用可由他们自由支配的空余时间，他们也就会成为消极厌倦情绪的俘虏，而消极厌倦情绪对于人的精神来说就象病毒之于有机体一样危险，一样致命。

生活模式和相互关系的危机

生活模式本身已经动摇。在古代，人类在自己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都可以从祖先留下的遗产中找到大致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常常毫不犹豫地去应用前人的经验，因为前人提供的模式和范例是这样富有强制力；人们只需要从数目有限的某些方式和方案中作出抉择就可以了。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现成的

穿戴；这些服饰或多或少地符合人的性格、感情、精神状态的特点，但又使每个个人成为社会要求他成为的那种人。一代一代人之间、贫富之间、地主和无产者之间、主仆之间、男女之间和夫妇之间这种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成文法典加以规定的。礼仪、道德观念、习俗都是强有力的；虽然它们有时候会把沉重甚至痛苦的强制加在人们身上，但它们总的来说还是能让大多数人去担当那些委派给他们的工作。

今天，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现在，没有哪个成百年来经过缓慢的进化过程逐渐形成的传统类型的人能再适应个人和社会的新情况。

现今一切都成了问题。看起来就象是人类切断了锚绳，向着一个无际无涯的冒险事业启航；而对于这种冒险，无论是它的活动领域还是它要达到的目标，都无法十分准确地预见。传统的结合、内容、年龄本身都不再是贴切的。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算成人？一个女子什么时候就不再是少妇？一个世纪以前，三十到四十岁的妇女就算是临近老年了，今天，她到了这个年龄才开始声称，自己进入了生命成熟的盛年。我们全都不得不按古老的故事和书本中表现的人物形象来认识自己。

如果一位父亲想按照曾经支配他自己成长过程的方式来作子女表率，并要子女仿效，那他就可能会犯很大的错误。甚至没人听他的话。至于一、二代人以前的妇女形象与我们当代正在出现的新型女性形象之间，那就更有天壤之别了！在交织着女性美、爱情关系、社会性和职业性、新观念和自我探索等形形色色的新世界中，妇女怎样才能发现自身的价值呢？要妇女按照异性希望的那些女性形象，有些时候是信任和善意地，来认识自己的地位，又会怎样更加困难呢？教学的内容可以无所不包——教人处理各种关系，情感方面的问题，传宗接代，教友好相处，教当父母——这些新内容都应有各自的地位。

身体

如果认为人类一直等到现代才发现了自身躯体及其机能，那无疑是过于天真了。首先，人类总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如果忽视了这种存在，也会马上得到提醒。此外，整个文明对与人类身体有关的事情都已赋予了应有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学会了在节日和礼仪中、在舞蹈和性行为中，利用躯体为人们提供的官能来表达他们的愿望、感情、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对美的表现的需要。

在过去的西方世界，主要的文明形态与人类的这个方面很自然地和谐。但随着各个世纪的连续更替，这种和谐关系在很多社会中已经打破。在所谓的躯体和所谓的灵魂之间出现了缝隙和矛盾，两者的统一遭到破坏，与精神有关的价值观念以牺牲其他价值观念为代价得到了发展。人们很快地被禁锢和压抑在一系列的戒律和禁令之下，而这一切又逐步地导致瘫痪和可怕的创伤。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西方，人类文化有数百年的时间失去了与生物学、体力活动和性的正常关系。在这些情况下，身体最后起而反抗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由于意识形态和习俗造成的以及由于各种商业部门发现可以赚大钱而巧妙地加以利用的障碍逐步减少，重视物质生活享受的各种现实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报纸、广告、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等等从此天天通过视觉和听觉形象来表现肉体 and 物质的存在，尤其是强烈地倾向于表现女性。在这方面的所有表现中又总是不厌其烦地突出与性有关的东西，这些宣传在我们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往往占有大得不相称的地位。

不管我们持什么样的宗教或哲学观点，也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恶，这里有一个事实构成了对现代个人、社会和文明的重大挑战。甚至在不远的过去，也没有任何相似的东西。对于侵入到我们世界中来的这个五光十色、充满了紧迫感的现实，应该作何

反应？

这里既有机会又有威胁：有机会来丰富生命，来填补由我们文化中的传统成分消失所造成的空白。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增加生活经验、进行表现和交流的一种有价值的手段。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对生活平衡的严重威胁，这种威胁，已达到新的影响和势力不能加以控制的程度，达到所提供的丰富内容无法充分利用的程度。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无所适从的情况。

很清楚，各种形式的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减少这种现象的有害影响，同时又从中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使人过一种更和谐、更充实、符合生命真谛的生活。

思想意识形态的危机

一种基本危机不仅出现在伦理和人与人关系方面，而且也出现在思想领域。我们的祖先不管信奉何种思想，他们对有关生活的意义、行为准则、优点和缺点、美德和恶行、罪恶和赎罪、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必要的依附和不可避免的排斥等问题都能胸有成竹地提出充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每个社会都有符合自己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礼教和法典，在天堂和在人间都是如此。党派和教会在发布教义、法规和命令方面是很少迟疑的，如果一个人由于偶然的原因或出于自己的选择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或伊斯兰教徒，那么他会发现在自己的抉择和信念相同的团体中是安然无恙的。

今天，要发现这种类型的信念是越来越难了，也越来越不使人心悦诚服。诚然，还有忠贞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坚定不移的基督教徒，也还有献身党派和确信自己信念崇高的公民。但是，即使在立场非常坚定的情况下，也会悄然地出现疑问——这种疑问不一定是带破坏性的怀疑主义，而是建设性的疑问和对问题的多种阐释。单一模式的信仰变得越来越少。某些历史性的会议、争端和辩论、思想和知识的进化，还有某些教义的日渐失

灵，已经在每个地方带来了一种讨论问题的情趣。我们经历的历史每天都会带来新的主张或互相矛盾的观点。

这些纷起的思潮甚至也波及到了一向以平静和稳定著称的社会集团。普通的社会成员怎么能不受他传统教师的态度和观点的这种变化的影响呢？

实际上，每个人都面临着同样的抉择：要么采取听天由命和投降的态度，看着信念和学说纷呈而对其矛盾和变化漠然处之；要么从自己角度考虑去参加研究工作。很清楚，只有第二种办法才与充分地、衷心地接受人类的生活条件相一致。

因为做人的权利必须辅以做人的义务，而这意味着承担责任：保持个性的义务；对自己思想、判断和情感负责的义务；对自己接受什么和拒绝什么负责的义务。在一个有成百种方式使自己属于某个精神的、宗教的或哲学的团体的时期，还能不是这样吗？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的个人是命定要实行自治、是要对自由承担义务的。这是一种令人深为不快但又激动人心的情况。只有愿意付出代价的人才能适应这种情况，而这个代价就是教育——这种教育永不停止；这种教育从智力、也从情感和想象各方面调动生命的每种能力和手段。

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成年人，或者说成为一个成年人，需要和从事任何一种创造性工作，不管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同样的热情和连续性，同样的坚韧不拔。如果一个人要在这一努力中取得成功，那就一定要把认识其迫切意义作为基础。从今以后，没有哪一个人能靠委任而成为哲学家、诗人或公民。



起作用的力量

障碍和阻力

一般地说，教育具有明确的传统职能，教学工作尤其如此。我们所有的人首先都是承袭祖先遗产的后裔，这一点难道不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么？把当代人与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一代代人联系起来，把人们互相联系起来，向年轻人传递他们的前辈已经思考、感受和创造了的东西，不只是为他们自己，也是着眼于整个世界。让年轻人经常接触人类在诗歌、音乐、建筑、绘画或哲学等领域的重大创作成果，保证人类历代积累起来的智慧财富和人道主义传统的连续性——所有这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已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还没有接受和分享人类这种共同遗产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和情感表达方面会处于怎样贫困的地位。

然而，这些遗产只有在与投身于劳动、工作和斗争的成长中的人的经验结合起来时才有价值和意义，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劳动、工作和斗争是现代人类为了有效地迎接他所面临的全部挑战所必须从事的；帮助人们去创造发明；引导人类去想象、冒险和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使人类接受对自己的信念、态度和知识必须不断地提出怀疑的地位——这些要求构成了教育过程的第二个职能。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教育必须在它的具体目标、内容和方法上不断进行更新；在进行这些更新时应充分考虑当前的各种重大变革和产生的新问题，充分注意那些卷入教育探索的各方面人们的生活前景。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在人类的各种努力中，很少工作会遇到象在教育中遇到的那样大的影响进步的障

碍。以其稳定著称的机构如教会和军队几十年来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现在的国防很少是在阅兵场上计划，而是在科学实验室里进行设计的。

在罗马，世界各国的主教正集会辩论以教皇为主宰的教会权力的形式，与此同时，普通的牧师们也在新教密室中聚会，要求得到参与决策的权利。

然而，在教育领域，至少是在从事儿童、青少年教学的教育部门，却至今没有看到有类似的变化。诚然，当今在大部分具有现代化结构的国家进行的教学，自查尔斯·狄更斯或朱利·瓦莱斯进行艰苦调查和尖刻报道的时期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儿童不再挨打了，发展他们智力的技能也大大提高了。孩子们不再被要求去强记莱因河或泰晤士河的支流的名称了，课程和方法方面也有了进步。但是，除了因政治改革而引起了教学革命的少数国家以外，学校教学的精神和最终目标根本一点没变。一般的社会习俗取得了若干进步，教学的方法和技巧也从人类文明的几次决定性胜利中受益。但是，社会用以教育和训练未来公民的工具，即学校和大学，却世代代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与生活缺少联系，脱离具体的现实，教育与娱乐割裂，不存在对话和参与。

这些方面的障碍是很容易看清楚了的。我们已提到了交流的重担由于其分量而起着一种制动的作用。事业本身的困难就是一种障碍：教育关系到个人、团体、民族的生活的无数方面。凡是教育方面的事情，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哲学，因为我们必须确定需要注意的目标和价值观念：教育与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方面各种情况的关系；教育与社会结构及活动的关系；教育的成本和效益；行政管理问题；最后还有与平等、功效、正义等等有关的基本选择问题。

由于教育事业的复杂性，要使工作有获得完全成功的把握几乎是不可能的；又由于进行中的任何行动的结果只有在遥远的将

来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因此教育工作的成功把握就更小了。在改变一种尽管有缺陷和不足、但能牢固地和秩序井然地存在下去的状况以前，即使是最能明察事理、最能根据知识和经验进行决策的国家也会举棋不定。在科学资料、学识、研究方面条件较差的国家，从事冒险性这样大的举动时畏缩不前，也就更有理由可以理解了。小心谨慎比逻辑和道理更重要。

革新的另一个障碍是保证学校体制稳固性的一个因素，这就是强制性的原则。没有谁会就这条原则进行争论；但它确实起了一种稳定的作用。为什么非要变革，非要费力去改进？在每年照例有许多人自动到学校来上学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去探讨也许能更好满足培养人的需要和希望的模式或方法？在这里，看不到支配进步的供求规律的作用。

以目前方式招聘和培养起来的教师队伍，同样没有表现出多少想象和革新的热切要求。不管是在哪一级从事教学的教师，从其特点来说，是决不会去参与对话的。他们没有必要使自己平等待人；他们在经过考试以后便从一种服从的地位转向十足权威的地位。从这点上说，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象教师那样集中这么大的权力；教师既是教书的导师，又是塑造个性的匠人；他既年长，又学识渊博；他总是对的；他是法官，完全不准上诉；他还是执法者，他随意地运用责备、惩罚、奖赏等各种手段。我们都很清楚，用这样的方法，一个人是不可能变为成人或获得真正的力量的。

在这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里，无论是在政治、艺术、公民生活还是成人教育中，都会遇到因人因物造成的障碍；只有当部分教师跳出了与外界隔绝的小圈子、与广阔的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智慧，获得对人和客观事物的知识。

就法定的或机构的权威人士而言，他们对变革没有兴趣，也不希望变革。作为家庭或国家的代表，学校的目标是教育培养顺从的品质。

现存的绝大部分中小学校和大学都有充分条件培养出一种把集体的神话和参考资料作为天启真理来吸收的。各种权威最怕的是探索的精神。

种种革新的因素

在这些条件下，人们就很容易懂得，只有通过强大到足以战胜阻力和克服障碍的力量的影响，才可能实现必要的变革和适应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四种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将继续有力地起作用。这四种因素是：政治革命，消费者的论战、发展及其问题、成人教育。

政治革命：

在促成革新的诸因素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因素。在以往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历次革命，理所当然地采取了与过去决裂的形式。这里所说的过去是指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传统的等级制度等等，同时也指思想体系和有关的社会习俗。很自然，教育是一种极好的武器，可用以战胜传统的各种影响，并用以创立有利于新的历史趋势的意识形态、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

在以社会主义政权代替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政权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先目标之一就是生产与保卫新制度和生活理想的观点出发塑造个人。

因此，以苏联为例，青少年的课程内容与革命以前时期的课程内容就根本不同，而文化背景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旧制度下，文化和劳动是分离的，而现在劳动获得了作为文化的有机成分的应有的地位，换言之，它占据了中心地位。各种形式的政治、社会事业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这些事业的文化意义也都为人所认识并得到了适当的重视。这个国家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把形成和影响人民理智和精神命运的种种因素统一起来。

成人教育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因为不

需要等待几代人成长起来后才会有新社会的工具。从苏维埃制度的特点来看，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这个制度强调人力资源的利用，强调各种年纪机会平等。

还发动了一场运动，旨在逐步导致更为激进的教育理论改革。

有些国家在创立新的教育形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它在探索教育问题的答案方面表现了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的丰富想象力。两者实际上是密切联系的。很少国家象南斯拉夫那样使教育目标起这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各种不同的自治形式中，在行政权力的下放中，在实施关于管理人员轮流任职的原则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教育目标的作用。就我们所知，南斯拉夫还是应用终身教育原则的第一个国家，它把终身教育原则看作是联系各个教育部门的基本纽带，看作是新教育法的基础。

受教育者的论争：

过去若干年内促成思想观念进步和教育方式更新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学生的批评意见。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出现，对旧教育制度改弦易辙的必要性可能不会有现在这么清楚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在走向理智、正义、长治久安的任何进展中，决定性的因素说到底还是当事者的不同意见。这一点，已在有关劳动、妇女、殖民地人口和其他各类在物质、经济、法律或文化上受到控制的问题上得到了反映。

近年的许多事件已经人所共知，无须在此详加论述。在现代文明的所有关键领域（工人、妇女、有色人种、殖民地区的要求），论争都是进步的发酵剂。这里，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这种论争最初进入教育领域这个历史时刻的重要性。

在教育保守主义的城壕中一个重大缺口就是由学生的行动打开的；通过这个缺口又出现了一连串难以抗拒的各种长期性问题，成堆的老问题上又加了许多新问题；人们的急躁情绪和新的

希望又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

如同在贫困、压迫或非正义的条件下发生的情况一样，受害者不再听从命运的摆布。把教育的弊端和缺陷作为事物常态的产物来接受的人在数量上是越来越少了。

诚然，在目前的激动不安之中有不少混乱和很多粗野的内容，但学生的论争还是一种战斗精神的基本表现；没有这种战斗精神，任何一种必要的改革都不会来到。

发展及其问题：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各国共同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必将有助于建立现代文明的坚固基础，这种文明既赋予社会的集体利益和全球利益以应有的地位，又赋予个人固有的正当希望以应有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不仅有利于穷国的生活提高，而且有利于形势稳定和世界和平。社会、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求教于更为发达的国家，在国家的强盛富裕之道方面寻求它们的指导。最简单和最概括的分析很快便显示出教育活动的重要性。世代以来，教育培养了能够想象、能够根据现代国家的规则进行组织管理和统治的人材。没有教育，就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事业心，没有一个民族的能量调动和组织。因此，每个刚取得独立的国家都希望并且特别重视建立作为发展工作支柱的机构，即中小学校和大学。过去二十年间，我们已经目睹了世界范围内教育体系的惊人发展。

现有的统计数字，不仅反映了从事这一事业的国家的要求进步的意志和能力，而且也反映了国际援助的范围；因为取得的迅速进展都是通过富国以双边或多边形式提供援助的大规模介入得到促进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忽视这种外部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那是不公正的，

也是违背事实的；但是，有一点仍然是确实无疑的，即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教育活动逐步取得独立的。近年来，正是由于大中学校的存在，工业、商业、政务以及教学本身的重要职务才能由本国国民而不是外国职员担任。

然而，尽管教育在数量上有这样巨大的增长，却还是远远没有实现人们对它寄予的希望。在许多情况下，教育与其他形式的投资相比，其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成负数的。教学工作证明不能达到为它确立的目标，这些目标就是培养个人使之能适应根据历史和地理条件来指导生活的各种环境；培养他们去承担发展中社会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引导他们去接受变革；为他们提供智力活动的条件和科学技术设备，这些条件和设备将能使他们积极地参与组织体制、机构、习俗、思想的变革过程。

比起其他国家来，这种类型国家的教育工作的宗旨是使人们的思想更适应古老的、过时的文化和文明模式。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象目前这样进行的教育常常成为发展的一种障碍，而且这种障碍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教育之所以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就是由于它在以理性观念、智力训练、个人和集体目标的制订为一方、以现实为另一方之间所形成的鸿沟。

在数量发展和质量落后之间的这种脱节使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上对教育的普遍关注的实质是希望教育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服务于人类真正利益的各种人——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政治家——都深切感受到的；他们期望教育的服务对象应既着眼于个人，又着眼于社会。关注教育的人越来越倾向于批评过去的遗产，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他们。由于他们比以前的人有更好的条件，所以能逐步摆脱因循守旧的和感情上的麻木状态；这就是说，一方面尊重和钦佩走在他们前面的国家无可否认的成就，这些国家继承了遗产；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传统力量失去以后可能带来的多少持久的空虚状态。

因为事实是：确立一种新的教育形式需要巨大的勇气、创造

性、智慧和能力，而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其他形式的大规模人类事业的需要。但是，一旦负责人员获得了必要的能力和技能，革新的工作便会很快地进行。只要对教育制度中的一种基本要素，如文化观念，提出怀疑，便足以损坏教育的整个大厦，从而无疑应该找到影响整个教育制度的方案。

当前，不只是文化模式正在受到检验，而且体制、目标、课程、方法等等也正在为人们重新评价。比如，在象牙海岸，一种激进的研究和改革精神支配着教育制度的重建过程；印度尼西亚也以冒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达荷美正计划建立一所新型的大学，这所大学将不再按传统分系（文、理、法、医等），而是在确定重点以后，在一系列项目、工程、规划的基础上组织跨学科的教学。

成人教育：

随着成人教育的发展，它越来越明确地强调自己与传统教育方式的差别。但这种自成体系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出现的：在接近十九世纪中叶成人教育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也还是由刻板的模式支配着的，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当时的大部分学习者是工人，他们完全要靠公立或私立机构及其资方和职员才能得到训练的机会，而教师自身则又易于屈从传统的文化模式、习俗和教养方式。

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上了夜校，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教学寻求一种手段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生活保障，或者因为他们希望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或者因为他们不得不寻求竞争的武器。

毫无疑问，这些成年学生中有许多人都从自己的努力中得益。他们受到了指导，他们改善了处境并在一定程度上踏上了需要学历的现代文明之路——但他们付出了多少失望、误解和痛苦的代价啊！这些男男女女中思想较为先进的人，更勇敢和更开明的人则一头碰上了文化观念的壁垒。他们自己发现和认识到，教学是同化和适应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一种资产阶级的

保守的文化所同化，这种文化以牺牲其他价值观念、革新和开放为代价来加强传统的价值观念，加强继承、秩序和安全的价值观念。他们对出现脱离现实的文化的危险作出了反应，这种文化声言自己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但事实上是用来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特定工具。他们摒弃了所谓普遍理性的神话和神秘的色彩，因为这种理性脱离现实条件，脱离争取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斗争。

使他们摆脱幻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教育体制的实施方式。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模仿对儿童进行的传统教学模式，这就是单向的知识传授、练习、作业、对所学知识的检查、考试和文凭。没有试图去探讨差异心理学，只不过是传统学徒制的盲从。

正是在反对这种智力的、思想的、文化的和方法的体制的背景下，逐步出现了一种新的成人教育形式。这种成人教育是摒弃了传统的大中小学校办学路线在人民的大学校(如在丹麦)、在互教互学的组织、在职工教育或合作教育机构、在大众教育运动或协会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在这些新型教育机构中获得的经验中，一点一点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关系。参加培训或学习的成人不再是象小学生那样，需要屈从于外部约束和从外部来源接受知识。他不再是被动地受教育(原则上每个学生都属于这种情况)而是自己也成为教育的工具，自己掌握了作为成人的主动权。这种新的个人成了具有充分意义的人，他在心理上和社会问题上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他认识自己的个性，投身于一系列各有特定目标的竞争：生存的竞争，求知的竞争，争取个人与集体进步的竞争。成人学生在与教师的关系上不再处于从属他“师傅”的下级地位，而成了一个集体事业中的伙伴与合作者，在这一共同的工作中，他处于既接受又给予的地位：一方面接受学习的内容，一方面又在交流之中把自己作为独立个人、作为工人、公民或其他处于各种情景和关系中的个人来实现人生目的的独特的经验财富给予别人。从这时起，重点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在获得的知识上，如果说也重视获得的知识，那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之内，

即这些知识使个人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保证以后各阶段自身的持续发展。

推动这种新型教育的动力也完全不同于支配着儿童教育的动力即强制性。儿童不管愿意与否，都因法律和父母的压力被迫放弃游戏和娱乐，以从事在他看来并无明显吸引力、自己也无真正兴趣的活动。其结果是教育机构的稳固性，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停滞和保守。没有这类因素影响成人了。当然，他们还可能受到间接的限制或压力，其中有些是经济性的，有些是政治性的。但是，成人很少会被人强迫着到学校去坐在板凳上听课。一般地说，只有当他们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时，当他们认识到教育内容与自己的志向、愿望、好奇心、爱好之间的联系时，他们才会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去参加教育活动。如果不存在此类联系，那么成人就会很快作出决定：或置身一旁，或即使试一下也很快放弃这种尝试。

这种状况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就成人而言，现在教育被迫要进行创造和革新，要有设想。只有当课程考虑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有着各种特性和需要的活生生的个人时，这种课程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负责成人教育的人就有责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特别是注意人文科学中有坚实科学基础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要改变传统的教师形象并且要能接受下列要求，即教师应成为其他成人之中的一名，自己既有所知，也有所不知，既有所能又有所不能。摆脱了任何妄自尊大、具有科学基础的谦恭个性将能产生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产生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在这种教育形式中，教师一定能比在其他的任何教育条件下给人多得多的内容，同时作为回报他也将得到多得多的收获。

在这方面取得的结果具有相当的价值，这种价值不只是在对成人的训练和教学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整个教育事业中。除了别的因素以外，我们在小组活动的产生、视听教学法的使用、对闲

暇的研究等方面都要特别地归功于成人教育。

也正是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世界上出现了有关终身教育的基本思想和建议，终身教育被看成是一体性和连续性的一条原则。最富洞察力的专家和最富革新经验的人已经发现，如果人的早期教育即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还保持现状的话，成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受到挫折。他们从“儿童是人之父”这一显而易见但又常受到忽视的真理出发，研究了教育结构、体制的观念和效能；一方面揭露了它们的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所需要进行的改革。如果人要在整个一生中保持不断创造的状态，如果要完整地保持——或者更好一点，要发展——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的、而任何一种划一、刻板的制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使之萎缩的创造力，那么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些先驱者通过自己的探索、建议和所取得的经验的力量，有力地促成了一种新的教育学说的建立。这种新的教育学说比传统的理论更多地注意现实，更多地重视人的实际存在。

终身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我们列举出了人类面临的全部挑战，其中有些是传统的，与人类生活条件相联系的，有些则是与当前历史时期有关的，再加上前一章我们又对影响指向革新的各种力量进行分析，显示了教育的责任和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随着进一步的思考和实验，出现了有助于认识教育范围和意义的一些想法。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以后便可以终生应付裕如，这种观念正在迅速过时并在消失之中。由于内部需要的压力，同时作为对外部需求的回答，教育正处于实现其真正意义的过程中，这种意义不在于获得一堆知识，而在于个人的发展，在于作为连续经验的结果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自我实现。

鉴于这种情况，可以把教育的当前的责任确定如下：

首先，组织适当的结构和方法，帮助人在一生中保持他学习和训练的连续性。

其次，培养每个人通过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在真正的意义上和充分的程度上成为自己发展的对象和手段。

在这个总的范畴中，以下诸因素值得特别注意：

年龄和教育

如果人们一致同意教育过程必须持续地贯穿在人的一生之中，那么，就不可能有理由认为某个年龄阶段是专门用于教育的。尽管如此，人的一生中也可能有若干时期是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进行训练的。同样，也可能有些时期比其他时期对学习更为

有利。

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或现成的答案。没有疑问，某些能力易受年龄的影响：事实看来已经表明，过了一定年龄，部分记忆就会失去敏锐性和适应性；对某些学科知识（如数学或外语）的学习和接受会产生在某些情况下证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体育运动中技巧的掌握上，特别是在进行与自然动作多少相反的技巧训练和需要年轻人身体的柔软性的技能训练方面，年龄的影响更为明显。例如舞蹈、拉小提琴、滑冰等等，如果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水平，就都需要在一生的较早阶段培养技巧、反应和习惯。

这些例子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对于思想懒惰的人来说，它们似乎表明学习有一定的年龄限制；然而，这些例子还隐藏着另一个真理，这就是：人们在一生的每个阶段，都可以接触和学习许多形式的智力、体力方面的知识技能，它们的大门是敞开着

的。

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习惯，任何一个在青年时期掌握了一定技艺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成为新的技能的初学者和实践者。实际上，某些形式的活动只要经常不断地使用，就非但不会随年龄的增长而退化，相反会不断地提高，比如口语和文字的使用就是这样，或推而广之，凡是判断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和过程也都是这样。

但是，问题的真正本质并不在此；因为当我们对学习的能力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是基于对教育过程的一种有限的、部分是错误的认识。

对于实行终身教育的前景及其必要性，不应从其他人，或从学生外部的、一定量的知识来加以判断，而应从特定个人的个性发展来着眼。

在关于教育的大部分意见背后是对于文化的传统观念，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传统观念更令人沮丧和难以适从的了。测定某个

个人的文化并不是根据知识技能的多少、优劣或假设性的平均智力模式所授予的分数的 高低和加 减符号。一个人的文化是他借以不断实现自我发展的所有努力和经验的总和。这些努力和 经验，即使他与其他千百万人共享，也都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只对他自己才有意义。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有的人能力出众，有的人困难重重，但这样的差异丝毫也不影响一个基本发现，即对活生生的人、正在建设新生活的人、意识到外部世界并以自己的行为参与它的发展的人来说，文化的存在程度仅在于它在特定的个人历史上经过实践和检验的程度。

从这个观点看问题，任何训练、研究、学习或其他旨在提高认识和增进与他人关系的各种努力，都只有与一个连续的建设性过程联系起来才有自己的地位和意义，而在这个建设性过程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如果说正象我们已见到的那样，教育的训练在人的整个一生中 都占有一定地位，那么，在任何个人生活中出现的关键时刻，教育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

从一个年龄期到另一个年龄期的过渡——从儿童到青少年（它本身又有几个阶段），从青少年到成熟期的各个阶段，从这些再到第三阶段，最后到一生的垂暮之年——时时都会出现各种问题，而且甚至可能促使危机爆发。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自己的优点和缺陷，而且无论如何都有自己的具体内容。为了使每个过渡时期都能获得其充分意义，为了使它们不致成为分崩离析的时期，而成为在争取更敏锐的意识、更可靠的知识、更有效的自我控制的道路上的进步阶梯，需要每一时期在教育上作出特别的努力，就象是每次都在跨入青春 期一样。

这种教育努力必须在专业技能、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上进行；它包含着抉择、牺牲、决心，它们本身都需要一系列复杂的训练、信息和练习，而这些又都构成了一个广阔而深刻的终身教育概念的部分内容。

无论如何，教育过程如果要有生命力，为发展中的人服务，那就必须与时间形成积极的联系，而时间应被看作是一种建设性因素而决不是作为一种破坏性因素。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尽一切努力摒弃任何一种把思想和道德、习俗看作一成不变的观念；他们不仅需要努力使人接受变革，而且需要努力以各种方法促进教育的对象机智而有效地参与各个阶段的变革，不管这变革是发生在个人内部还是发生在他与之联系的外部世界。

青年人和成年人

诚然，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却因青年和成年而异。青年和成年这两部分人除了在生理、心理的成熟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以外，在地位和环境上还有很多重大的差异。一方面是义务，另一方面又是自由。儿童总是听命于大人，这大人的化身就是父母或学校师长。儿童所处的地位使他不能自己作出决定，既不能选择最适合于他自己的东西，也不能拒绝他自己不想要的或不喜爱的东西。在教育过程中，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对象，把他置身其中的各种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内容和方法都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其他人越俎代庖地替他决定哪些东西对他来说是好，哪些东西“在他长大以后”会有用。

对成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除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外，没有什么外部的权威强迫他学习，强迫他增进智力，强迫他成为更好的公民或更有知识、更明事理的一家之主。只要他还没有认识到，如果他在专业的、公民的、文化的诸方面作出一定的努力，就能从中得到裨益，那么，他就会处身于那种种进取之外；而在他投身于继续学习之后，他也有随时放弃的充分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成人教育以及任何一种非强迫性的教育，包括青少年的校外教育，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革新舞台。这种类型的活动计划导致了某些新的教育形式，特别是集体作业、有组织的讨论、参加生产活动、讨论会、研究课、非指向性方法、充分

利用视听手段等等，这些教育形式的普遍意义现已得到了人们的确认。因此，未来的教育就其整体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来看将取决于成人教育的发展。

终身教育也是作为解决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而出现的，这个重大问题就是从几代人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青年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以致在很多情况下父子之间、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到了实际没有对话的程度，而这种交流和交往无论对于双方个人的互相增进知识和丰富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的平衡都是非常宝贵的，不可缺少的。

归根到底，这种危机状态的主要责任还在年长的一辈，因为别的且不论，他们毕竟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而年轻人却从未当过成年人；因此，需要由年长的一代在互相理解、适应、革新和设想等方面作出主要的努力，没有这些，相互的交往将仍然是不可能的。

首要的是，权威的确认应从以地位和名望为基础迅速变为以能力和对其他人的坦率、开明为基础。

换言之，如果成人要使自己得到别人的听从，如果他要向年轻一代传授所积累的知识和发号施令，那么，他自己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如果成人想要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下一代的看重，那么，他就必须为不断的训练和进步、为不懈的自我探索、为自己知识和经验的增长付出应有的代价。看来，这将是通向重建对话和生气勃勃地开展对话的唯一途径。

方法和内容

“学会学习”这句话现在已是人们用俗了的套话，人们把它作为一种最佳的解决办法加以滥用从而使它变得乏味了。但是，它的意义是名副其实的。从此以后，在任何学习过程中，重点不能再放在必然局限、安排刻板的内容上；它必须着眼于理解的能

力、吸收和分析的能力、把学得的知识加以条理化的能力、应付裕如地处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和一般与特殊之间关系的能力、把知和行联系起来的能力以及协调专业训练和学识广博的能力。

在终身教育的条件下，这也就是要用一种方法来武装人们，使他们能在自己的整个求知道路上和文化生涯中得心应手地运用这种方法。这意味着，教育活动，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讲授还是更广义上的教学和训练，其要旨必须是养成习惯和条件反射，获得多种能力。因此，应通过各种方法在完全名副其实的意义上把重点放在能增进以上种种能力的实践上。

在这里，在校外环境中获得的经验也是有教益、有帮助的。不管我们关注的是不是大脑的训练、身体的发育、与其他人的各种关系、口语和书面语的传授、各种语言的译解、对音乐和造型艺术的介绍，我们在校外经验中都能发现大量成就、实验和研究，整个教育能够而且应该从中获益。

培养和选拔

终身教育的发展遇到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选拔的问题。现状是人所共知的：通过种种考试和证书文凭，在教育各个阶段都进行着筛选和淘汰；在教育的结束阶段，在合格者和不合格者之间、在教育制度的“得宠者”和“失意者”之间，这种筛选和淘汰表现得更为尖锐和突出。因此，优劣成败便以一种通常是无可改变和挽回的方式被制度化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那种不恰当地过分偏重德行这种观念形态的制度的缺陷。在以“德”论才的思想庇护下，实际上产生着新的特权，虽然这些特权比过去更加隐蔽，在过去，出身和财富是成功的唯一标准和尺度。

在目前的制度下——其中还有运气和机遇在起着主要作用——机灵的胜过思想迟钝的，智能型胜过其他形式的表现方式和

其他气质，驯顺者胜过革新者，富裕地区的孩子胜过贫民区的孩子。

其次，因考试不及格而带来的淘汰造成了社会资源和现金、人力投资的不合理消耗。而且我们还要充分注意和重视由于考试不及格给当事人以及各级学校教育考试方法影响到的所有的人带来的伤害和情感上的震动：当事人要直接承受它，要经历自己成了边缘人物的苦恼；对有关的其他所有的人来说，这种考试方法则引起了一种严重的精神机能病——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这种病态也祸及广大的家长。最后，在课程和方法问题上的革新和首创精神也受到专横的考试的严重抑制。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可能不考虑选拔、劳动分工和任务分配等等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是有关终身教育的所有思想和活动的一个中心问题。怎样使教育制度保持开放状态？在竞争的压力下，我们怎样才能使工业、农业、政府（更不用说家庭的雄心）的要求，适应我们公开宣称要达到的机会均等和个人按个性、志愿、能力和谐发展的目标？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自然与教育本身有关，与教育范围内的教学过程有关，而且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精神、结构和职能发挥。有一点看来很清楚，这就是：如果我们要根据真正的、有效的民主原则实现机会平等，那么，在学习、资格、训练、专业进修等方面扩大人们的前景就应成为上述问题的必然答案的有机组成部分。

教育过程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在每个人个性和目标的差异性与用来培养个人的方法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照。如果那种方法符合一个人一生的不同阶段，符合他对不同情况必然作出的多种回答，那么上述的鲜明对照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实际上不仅

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可以导致幸运的结果。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在个人自己的动向和他所受的指导之间的对立问题，这种对立常常是深刻的。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人，他思维着、行动着、有欢乐也有悲哀、有进步也有失利；另一方面，在教育这一方面，就好象是一组不同的个人由于偶然的机会被置于同一个模子中，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去协调常常是互不相容的种种需求。在学校、家庭、工厂、培训班或工会所受的教育中，个人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公民，接受着其目标和结果并不吻合的讲授、教导和各种训练。

终身教育是以个人不再与自身相冲突的方式努力统一和协调这些不同阶段的训练。它注重个性发展的统一性、全面性和连续性，由此提出的课程和教育手段就能在职业生活、文化形式、一般发展和个人为了自己的完善、实现自己抱负的种种外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和学习内容之间造成连续不断的交流。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实现体系化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但体系这一概念在这里是用来表示使互相联结的机构和从整体来看互相依赖的教育过程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明确性的一种探索。虽然无论是在学校教育和制度化教育的范围内、还是在校外教育的各个领域内，都已经有许多终身教育的因素，但至今缺乏的还是对问题的全面认识，有了这种全面认识就可能使各类职责分工明确，而且将有助于研究出和准备好结构改革的进程；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结构改革的必要性是人们所公认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个西方国家进行了十多次的努力，均告失败，而教育则变过来变过去，既没有求得内部的平衡，也没有发现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它无疑证明：如果不求助于一种新的教育概念，求助于对教育的重新认识，充分考虑人对训练、教学、进展的不断的普遍的需要，那么，要求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在今天也将是徒劳的。

在任何这样一种概念中，教育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自己的地位，将贯穿于个性发展的始终；基于这种概念，现在把各类各级教育活动加以往往是密封式的相互隔绝的许多障碍将不得不消除，让位给充满生气的、有目的的相互交流。从今以后，就能把教育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赖于其他部分，而且只有在与其它部分发生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如果失去一个部分，那末这个有机结构的其他部分就会失去平衡，而且没有哪一个部分能代行其分担的具体职能。因此，我们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际的成就方面，都必须进行一系列协调工作。



内容、范围和目标

由此可见，终身教育显然并不是传统教育的简单延伸。它包含着对每个人生活的基本问题采取新的态度、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上。终身教育使我们能够理解和认识个人在其中显示出新的意义的整整一系列基本情况；它为影响着个人和社会命运的某些重大问题带来了新的答案。

教育是人在不断的进取中有意识、有计划、有良好精神和物质条件的活动，而这种不断进取是所有人类的规律。我们当然不应过高估计教育在实现某种或某些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坚持认为作出这一努力绝对必要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反复地回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既存在促进个性发展的教育结构，也有抑制个性发展的教育结构。体力上的贫困产生并保持道德上和智力上的贫困，生活在生存边缘的人也生活在人性的边缘。

努力建设一个将保证自己的公民更多和更公平地分享消费品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也就是为了丰富和改善精神生活。只有仍然沉湎于虚幻的理想主义的文明前景的空想家才会认为物质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价值观念是截然分离的。这些价值观念都出自同一的崇高抱负。

文化发展政策以及这一政策范围内的相应战略这两者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提供象样的居住条件，使家庭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也能履行它的教育职能；发展生产力，增加每个人的收入，增加消费和享受文化成果的机会；增加有利于发展社会交往和各种形式的相互交流的物质设施和组织

机构的数量；建立足够数量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中心；以及提供满足求知欲望和熟练劳动力需求所必不可少的所有教学设施——大中小学校和培训机构。

因此，各种形式的行动，不排斥政治行动，是建立能够体现征服自我的不同阶段的组织结构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征服自我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既然如此，任何使政治行动与文化经验背道而驰的尝试和努力都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归根到底是要失败的。

不过，确实还有另一种错误的幻觉，认为改革物质设施和社会结构，即使是渐进意义上的改革，就足以满足个性的所有需要。政治行动对于支配个人需要的基本原则来说是负有多种职责的。说到底，唯一明智稳妥的政策和唯一合理正确的管理制度，难道不是在其原则、目标和方法上充分考虑由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所提出的“以人类为标准”的政策和管理制度么？

论据还不止于此。即使是最好的政策，即使最接近于满足文化人和教育家愿望的政策，也是范围有限的。它能够，而且无疑地必须建立，使个人前途能在有利条件下得以实现的外部环境。但是，它不能，即使是在文化政策的伪装下，声称自己可以代替在方向和表现形式上都独特的具体和创造性的努力，这种努力只能由每个人独立进行。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教育要起一种能帮助人生活的作用，那么它自己就必须是富有生命力的。许多人都被劝说不要走教育的道路，这不只是因为它需要努力、劳动和刻苦，而且还因为除了极少例外，它一直没有能从活的生活源泉中吸取营养，没有能满足生活的需要。

对于十分之九的人来说，教育就意味着学校，意味着性质特殊的、用课程、方法和专业人员体现其内容的一种活动——一个只能用它自己特有的名称“学界”来描述的世界。学校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有入口，有出口。学生进校时穿上学生服，离去时就

脱下。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成人不愿意做这类事情，为什么只有为需要或义务，一般是经济上的或职业上的需要和义务所驱使的人才去做这种意义上的学生。

如果教育要在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我们前边所说的作用，那么，很清楚，首先就需要使它突破学校的框框，使它占据人类活动的全部，既与工作联系起来，也与闲暇时间联系起来。教育不是从外部强加的一种生活的附加物；它象文化一样，同样不是一种可以获取的财产。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它不在“占有”的范围内，而在“存在”的范围内。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个人是教育的真正对象。因此，要十分精确地规定教育的地位是很困难的，也许是做不到的。只要哪里要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或要作出抉择，要克服精神上的障碍，要建立理性的、情感的或美学的联系，我们就能在哪里看到教育的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提出若干特别需要教育行动的重点情况。我们发现它们有时是发生在个人生活中，有时是发生在集体生活中，但更经常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生命的期限

首先而且无疑也是基本的困难，在于人所确立的与自己对生活的期望之间的关系。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的过渡总是伴随着危机，甚至出现强烈的波动。根据个人转入生命新阶段的方式，他就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并继续保持与外部世界和伙伴的联系。这样，年龄也就能表示成败、贫富、欢乐或痛苦、智慧或愚蠢。

单纯年岁的增长本身并没什么重要性，它并不自动地表明成熟程度。在这里，教育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因为一个人是能够加以塑造和培养，从而按照自己发展的节律成长的。这过程中的第一个胜利是，不要虚度光阴，而要把时间看成是丰富和充实生命的一个因素。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一个人就可以探索展现在他

面前的新的领域，收获等待着他的新硕果。这个过程的另一要素是要意识到一个人已经达到的生活阶段的开始和结束。

男人和女人

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会引起同样的思考。没有哪种情况需要这么多的准备，这么多的明智而持久的努力，而且，也没有哪一种情况如此多地依靠机遇和巧合。一个男子向往或热爱一个女子——而且因为他们走到了一起，一切都好象是会百年好合一样，而实际上一切都还只是开始。爱的艺术远远地超出了罗马诗人奥维德及其追随者在简洁诗句中归纳的训诫。这是生活艺术中一个基本的、特别敏感而不稳定的部分，如同这种艺术中的其他各个部分一样，它需要训练。

整个一生甚或其中一个时期的共同生活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光靠相互的吸引和感情是不够的。姑且不说那种必不可少的情感教育，生活伴侣的每一方都必须学会了解并接受对方及其个性特点，把他（或她）看作是异性的一个代表，看作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实体。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情感上的关系并不取消为人普遍接受的社会交往的法则；除非在友谊的气氛中它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下文还要加以评论——在每一对成功的伴侣中，每一方都在品性的各个方面对另一方起一种教育者的积极作用。这种教育行为的基础，如同其他任何一种教育行为的基础一样，当然是相互的关心和对人类本性的多种表现形式的兴趣。

父母和孩子

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象能够损害夫妇关系的那种错觉一样的一种错误观念是，认为只要使孩子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宠爱和抚养他们，使他们尽可能懂得多和做得好就够了。在这里，同样必须有情感教育，这种情感教育与男女

关系方面的情感教育性质不同，但同样严格。家庭内部的交流通常缺乏深刻的理解，而且常常交织着误解。传统的社会不在细微之处浪费时间：礼仪和习俗就足以清楚地明确地表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父亲按权限、按惯例以威严迫使子女尊重，而母亲则赋予孩子以必要的那种温暖和谅解。这些模式至少是一般人都接受的，只在一些例外情况下才不是这样。

今天的情形则刚相反，求助于常规旧辙反倒成了例外。这里并不是要对此加以反对，但它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特定的情景就象家庭里的复杂问题一样，每一种情景都要求有自己的模式和准则，而这又需要想象和创造，也需要利用人类科学得到公认的原则。真正的权威和指导、帮助青年的能力只能以理解方面的努力和对良知的探索为代价才能赢得。

职业

对于教育和职业需求之间的联系已没有多大必要加以强调了。这是终身教育中十分突出、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一个方面。独立的个人、有利于生产率的事业以及整个社会，为了开发经济和社会正义的目的，都把目光转向教育，把它作为提高职业水平的一种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施了无数形式的劳工培训计划。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远未被人们所认识，这就是职业训练和普通教育之间存在的密切而有机的联系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人在发展方面的教育需要的整体性问题。尽管一个人的职业无疑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它在教育方面仍然处于他个人存在的外部。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作出必要的努力，把思考和实践集中在更好的结合上。

只要文化在其含义、目的和实践上局限于文学、哲学和艺术的范围内，或者只把它看作是几乎专门属于闲暇时间的一系列活

动，那么，工人在把思想和创造精神纳入真正的价值体系中去时，就将遇到最大的困难。因此，最重要的是同时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赋予工作这个概念以实际意义，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且是在这个词的最深刻，最真实意义上的文化活动。

自然，这就首先需要有一种规定劳动条件和报酬不再是非人道的生产政策。把劳动活动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出发点，在实践中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引导工人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主要特点和问题获得更广泛更深刻的认识的；而且，所谓的普通教育，也就是学会使用科学知识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只有在它培养了人们从事职业的能力时才能获得其充分的意义，也才能获得最强大的动力。鉴于劳动的流动性越来越增大的前景，如果教育在培养和提高能力这个意义上越是普遍化，那么它的实际成效也就将越大。

闲暇教育

在闲暇这个领域对于教育的一种类似的需要也是显而易见的。已有很多著述论及闲暇在个人、集体、社会生活中的地位。1965年4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当代欧洲成人教育和闲暇问题地区会议”清楚地说明了教育在保证使闲暇有助于人的发展而不是有害于他这个问题上的意义、作用和职能。在这一点上，这次会议的一项建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成人教育是由一系列活动组成的，其中大部分活动是在闲暇时间进行，……同时，它还提供了各种方法使闲暇时间的利用在整体上能更有成效地促进个性的发展和充实；

“……(必须考虑)成人教育的和文化发展的职能(和方面)的多样性，比如职业技术教育、为个人消遣进行的学习、判断的形成、对利用闲暇时间的更好认识、文化成果的传播、对娱乐形式的评价……”。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闲暇和工作并存的问题应该加以解决，同一个人必须始终兼顾生活的这两个方面，而他对其中一个方面的反应方式将对另一方面的内容产生深刻的影响。

艺术经历

尽管闲暇时间事实上并没有垄断个人的文化经历，但正是在闲暇这个范围内，大部分以智力、道德、审美能力诸方面发展为目标的活动都能有用武之地。一个人可以读书、谈话、散步、扩大对宇宙及其规律的了解、看剧、演戏、演奏和歌唱、绘画、写生、朗诵或听朗诵诗歌；通过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个，他一方面能够愉快而有益地度过属于他支配的空余时间，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借以表达自己生命中的基本需要。在这里，光有天赋的智力或反应力或才能也是不够的。智力的或审美力的表现是不以即兴创作为满足的：业余艺术爱好者很快就会达到自己表现能力的极限，会变得厌倦起来，会放弃那种只给了他不多收获的消遣。在这里，如同在生活的其他各个行业中一样，必须以劳动的形式支付必要的代价：知识、表现、交流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对于有志于获得和掌握每种学科、每种艺术形式所专有的语言和工具的人来说，无法逃避学习，逃避锲而不舍的学以致用的。

体育和运动

“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现象，它的根须深深地伸入男女青年和成人的生活之中——既参加又观看，既是训练又是娱乐，既是专业又是教育，既为健康又是文化——体育运动不再与个人逃避现实的空想联系在一起。今后，它将有时作为原因，有时作为结果或只是症状，但总是明显地与当代的重大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未来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青年人在人口中的更大比例、城市化、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中各种公众组织、在新独立国家建设各种组织体制、

利用因劳动的机械化或因失业而产生的空闲时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勒内·马厄先生的这些话指明了体育运动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这样说是再好不过了：今天，体育既无地理疆界之限，也无社会等级之别；它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它为各种年龄的健身锻炼提供机会；它打破了只供专家活动的职业的界限，从而获得了世界性文化的性质。

这同时也提出了一种要求，即现在与所有户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体育运动应在终身教育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对于这一点，要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

首先，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体育运动训练只是在一生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进行的观点。在小学阶段，尽管这个时期有利于心理、生理的发展，但体育运动却经常受到忽视；体育运动训练最常见的是在中学阶段的计划中；在某些国家中，体育在艺徒和大学生的活动中只起无足轻重的作用；而当人们进入成年阶段以后，它就不复存在了。教育领域中这种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插曲、一种次要活动的态度和作法，与它在社会各部门中具有的重要性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对照，甚至也与它在体育管理人员、运动员自己和观众中滋长的不健康态度形成明显的对照。

其次，这一发现应引导我们更好地把体育运动和整体的终身教育结合起来，把它从单纯的肌肉作用、从它与文化隔离的状况中解放出来，把它与智力的、道德的、艺术的、社交的和公民的活动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里，终身教育这个人道主义的和谐观念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支配着教育工作者的全面训练，支配着既有图书馆又有运动设施的大众文化中心的建立。

当我们说到体育的时候，不只是涉及到肌肉和神经、技能和敏锐的目光。正如有一种教育学杂志在最近一期中指出的那样，关键问题是一个人身体的生命成为他整个个性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和支柱的问题。身体有它自己的语言，掌握这种语言就象掌握思想语言或情感的语言一样重要，这些语言实际上都是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而且互相依存的。与身体上各种形式的无能作斗争实际上正是终身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大众传播媒介

个人与主要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电影之间的关系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这里，不存在对视听信息与文字相比各有什么相对的优点进行表态的问题。这里要紧的事情首先是承认这些现代传播媒介的强大力量，其次是清楚而准确地认识教育对这些媒介的责任。只有那种迷恋于用怀旧的狭隘观点看待文化生活的落伍人物，才会否认它们在保证人与世界及其事件和思想、人类天才的多种表现形式之间的交流中的决定性作用。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发现他自己与其他大陆和国家的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成百万听众和观众的日常生活内容中如今已少不了巴赫、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阿姆斯特朗、肖斯塔科维奇、泰戈尔、莎士比亚、查利·卓别林和奥森·威尔斯——这里只举音乐、文学、戏剧方面的几位名人。世界上每个公民对人类的认识在数量上和内容上都在不停地增长。

不管对这些革新成就可能会有什么保留意见——而且也确实有很多保留意见，只有当我们一方面承认传播媒介巨大而独有的优点，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如同大部分重要发明是文明历史的标志一样，它们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造成祸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那些保留意见加以考虑。它们的内容和信息都是有意识地搞得模棱两可，并以各种伪装出现。新的形象、观念和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可以而且常常确实产生爆炸性的结果。此外，尽管传播媒介能够传递文化信息，但内容平庸的低劣之作常与好的作品鱼龙混杂，而且在数量上还常占优势。还有一种已引起人们注意的甚至更为危险的威胁，这就是：广播、特别是电视通过其威力和对大众的吸引力往往占据了用于

闲暇活动的所有时间，从而把阅读、社会交际、积极利用空余时间的活动等等更有意义、更有益于社会的活动都排斥掉了。这些还只是我们日常经验和反复调查所揭露出来的无数消极影响的部分事实。

毫无疑问，政府当局既有责任也有力量在这方面进行干预，以抑制这些破坏性的影响，同时从我们现有的新设施中尽可能地获取所有好处。政府当局必须小心谨慎，从文化和精神健康的立场出发注意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内容和价值。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掺杂着愚昧、鬼怪、恐怖和暴力的节目能对青少年造成多么严重的精神危害和心理危害。然而，当局的力量也是有限度的，这或者是因为它本身也不得不考虑与文化没有多少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审查制度”还不太先进。

说到底，唯一有效的过滤器是这些文化商品消费者自己的良好判断能力、鉴赏能力和在知识上不受束缚的精神。必须鼓励和通过艰苦而系统的教育来训练听众和观众学会选择。他们必须从幼年、从家庭、从学校起就习惯于选择；他们必须习惯于对某种节目说“好”而对另一种节目说“不好”。还必须对用于这种娱乐和消息的时间长短作出抉择。人在闲暇问题上最难但又最重要的训练，无疑是要学会把自己的时间合理地用于工作和休息，用于集体生活和独处，用于学习和娱乐。

公民的教育

最后，在任何终身教育计划中，必须给公民的训练以充分的必要的重视。这里的“公民”一词是把人看作为赋有各种责任和义务的一种公有的实体，他对国家、社区、国际友谊或工会、合作社、大众文化团体、妇女俱乐部等社团都负有责任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普天之下都需要对人进行训练。教育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已常为人们所重视和阐述。一方面，知识和认识的发展有助于确立和加强民主形式的政权和行政机构；另一方

面，民主能得以繁荣和正常实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能有数量越来越多的、训练有素的公民可供依靠，这些公民关心共和国的命运，他们的判断力有广泛的知识作基础，他们能在各种组织体制中、在各级国家生活中履行社会成员的职责。这样一个政权机器的正常运转要求国家的每个居民作出经常的系统的努力，使自己了解而且认真、不懈地研究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公民的投票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又怎么能指望选出的代表是按照他们的能力和对共同事业的忠诚来遴选的呢？

如果说普通公民需要有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话，那么这些素质对于所有担负领导职务的人，如市长、工会书记、企业经理等来说，就更是必不可少、更为重要了。接受公职就要求当事者个人证明自己严肃认真，要求他熟悉工作的各项内容。如果以轻浮来代替这种忠诚，其结果必将是政务混乱不堪。

现代民主政体要顺利开展工作也首先要有新型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哪一级的管理者都应该抛弃那种从远古承袭下来的、每个掌权者都带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众所周知，权力往往易于使人脱离大众从而腐败下去。因此，掌握权力的人应特别警惕，注意克服在理性上和道德上特别有害于他们的职业病。实际上，正是要通过坦率的和自然的方法以及忠于真理的态度才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交流的关系。公民的教育首先要求每个老百姓在自己的领导人身上看到思想民主和行为民主、伦理民主的形象。只有付出这种代价，他才会感觉到自己与国民生活中的问题利害休戚相关，才会对公共机构的正常工作提供思想上和感情上的支持。

终身教育的这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它们首先要作出巨大的努力进行大众教育，使他们承担公民责任、积极参加国家建设，除此而外，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培养和训练，这方面的需要在各级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发展中国家在今后许多年内都将继续感受到这种需要的迫切

性。工业、农业、交通、公共、服务事业都需要很快地培养出自己的经理、领班、技术工人和会计师。尤其要注意培养行政管理人员，他们能够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首先是执行发展规划中规定的措施。如果不作出努力来适应这些需要以进行人员的培训和提高，那么，这些国家的独立自主将只能是空洞的口号，而它们的经济也不可能在可计量的时期内达到起飞的程度。



关于终身教育战略的建议

要提出一种模式的终身教育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制、结构，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禁忌，自己的便利条件。而且，历史的进程总是这样：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上，任何时候总是有一个问题在重要性上超过所有其他问题而必须予以优先考虑。比如，我们可以设想，而这实际上也是发生了的，一个国家在发生革命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会用主要的力量来发展成人教育，而同时把其他教育问题或多或少地暂搁一边。资源的相对缺乏使人不得不进行选择，不得不作出牺牲。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们缺乏合格劳动力与物力，就和缺乏财力资源一样。

尽管如此，阻止理想计划实现的障碍，不应影响这些国家根据终身教育原则所阐明的主要方针来寻求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些原则就是：

- 要保证教育的连续性以防止知识过时；
- 使教育计划和方法适应每个社会的具体要求和创新目标；
- 在各个教育阶段都要努力培养新人，使之能适应充满进步、变化和改革的生活；
- 大规模地调动和利用各种训练手段和信息，这种训练和信息超出了对教育的传统定义和组织形式上的限制；
- 在各种形式的行动（技术的、政治的、工业的、商业的行动等）和教育的目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多种多样的模式，这些模式都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方面，但都服从同一个条件，这就是使教育成为生活的工具，成为使人成功地履行生活职责的工具。

同时，提出以下一些一般性建议也许是有益的，希望它们能有助于有关人士确定行动的目标和方法。

趋势

前边已说明了目前出现的两种主要趋势，一种是面向成人，一种是面向儿童和青少年。下边我们再就扫盲和终身教育之间的关系补充若干意见。

面向成人的趋势：

非政府性教育事业的活动的决定性，这不只是因为需要考虑思想的多样性和情况及利益的差异性，而且因为革新和研究的精神只有在独立和分权的情形下才能充分发挥。教育领域的思想和实践在最近几十年内不断地得益于一个阶层的贡献和成就，在这个阶层内，个人利益和供求的力量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这样，国家对关系着民族根本利益的那部分人来说是不能漠然处之的，而实际上它也确实已在一些领域开始显示自己的作用，即使在规模上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无关。这里，我们只需列举几个这样的领域，如果成人教育要在数量上和效能上得到必要的发展，那么国家就必须在不同程度上、以适应每种具体情况的形式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

财政：

在大部分国家，成人教育仍处于经费拮据的局面。提供给大、中、小学校以外各类教育的经费在政府为满足个人的训练需要所支出的资金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承认成人教育的价值、重要性和采取行动的迫切性的每一项官方声明都因预算的问题而年复一年地无法实现。当然，要政府当局承担大众教育的全部费用是不可能的：这从国家资源来看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承认成人必须通过各种主动行动，包括分担经费的行动来促进自己的教育的话，完全由政府负担经费也是不可取的。但是，个人和团体的集资总是而且以后也仍将远远低于教育的目标所需要的数额。因此，政府的大规模参与是不可避免

的。这种参与或者是采取对需要政府参与的地方直接投资的形式，或者是采取拨款支持私立团体的行动的间接形式。这就需要政府当局理解由非政府团体完成全国性任务所造成的一种复杂情况，这些任务是政府无法以同等能力和权威来完成的，但又注定需要靠政府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就象提供给其他教育活动那样。

立法和行政：

成人教育的发展遇到了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来自占人口很大比例的那部分人的生活条件——而正是这部分人与成人教育的发展确实密切相关。

如果未来的新社会要能够重视人的基本需要，那么它们就应最大程度地注意人的教育需要，有些是我们在前边已提到了的。

就结构的一般情况而言，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工人和农民中某些人的极为微薄的收入会把这些人的思想限制在生计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这些只知道为生存而斗争的人引上文化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将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如果不是伪善的话，那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从个人和整个社会来看，要为文化进行斗争就必须首先努力争取提高工资、改善住房、交通和卫生条件，加强法律和正义等等。

现代新社会的这些目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的明智而有效的参与，而这又需要在数量上扩大教育事业、职业范围、公民教育、文化设施，那么，情况就尤其如此。

尽管这样，不必等待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必要而可行的办法是在近期内大力加强立法性和行政性措施，以克服前边提到的那些障碍。这些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工人参加事业管理：

这个优先目标有它的政治经济内容，但也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方面的意义。吸收工人参与管理本身就是为了培养责任感（这是

成人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也为了增进对文化教育事业和对经济的了解。真正的参与是打开现代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的钥匙，从组织体制和形成动机的角度建立了行动和知识之间的联系。

工作时间的调整：

文化教育活动都要消耗时间。除了在极少数国家以外，工作的组织方式都是用时刻表把公司职工紧紧地束缚起来，而这种时刻表又总是要求过度而不合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除了在生产和管理的效率问题上的考虑外，还涉及到心理学的和其他与习惯和行为有关的问题。因此，从其重要性来说值得加以系统的研究。

事业范围内的行动：

所有企业都认识定期更新生产设备的必要性，把它看作是在正常投资和生产能力等范围内的一项措施。但是，同时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使各企业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职工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更新和提高是与经济措施同样迫切的事情。进一步培训工程师、技术员或管理人员的是充实和发展集体事业的一种形式，完全让个人来承担这种培训的经费是既不公平也不能胜任的。这是需要从各方面加以认真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它应成为立法和行政措施的一项内容。

在必须进行的革新中，应十分重视已在某些国家(大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种措施，这就是把用于专门教育活动的时间列入正常的工作时间表中。还可以设想攻读发给文凭课程的职工每年应有若干天(或若干星期)的假期，供他们在考试之前使用。

国家可以在全国性的教育事业中树立落实这些措施的范例，因为这些措施为职务晋升和参加文化活动方面更大程度的机会平等问题提供了答案，同时又鼓励提高效率的要求。

设备：

教育工作是与文化发展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尽管由于目前人们思想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的结果，必须越来越重视自我教育，但事实仍然是：在成人继续受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必须通过适当的机构不断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和给予鼓励，从而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帮助。

这里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建立尽可能综合性的、向各方面的人开放的新机构：离用户很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文化中心、职业培训学校等等。二是鼓励和推动有关方面利用现有的大中小学等机构进行成人教育。就后者而言，由于对教育行为缺乏一个全面的认识，可供国家支配的一系列手段和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浪费掉了。因此，今后所有的学校建设计划都应以对教育活动的全面认识作指导，这种认识也就是促成联合王国建立“乡村学院”、法国在耶雷建立文化中心的那种精神。如果把这种原则应用于广播和电视这样的主要传播媒介，上述主张就更加合理了，因为国家对这些传播媒介常常处于近似垄断的地位，而这些工具如果利用得当就不但能成为传播信息的强有力工具，而且能成为教育和训练的强有力工具。

服务：

政府当局所处的地位有条件能够提供大量的服务，而且有些当局也确已开始这样做了，虽然其服务工作的规模还很有限。除了上边已提到的直接的财政支持以外，当局还可在两个优先考虑的方面采取有力行动。

人员培训：

经验和研究表明，成人教育不能走以儿童为对象的传统教学法的道路。只有当负责成人教育的人经过了心理学、社会学、技术和教育的专门训练，认识了如何去适应成人的动机、吸收能力、发展需要，为成人设计的教育计划才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达到预定目标。这些问题很重要又很复杂，超出了大部分私

立机构的能力范围，只有国家才能以所处的地位来合理地满足有关要求。

某些国家已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培训机构为解决上述问题找到了一种方法；但是，当局主要关心的常常只是运动和体育，有时严重影响了青年和成人其他方面的训练。

这里，又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团体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尽管只有政府部门才能调动充足数量的行动手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大众教育界取得的经验所起的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作用，这些团体在行动上总是更自由，所处地位总是更能体现成人的多种愿望和需求。

研究：

如果训练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那么，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它必须不断地吸取人类科学的成果。在这方面，国家所处的地位比私人团体更有利，它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来增进知识并推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为全民族继续获得教育这一巨大事业中的应用，这些学科在促进成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面向儿童的趋势：

不管为促进成人教育而开展的任何运动有多大的广度和深度，都只有在采取了同样坚决的行动来改进为儿童和青少年设计的普通教育阶段的结构、课程和方法，才能取得成功，因为成人教育的主要力量是成人自己，他们一方面有自己的倾向、能力、愿望和动机，一方面又有其他的障碍和各种困难、弱点。同时，由于成人受到所过生活的影响，所以他们实际上保留了过去儿童时期的种种特点。这样的结果是，如果成人在早年所受的是使他们厌恶学习、不求上进的教育，或者这种教育没有充分培养他们形成继续教育过程所需要的坚韧性，那么，从成人教育这个角度来看，他实质上就是一个已告失败的人。

这里不拟评述目前在大中小学进行的训练的内容，只需说一

点就够了，即：这种训练是建立在大部分按贵族社会的要求而确立的古代模式基础上的；此后，对它们只作过一些小的修修补补，至于根据现代社会新的目标来检验普通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则没有作过任何努力。这种教学的缺陷和弊端正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这里只需回忆一下前边已作了较为具体分析的问题，即这种教育是基于对个性的一种短视的认识：获得知识的能力被放到比情感、社交、审美、身体诸方面发展都重要的地位上，没有考虑到个性的差异，那些不符合模式的学生也就同发展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一样成了不受重视的边缘人物。选拔的需要压倒了训练的要求。以智力投资和货币投资中毫无意义的浪费作代价换来的是制度化的失败。这些问题还只是显示出各种衰竭迹象的许多体系的一部分问题。为了根据理性和效率的标准确立新的教育形式，为了使这种教育形式不再伤害人类的本性，现在是进行不懈斗争的时候了。

从成人教育来说，这种旨在改革初等教育的行动既有好处也有缺点。主要的好处是能够借此制订一系列法规、章程和各年级的教学设施。但这些复杂的大量工作本身也会成为一种障碍。我们怎么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怎么改变人的思想状态和职业兴趣？比如，我们怎么去协调训练的要求和选拔的需要？对这些问题既无现成的答案，也无解决的捷径。我们在今后还是面临着一种教育危机，这种危机尽管有其消极面但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为建立新秩序所作的探索能遵循的那些途径。

教学的人格化：

如果教育要有意义，那它就必须使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得到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应是他自己志趣、倾向和能力的一种作用，而不是让他按一种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对象即学得快而且对学校制度顺从的“天才学生”的既定模式来发展。

重视方法：

既然我们承认所有知识都具有相对性，那就自然应在教育过

程中集中注意获得知识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教学以及诸如绘画、音乐、歌舞、形体训练等艺术表现手段。

学校的职能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教会学生学习”，其方法是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组织工作的能力、在分析和综合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同时鼓励他们养成对话和参加集体工作的习惯。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还应考虑在各不相同的学科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综合利用科学的和文学的方法。

与日常经验的联系：

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未来的成人承担生活的责任和义务，接受变革和各种形式的智力和文化的冒险活动，适应社会习俗、道德观念和理论学说的迅速变化。这意味着要确立以下这些目标：

- 把有关劳动的价值观念列为现代生活中的文化主题；
- 通过解释和介绍有关社会结构和各种关系的正确理论，引导学生参加某些法律和经济领域的活动；
- 积极应用传播知识和娱乐的主要媒介（电影、广播、电视）；
- 经常注意阅读（学习诗歌和哲学的语言，速读问题等等）；
- 传授生活的艺术；
- 发现和吸收人类各种伙伴关系（对话、异性交往、互相帮助等等）的价值观念。

扫盲与终身教育：

扫盲为终身教育概念的正确性提供了最好说明。这种说法需要加以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充分的事实作依据的。经验表明，哪里的扫盲工作取得了成果，就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把它当作在全局中持续地起作用的因素来对待。

我们在这里不拟再陈述实用扫盲教学的原则。只需回忆一下这样一点，即这种扫盲体系有赖于对传统类型的扫盲运动的缺点和不足进行认真的分析。对于成年文盲来讲，最常常出现的情况过去是，现在仍然经常是别人只教他们读、写、算的基本知识而不顾他们生活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也不考虑他们已获得知识的效

果和未来的用途，而只假定各个成人的个性由自己掌握。这样的教学常常基于一种抽象概念，脱离其深刻动机，于是就蜕变成一种所谓的文化“范围”和文化、正义与平等的任定概念。

在实用性扫盲方面，已取得坚实的进展，得以在具体的现实中认识人。现在，教育过程的主体已变为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这就标志着在把教育理论与实践运用到扫盲工作上前进了一大步；首先，它表明生产劳动在任何现代的和现实的文化概念上的极端重要价值已得到承认。因而，人们承认生产劳动是一种关键因素，通过它，世界才能达到一种人性的境地。

具有实用读写能力的成年人才是一个能够积极参加对世界结构和生活条件加以改造的人，他可以在社会发展总的计划以及在建设国家密切相关的政治目标上发挥作用。于是，他便在集体演变的具体现实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现实不仅决定而且保持了作为个人自身发展的要求。

然而，实用读写能力这种观念的确定和发展同时又包含着创立某些新方法和抛弃各种陈腐偏见和信条。与人们通常的观点相反，读写能力并不一定是教育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在以提高人的自觉性为目的的行为和事业的结合中占有自己的地位，这种结合同时还向人们提供为了表现自己、为了交际、为了精确地得到知识和揭示现代科学王国的奥秘所必需的智力素质。读写能力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无可替代的手段。不会读和写，通向学习和参与文化生活的道路就完全被封死了。

与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相反，读写能力是一种涉及到传递思想感情的复杂手段——如形象或语言，它存在于一种特别高水平的抽象之中。与其它相比，对于那些要坚持受益于它的人来讲，这种独特手段的效用并不能立即就显现出来。只有根据对感觉的途径、对符号的识别和对信息的吸收的认识基础上完整的成人教育概念，只有基于清楚地认识到对存在于成人理智和情感的经验中不同成分之间的联系与结合，才能使读写能力的教学在教育过

程中，在恰当的时候充分发挥其作用。人们不能过于强调这样的观点，即读写的价值，象其它手段的价值一样，仅仅是相对的，读写能力只有作为社会、经济、政治还有教育的结合的一部分时，才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和用处。

获得读写能力不是掌握一种交际工具的唯一和基本的过程，它也并不意味着只是得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它的真正意义是从一种类型的文明走到另一种类型的文明，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从口头文明及传统和风俗习惯走到一种书面文明，后者有其自己各式各样对遗产基础的联系、革新与改造以及感觉与思考的合理方法。同时，它是从自我封闭的社会走向必然向世界开放的社会。它的意义常常是难以估量的，在短期内是如此，在中期和长期也肯定是如此。

因此，终身教育的目的和组成成分就在所有与扫盲教育有关的行动中牢牢扎根，而这种结论对终身教育的论点十分有利。换言之，如果扫盲要完整地 and 有效地发挥其作用，那么它不可避免地要与成人的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关系。

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从长远观点看，终身教育是以按前面各章阐述的思想与行动全面而彻底地改造教育制度为其先决条件的，这一点已经愈来愈明显。这项任务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其最终目的就是达到一种对于人性和人的愿望更加尊重的更有效和更开放的社会。

然而，考虑到所有的先决条件绝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具备，因此不能等到这样一个社会的所有先决条件都具备之后再采取行动。

因此，现在正是采取各种措施来满足目前的需要并有助于使制度朝着保证终身教育得以实现的结构方面来演变。

从近期的情况来看，一项合理的教育政策，要达到以下目

标:

成人教育的发展:

1. 由于本书第一章所列出的一系列挑战所产生的教育方面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2. 如果没有精心安排的成人教育结构网,那么,就不可能对学校教育进行认真的改革,因为需要向学生提供百科全书性的知识。

3. 成人教育为最终决定一种不拘泥于传统型式的教育结构与方法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室。

4. 成人教育对于在教育领域有决定性发言权的个人,即家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够达到改造其教育对象智力和行为方式的程度。

5. 成人教育使各代人之间得以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教师的培训:

在任何终身教育的体制中,对教师的作用必须加以根本的改变。教师作为知识传递者所发挥的作用在重要性和影响两方面都将消失;由于他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这项任务移交给技术媒介,就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他作为教育者的作用将要加强。人们不久将会承认这样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即象孩子这样宝贵的具有各种性格与希望的教育对象,竟然听任个人——教师去安排,而这个人却不具备完成这项棘手的任务所要求的能力。一个孩子并不仅仅是名册上的一个数字、一个好学生或坏学生、在算术上或在语法上没有才能的学生,他首先是一个具有个性的人。他有自己的心灵、他的社会学意义、他在一系列事物中的地位、他的冲动和抑制,有些道路向他开放,而有些则对他封锁。对孩子拥有这么大支配权力的成年人没有能力去理解孩子、理解情况与他相同的人,不去指导而是去裁决,不去找出在每个人身上的长处而是去惩罚他们的每个缺点,这种状况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所有这些要求彻底的理论与实践准备,包括普通心理学和智力

研究以及在整个社会的广泛意义上和在集团社会学的狭隘意义上的社会学。这里所需要的是，为了使教师完成其任务，要立即开展对他们必不可少的最低程度的培训，以便消灭浪费并为终身教育打下基础。



集体的事业

研究

倘若说每个人的一生真是一场不停息的斗争的话，那么，是使未来的成年人从入学开始一直为将来的竞争做好准备呢，还是与此相反，在各个后续的阶段，以各种不同方式的训练来强调合作和相互联系好呢？在个性与命运相互冲突的这些要求之间，可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吗？如果可能，又如何达到和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呢？

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不管他是负责教务还是从事实际教学工作，都肯定会遇到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教学的总方向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还有其它许多同样尖锐的问题：

- 什么是个人目的与集体目的二者之间的真正平衡？特别是具有能力和希望的个人的训练需要应当如何与选择的需要相协调呢？

- 我们怎样才能使对人格化教学的需求（考虑到个人的所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重要性在本论文中通篇都得到了强调）与人性的普遍特点和它对相互交际的需要这二者等同起来呢？

- 一旦我们不采用百科全书式的教学而把重点放在了方法上，那么，我们应当对课程的不同内容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对个性在其本身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来讲极为关键的科学、文学、哲学和历史所共有的衡量事物的标准是什么呢？

- 在得到必要的训练、尊重外部机构和个性的自由表现之间，应当寻求什么样的平衡呢？

在某项训练之中，游戏娱乐活动与学习二者之间应当各占多

大比重呢？

- 有没有对一般的训练最适宜的时期或对语言、数学、工具性技能等具体学科最适宜的时期呢？

- 什么规律支配着个性发展和智力、敏感性、社交性等等方面的发展阶段呢？

- 构成各种类型的教学与训练基础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呢？

- 在教育过程中，学校教育、校外活动、所谓的“平行”学校、家庭、车间等应当各占多大份额呢？

- 教育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来考虑人力需要的前景呢？

- 对就业机会问题应给予何种重视？

教育工作者知道某些答案，或者无论如何也是现行各种教育制度所提供的各种答案（明确的或含糊的）的解释者。每个教育工作者，不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衡量事物的标准。但是，这些官方的或个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解决办法的主要根据还只不过是传统、风俗习惯、思想与方法的遗产以及对教育问题的一种纯经验主义的了解。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因素，实际经验的价值以及工匠们根据自己工作情况传授业务的想法都是别的东西所不能替代的。然而，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起作用的因素之复杂、采取或考虑新的解决办法的必要性，所有这些因素今天都要求比主观意见或个人经验所能够提供的更为坚实的基础。即使在方法上已采取各项预防措施，即使在对建立制度的迫切要求上作了各种必要的修正，倘若我们想把终身教育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那我们就不能回避超越意见的范围和建立一种科学的必要性。

除了教师的各种经验之外，还必须加上人类科学无可辩驳的事实。在确定其目标、课程计划和方法时，教育不能没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重要贡献。只有心理学家和专门的性格分析家才能明确地说明人格发展的条件和时机，而这对教育工作者是十分有益

的。只有他们才能提供发挥着作用的那些精神力量、智力障碍、适应的困难等方面必要的资料情报。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将说明教育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无论是作为一种产品还是作为一种因素的作用。谁将精确地计算出从教育行动中可望得到的收益呢？（不论从它本身，还是从它与其他形式的投资之间关系来看。）艺术家、诗人、作曲家、科学工作者以及所有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们的经验，也都必须加以充分的利用，因为它们能提供最有价值的证据，说明任何性质的产品的制作与人格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

倘若要使人们所期望的新秩序形成和成为一种现实，那么，就有必要动员各种力量，智力的、情感的和实际的以及所有的支撑整个社会大厦的力量。

在工厂、田野和办公室所取得的经验，在制订教育理论上将具有决定性作用，就象哲学家的聪明才智、诗人的灵感以及科学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果一样。

如果人们承认这些见解的正确性，那么，对教育的讨论既然涉及到人格的这么多方面，影响到社会组织的那么多成分，而今后却只靠从事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去做，那就越来越不可想象了。这是集体的事业，所涉及到的各界人士都必须不仅共同从事研究工作，而且要共同参加决策。

教育的功能

毋庸置疑，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是有人，不论是男人或女人，要以教学为职业。教育将继续为人们就业开路，而要就业就需要专门的训练。要向孩子进行教育，要实施任何一种训练课程，教师就必须掌握若干种技巧和取得必要的资格。此外，除了他们所发挥的教育者和训练者的作用之外，教师还要为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即当父母做工作或搞家务的时候，照管儿童和青少年。

然而，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变化，还有它们可能出现的进化，都不能不对教育工作者的功能有所影响。

既然承认教育已超越传统上强加的限制，特别是在教学上的限制，那么，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某一时刻和某些条件下对教学和训练负有职责的任何人都是教育工作者。显然这是教师的职责，但它也是医生、牧师、工头、工程师、农业示范者以及政治、工会或合作组织负责人的职责。家长就首先是教育工作者，而且今后将更是如此，而在承担此类职责的其他人之中，即使他们本人经常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把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人员和主要主办者包括在内，他们通过广播、报纸、电视和银幕，对塑造思想、心灵和精神的贡献极大。

现代社会所有的这些部门和人物，构成了教育工作者的宏伟队伍，使社会可使用的训练方式大大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有资格以适宜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职责。阻碍其子女发展的愚昧无知的家长，大有人在。也有许多医生只把病人当作一种医学病例，而不把他们当成需要指点和引导的人。还有许多电台或电视台负责安排节目的人，他们根据观众和听众中的最低的标准，通过迎合其兴趣和个人利益，通过走捷径，来使他们满意。

为了个人及社会的教育发展而调动和动员了这么多的手段，就会引起良心和能力这两个问题——这里所使用的“良心”一词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理智上的承认或对事实状况的认识，对教育过程的认识；另一方面是道德上的承认或对于由不同方式的行动所包含全部后果的职责上的承认。但是，能力也是必需的：必须明确认识所要达到的目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哪些对人性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什么有益什么有害。难道我们不应当从所有这一切得出结论，“在今后，教育的才能应当构成每个人部分训练内容，唯一的原因就是，作为一种普遍规律，每个人都要嫁娶，都要抚养儿女”吗？讲得更具体些，情况看来很清楚，现在教育理论和

实践已经成为属于现代社会的任何个人进行培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其职业使他对别人具有影响、权威和责任。

在这个集体的事业范围之内，所有这些教育工作的参加者，不管是专职教师还是其它人，都最好长期保持交流和协商，互相指导，从彼此的具体经验和贡献中共同受益。终身教育可靠的和生机勃勃的结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形成。

向教育社会迈进

终身教育发展的逻辑预示着社会结构将朝着有利于个性发展的方向变化。本书的各个部分，特别是在阐述终身教育战略的那一章，已经涉及到了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是，在本章由于强调教育事业的集体性质，以及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我们就不能充分地强调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突出作用。实施终身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政治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将涉及到国家组织的所有部分。

结论

终身教育仍处于概念阶段。正象自由、正义、平等各项原则一样，它无疑会与具体的成就长期地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正是概念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倘若距离太大，如同刚才提到的其它概念所常常出现的那种状况，那么，人们就会对它产生怀疑。人们说这个概念意义含糊、不定形、不精确并不缺乏理由。倘若一种概念打算在人们毫不关心的情况下产生并显现其真实面貌，关键在于这种概念应当反映在能从中汲取力量的事实与行动之中。只要有关终身教育的分析基础不是参考和研究一系列涉及到形势、结构、计划，简言之，涉及到所有被人们恰当地称为“具体事物”，那么，要取得群众支持其基础到现在还大体上是理论性的论点，就将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并不否认，终身教育离完全达到其目标还相差甚远。但某些力量无疑是在起作用。人们并不等待理论家们表达他的观点或等待委员会提出建议，就着手讨论适合于事物和人变化过程的教育形式。在许多个人和集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应用于新情况的解决方法中出现了大量新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在推动着新教育概念范畴的形成。终身教育不仅已经变成人们所向往的，而且已成为可以实现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新的道路已经打通。倘若人们未能得益于成人教育和更一般地说由校外的培训方法所作出的显著贡献，倘若各国并未建立起通过广播和电视广泛传播信息的网络，倘若通用的讲课工具不能唾手即得，那么，我们有关终身教育的想法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无疑迄今尚未形成。与此相反，这项事业今天是有可能会实现了，并且今后终身教育必将大有希

望。这种希望是建立在相信人和相信人能够成为对自己思想、感觉和选择负责的成年人基础之上的。——当然，先决条件是他的创造力没有被带有敌意的世界也没有被对人的创造力和干劲毫不尊重的训练方式所消磨掉。



第二部分

论证和实例



与终身教育相联系的各项目标

具体的人

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

现代的人是抽象化的牺牲品。各种因素都可以分割人，破坏人的统一性。譬如说，把社会划分成阶级；工作分得很细，使人既看不出生产的结构，也看不到生产总的目的，因而无法确定他自己在生产中所处地位；体力和脑力的对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类人之间的悬殊差别；不同思想意识的冲突与集体主义神话的破灭；肉体与精神、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的矛盾。

人隐设在他自己的光怪陆离的形象之中，隐设在变化无常与彼此矛盾的形势、潮流和定义里面。教育事业，按照原来的计划和实际的作用，特别是采取教学这种方式时，大大促成了构成人格的各个部分的彼此分离。为了教学的需要，人的某一方面，例如以认识形式而出现的智力方面，被专横地孤立起来，而其它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略，或者退化到一种胚胎状态，或者是杂乱无章地发展，从而破坏了个性的平衡。

为了满足考试的需要，最初的抽象化又深入了一层。这就是不承认真才实学及其独创性，而是采取不断地打分数的方式，把智力表现与别的表现加以比较。用数量代替质量的现象屡见不鲜。儿童变成了评价的对象，因而他的发展也就被一种狭隘的和武断的观念所压抑与阻碍。

儿童从极小年龄起就在这种环境中参加竞争，这种情况也使得人类经验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狭窄。交流、对话、交际和相互补充知识，对每个要彻底地发挥其才能的人来讲，本是不可缺少的

活动，现在也都简化到不能简化的程度。

教育的经验甚至扩展到有损于工作、游戏或情感交流之类的其它形态的经验的地步，在年轻人已经具有自己的感情和行动能力的时候，仍然把他束缚在一种人为的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造成不可医治的创伤，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人们发现，按这种方式教育的年轻人在适应外界和与其它人建立起恰当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上，往往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他这个人的某些精华部分，不是变得枯萎了，就是暂时麻痹到好象他没有教养的地步。

正是为了与这样一种制度作斗争，为了补救现代文明的弊端，才奠定一种新教育的基础。这种新教育的对象就是具体的人和他的实际状况。这样一个人的特点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的成双结对的倾向，在这些倾向中，既有相互补充，也有相互矛盾。

教育的目标就是要适应个人作为一种物质的、理智的、有情感的、有性别的、社会的精神的存在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范围。这些成分都不能也不应当孤立起来，他们之间是互相依靠的。

作为个体的人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查：一方面是把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考查；另一方面是从他与其他人，与社会的一般关系上来考查。他既是孤立的，同时又是与别人联系在一起的。

见义勇为，合群互助本是人的天性；消极退避，竞争角逐并非人所乐为。

人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当他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象社会的一员那样行事并且与其他人共同分享社会、阶级或国家的情感、传统和生活方式时，他就具有特殊性；当他能够在人的千差万别的表现方式中看出人类的共性，他对其他人、其他种族和民族有一种友谊感并且具有一种世界观的时候，他就具有普遍性。

他既是专门家又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应用其专门知识来增加对思想与行动的其它领域的理解。

他不失其赤子之心，而且拒绝接受成人生活的已有模式。

他反对形形色色的陈规陋习，而拥护进化与革新。

他日益变成自我教育的对象。

他毕生珍惜光阴，认为时间是挚友而非仇敌，从而能做到自强不息，充满朝气。

他是生活和运动的体现，而不是稳定、停滞和怀旧的化身。

适应性

只有当变化迅速的时候，人才能觉察到它。每个人在观看电影表现植物生长的时候，都能证实这种情况。在电影中——通过把植物生长阶段人为地缩短的方式——植物的生长就好像是动物身体在动一样被人们看到了。然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变化并不能被人们觉察出来。

这正是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工作方法。他们省去了许许多多的细节情况，把实际上时间相隔很久的片断连接在一起。他们描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一天的事件，一个君主政体的出现，以及追溯文明进化的历程，都用的是这种方法。

在人的一生中，变化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觉察，而且很难抓住。原因是变化来得很缓慢。大体上说，一个人的一生是在他童年的体育、智育和德育的环境中度过的，只有当他遇到战争或革命之类的重大转折点时，才会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他必须适应这个世界，否则，他就要冒消失、经受折磨和变成精神失常的风险。

这后一种情况在好多世纪以来还都是一种例外，但现在对人类的大部分来讲，却正在变成一种规律。人们已多次描述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变化的幅度和在世界上正在集聚着的改造力量。关于这个题目已有了整整一套文献。现在，人们已经肯定：每十年，有时甚至是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人遇到各种各样的

社会变革，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涉及到他们的性格的许多方面。在许多学科中，特别是科学领域，知识从来没有处于稳定的状态。新的发现与新的理论就象汹涌的波涛一样把那些牢固树立起来的旧观点彻底淘汰掉。各代人之间，儿女与父母，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也都处在一种不断剧烈变动的状态之中。在今天，“成人”的概念本身就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同样，权威的地位与作用、传统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风俗习惯、观念和意识形态，也不断地消长起落。过去有助于使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稳定的因素之一——人的专业也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技术进步和变革如此迅速，使无数的工作人员深感到接受再教育十分必要，他们甚至必须预料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要经历若干次变动。其结果就是，变化和它的实际影响，现在不仅已被每个人感觉到了，而且也被看作是多数人的一条基本经验。

人们被这种无情地把我们抛在后边的运动所击败，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原因大多属于情感方面，因为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的旧习惯。人们很自然地依恋于他们所了解和有关系的事物。熟悉的环境会使他们消除疑虑，变化的经验则常常使他们苦闷、懊悔和怀旧。在知识分子层中，他们往往在知识和信念方面把相对和暂时的事物看作是绝对的和永恒的事物。

既然如此，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个极度痛苦的状态之中，这就不足为怪了。从他们的童年，家庭生活和在学校读书的日子起，他们就已经习惯于在寻求传统中确定的知识以及得到家长及智育和精神上教师两方面权威支持的知识中感到安全和稳定。只要未来基本上已被他们的前辈的经验所预示，只要前进道路已有人先替他们开拓，未来对他们似乎并不可怕。但是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异乡——一个冷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连自己也都不认识了。

倘若现代人要想从他们的极度痛苦中解脱出来，要想使未来

对他不构成威胁，他就必须在对生活的看法与态度上，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与变化。要建立一种新的时间观念。不能总是把它看作妨碍人的一种消极因素，看作人的仇敌，而应当把它看作使人的经验得以总结和发展的积极因素。对生活的热爱正是靠的这一点，而它自然就意味着要经受各种风险的考验和喜欢冒各种各样的险。

教育在养成这种看法和态度上，是有巨大作用的。教育的作用正是把人的思想引向过去或未来，引向僵化状态或不断变动的状态，并变成运动的一部分从而发现真正的安全。

正如我们在前边已讲过的那样，科学方法是现代人文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它的发展是使人接受革新所必须准备的条件。科学是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个世界在各种力量的影响下充满着结构和形式的不断的激烈变动。

创造性的发展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人们承认淘汰和更新是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并且欢迎它们，个人的或社会的创造性活动才可能存在。

然而，以积极接受变动为目的的教育还包括另外一个特别成分，即历史的方法。重新突出时间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现代思想进步的基本标志，这正是它与倾向于同一和永恒的古典态度的基本区别之所在。历史思想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所有的知识，不论是生物学、艺术、观念形态领域的知识，甚至智力机制领域的知识，现在都被确定在一定长度的时间范围之内。但是，这种方法至今尚未被教育所接受。

时间，正如现在人们安排课程那样，只被考虑为某种课题，涉及人的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连续变更，特别是学生所属的那个特定国家的世代更迭。这样一来，主线往往被丢掉了，这条文明主线就是要象重视朝代延续和军事征服一样地重视人的作用。然而，所有的教学都应当用一种历史的观点来进行，要为变化作准备，看来这是特别重要的。只要不讲发展，不讲发展的各个阶

段，那么，不管是科学、文学、艺术或各种语言学科，这些单独的主题都不能表现出它的真正意义或产生出充分的教育效果。正是在活动的思想，既有破坏性又有创造性，必须在其广泛、多样的表现形式中加以说明和为别人所理解。

对变化的适应性只有通过尽可能最普通的教育才是可以想象的。不得不应付不间断的多种多样的革新，这是现代人命运所注定的。现代人的职业以及他本身的知识、精神和情感诸方面都是如此。过早地向他提供过于专门化的训练，显然会给他带来危害。

专门化的训练，受到其目的的限制，可能会大大妨碍现代人获得对这个变动的世界的真正的和广泛的理解，大大妨碍他参与政治、社会 and 职业活动并从中得到发展。然而，为了向他提供必要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使他吸收现成的知识，而是要使他为了研究和发现而作好知识上的和精神上的准备。因此，适应性是与科学推理、创造性和社会义务紧密相连的，这些正是构成每个人的个性平衡发展的主要基础。

以愉快为目的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愉快吗？倘若我们把愉快看作是一种固有的现实，看作是我们可得可失、游离于我们本身之外的一种东西，那么，教育就达不到这种目的；倘若我们把愉快想象成是一种存在的方式，那么，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愉快。对世界的感受与理解，人与时和人与人之间，都有愉快与不愉快的不同感觉方式。

倘若愉快或不愉快是依靠占有或失掉一种对象而定，不管这种对象是汽车、玩具、钱财之类的物质财富，还是象获得某个人的爱或公众的尊重之类的精神财富，那么，教育同这感受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这种情况教育是无能为力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实现这种奢望中起不了作用，而且还因为这种为达到愉快所采取

的途径，正如人们从经验中所体会到的那样，到头来是既无结果，也无意义。但是倘若把愉快看成一种存在方式和人度过一生的方式，那么，教育就与此息息相关。愉快与教育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说，除去来自教育过程的愉快之外就没有真正的、可靠的和永久的愉快。斯宾诺莎说过：“高兴是人从一种不够尽善尽美的状态向尽善尽美的状态的过渡；悲伤则是人从一种尽善尽美的状态向不够尽善尽美的状态的过渡。”倘若我们要用愉快来解释高兴，那么，我们便得出这样的答案：愉快是与行使能力和感觉能力紧密相联的。让我们再讲得明确些——能力，就是指真正的能力，不是欺骗的、离间的和控制别人的那种危险的能力，而是名副其实的能力即自我控制的能力。倘若具备了某些条件，那么，这种愉快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努力，使他一生中有充分时间表现出自己是在“控制”之中。当清醒胜过错觉、知识战胜愚昧、希望超过绝望与沮丧、信任压倒怀疑和猜疑、友爱和谅解盖过仇恨和厌世、慷慨和开朗凌驾怪吝和愚钝时，每个人都能够在各种场合下作出这种努力来控制自己。当一个人敢于抒发他的真实感情，以此来反抗压迫与苟安，当他用自己对世界的独创见解来反对原有的陈腐概念，当他赞成真知灼见而反对含糊的和动摇不定的意见时，这正是他的“愉快”的因素和时刻。

达到这种状态的能力，绝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任其自然发展，假若运气好，那么，一个人也可能达到一种人生极乐状态，带来愉快甚至表现某些愉快的形式。即使不讲人们所知的“乐趣”的肤浅和空虚，就是“好”运气所依赖的沉着也只有靠劳动才能得到，这点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劳动意味着学习、训练、发现和运用天资与才能，使我们理解别人并与之交往，使我们能够找到不断遇到的有关生活、世界、精神与理智的变化之类问题的答案，以及保留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的问题的答案。因而，愉快的追求与教育的目的是紧密相连的，教育过程的各种不同阶段，

也就是通向愉快的途径。

换言之，愉快和教育都是建筑物，但与砖木结构不同，砖木相对说来是固定不变的，而愉快和教育这种建筑物是由肉体和精神构成的，这是生命的表现形式和工具，正和生命一样，是有韧性和可变化的。通过教育来建立一种愉快的生活，是无穷无尽的。它是一种长期的准备，象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和学者为我们所作出的榜样那样，只有通过人们所看到和评价的一系列的倒退与前进、成功与失败阶段，只有通过初步的胜利和最后胜利阶段，一个人的见识才能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此外，这种建筑物中的各个部分，都必须加以创造和构想。一种观点不会象一个物体那样存在，一种情感或一种关系也是如此。观点、情感或关系的确立，是打消疑虑而取得的成功，克服迟疑而取得的胜利，战胜蒙昧而夺取的成果，是毅力战胜软弱而获得的成就，否则，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只会象浮云一样消散。终身教育与人类本质和人类发展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是无可置疑的，它比起历史、社会学和经济的这一类使终身教育成为人类必需的原因，更具有说服力。这类状态绝不是象田园诗那般轻松美妙。它是一种可能发生悲剧的状况。只有当人们敢于使自己处于不断被挑战的地位，只有当人们适应变化、生离和死别，只有当人们在他的生命进程中一再下决心勇敢地面对不可避免做出自我牺牲的需要，人们才可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认识到什么是愉快。教育的目的是要教会人们彻底地承认冒险、变化和不安全，善于利用作为一切事物消灭者的时间。然而，家庭和教育的模式却导致不真实的、脆弱的和固定的愉快映象，而这种映象是建立在对安全抱着幻想的基础上的。

这个从事某种职业并有能力获得愉快的个人，不是我们这个原子结构(从双重意义上讲)似的社会中孤立的个人，而是和其他人相联系着的，是要与一个公平的社会的结构与力量打交道的。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上和千方百计阻止人

们思想感情的交流与彼此交往的社会中，建立起象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愉快”生活，是有许多困难和障碍的。因而人们说，全世界都在开展争取平等、自由和博爱而斗争的一个基本而正当理由就是：它们的目的是要开创某种政治的和法律的环境，使每个人都可以为他自己和别人从事这种作为愉快生活的本质与表现的教育事业，这种说法可能不算是危言耸听。

以改善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还与今天人们称之为生活质量的构成成分紧密相关。这确实是一种含糊的提法。又有什么东西不是生活质量的构成成分呢？什么东西能使生活过得高尚，充满魅力，值得热情与欢乐地去度过呢？反之，又是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例行公事和屈从于统治力量的可怕怪物呢？各种事物都可以起作用，我们呼吸的空气，不管是新鲜的，还是污浊的；我们饮用的水，不管是纯净的，还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周围的景色，不管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使人不快的，不管是一种引起人们苦恼的有敌意的环境，或者使人得到支持、鼓舞和爱护的友好的环境。工作条件、交通工具、住房是不是生活质量的构成成分呢？倘若我们坚持一种对生活质量的广义的和全面的观点，那么，它们当然就是。有些人则说不是，他们害怕这种看法会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不管富与贫，不管是黑人、黄种人和白人，都混杂在一起，都成为肉体和精神腐化的受害者。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特别是对政治上的和工会的活跃人物来说，只要它使人们忘记了地位与职位的区别并鼓励普通群众放弃为他们的阶级利益及他们的工资要求和机会均等而进行的斗争，那么，这种观点就既不灵验又很危险。

然而，我们确实必须正视环境、污染等问题，没有什么政治考虑可以把我们与这些问题分开。对这些作为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教育虽然不能起决定作用，但可以发挥一种重要作用。首先，教育在性质上可能是破坏性的。它可能是一种动乱的根源和

一种令人扫兴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深感不安宁，经常受着心理和情感上的创伤。他们并不努力与其他人在平等和交换的基础上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关系，他们的观点是悲观厌世的，而且把这种观点强加于周围的人们，把它当成进行精神折磨的手段；他们把自己在生活中的苦恼归咎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和睦的、专横的家庭和独裁的、扼杀人们创造力的学校，就是破坏性环境和有害事物的典型，需要来一番彻底改造。

另一方面，本书其它章节所论及的有关教育目的的一切，凡与个人和集体生活目的有关者，也适用于教育在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目的。在这里，仅举一事为例：消除噪音的斗争不仅仅是立法和行政命令的问题。要使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不在午夜吵醒五十万市民，就必须从小教育他尊重别人，使他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并且要遵守民主生活的原则和规定。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那些用自己半导体收音机的噪音和电视机的喧闹声吵扰别人的人；同时，还适用于那些被吵的人们，他们深受其害，迫切感到有必要去医治那些厌世病患者的创伤。患者的病根也是深受愚昧无知、缺乏德智体和美学教育之害。

不管教育在这方面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人们也还必须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吃的鱼是浸透水银的，如果空气中飘浮着放射性尘埃，如果河里没有任何生物，如果森林中树木被砍伐殆尽，这并不是因为环境污染者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的后果，或者甚至于也不是因为他们麻木不仁，而是因为经济利益法则或者强权政治的要求压倒了一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以和平与国际谅解为目的的教育

倘若和平是社会最大的好事，倘若人种的生存正受到冲突的威胁，而这冲突会使地球上整个整个的地区（如果不是整个地球）都不适于居住，那么，我们自然要问：教育的目的与使人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联系？这无疑是一个最难回

答的微妙问题。如果教育能够在缓和人们之间的紧张状态上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使人们都成为热爱和平的人，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教育的首要目的。

但是，这种主张恰恰与战争的理论相对立。战争真的象二次大战刚结束时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与哲学家所宣扬的那样，是产生在人们的头脑里吗？

事情看来并非如此简单。假如我们说“是产生在人们的头脑里”，那我们必须具体弄清到底是哪些人。当然不是在民族战争中战士们头脑里，他们对于他们所瞄准的人，往往素不相识，除了对那些被政治强制与集团热情的冲动所唆使的人们之外，对他们也并无恶感。如果风向一变，他们旗帜的颜色一改，那么，今天被人们当成敌人而仇恨和要消灭的人，明天就将被人们当成朋友和兄弟。如果教育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它如果不发动人民起来造反和反抗，那它就不能防止冲突。它所能起的作用，就是消除卑鄙的或轻浮的感情——要杀死或打伤一个人不是恨他，鄙视他或羞辱他的理由。

因而，正是在决策者这一级，内心的态度才是令人注意的。当一个内阁决定进行谈判和坚持谈判而不诉诸武力时，为什么它要这么办呢？主要考虑的问题无疑就是对立面的各种力量对比。我们的成功机会是什么？我们能够征召几个师？我们的弹药有多少？我们能不能依靠盟友？教育与进行这些论证是并行不悖的。它有助于各领导人作出正确和精确的计算而不至于在目的、手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自欺欺人。它还有助于激发各领导人的人类感情和人道主义考虑，而这种感情和考虑是这类人尚未完全丧失的。

这就促使我们考虑有关文明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只说这一基本方面，遵守国家法律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举例而言：众所周知，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君主之间的冲突是在反映启蒙主义的道德观那种遵守法律的气氛中展开的，它排除了要消灭敌人的这

种观点。而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民族和社会实体却热情地采纳了这种观点。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看，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退化，是向早年的野蛮和狂热的一种倒退。即使对其它方面还可抱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这也是一种倒退。

人们之间的冲突是用什么方式引起的，它们是如何发展的，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这些问题显然都取决于道德的一般水平，取决于思想和态度的性质。于是，教育便盛行起来。尽管教育的影响很大，但它是间接地这样做的。

在这种水平上，好战的情感来源于侵略性、对其他人的否定和缺乏想象力。教育中有助于人们友好相处，帮助人们成为他们宣称要成为的人、帮助人们协调他们个性中的多种不同方面、帮助人们适应于交换和参与，避免孤立与隔绝所造成的不愉快，所有这些都有一种息事宁人的功效。对别人怀有敌意、破坏的愿望和意图，都与受挫折、个人和社会的失败、怨恨和各种各样的自卑情绪紧紧相连的。随着民族感的加强，有自卑情绪这种心理上病态的人们，就找到一种轻易地提高其自尊心的机会。当他们能够得到同胞的支持，感到自己正确和比外国人优越的时候，就更加如此。

因而，向人们灌输和平精神就与教育的所有其它终极目标，不管是智力上的、情感上的和社会的，都紧密相关。如果不把这种精神贯彻到教育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那么它就如同无根之树，弱不禁风。然而，民主精神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有关人的态度绝非无足轻重，它不会不产生重要的影响。当政府必须与大多数成年公民或少数活跃人物打交道时，官员们不能象对付顺从的、闭塞的、被别人引上歧途而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们那样，轻易地使用为达到他们那种好战的目的所采用的手法。情况甚至会是这样：人民觉悟到政策的偏差和荒谬会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往往要以革命为代价赢得和平。

可以这样讲：假若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差异产生了紧张状态，而这种紧张状态本身又危及和平，那么，以发展为目标的教育活动还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这是不是说不应当把和平作为一种单独的科目来教给学生呢？根据我们上文讲过的关于和平精神的不可分性，应该在所有各个课目的内容里对侵略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原因开展谴责性斗争。有一种教授历史、地理和哲学的方法，会煽起敌对的情绪，因为它阻碍人们正确认识事物。如果我们不把外国人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或看作是敌人，而把他们看作是有其喜怒哀乐的人群，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有自决权的群众；如果我们能通过各种方式来了解人类共性的各种方面，那么就会激起我们热爱和平的愿望。这种观点一旦为人们所接受，追求真理和知识就与造福于全人类的一种文明的最明显、最实际的“利益”完全一致了。

内容和方法

直到最近，教育家们还只掌握了很有限的几种教学方法，例如：口头讲述、背诵、练习、上课，还有惩罚和奖励等有力的辅助手段。这些惯用的方法尽管有限但，到目前来讲，还是够用的，因为人们要达到的结果是传递其本身在性质上和组成上就是有限的知识，而且从来不必超越中小学或大学课程的界限。这些方法的基础是一整套假定和相当随便的选择，其中有一些经过深思熟虑，有一些则不然。第一个假定是语言和文字（特别是教师的语言和文字）无所不能，在铸造学童、学生或任何参加学习的人的思想并丰富其知识量方面更是无所不能。第二个假定是所有接受教育的人的智力都一样，推理能力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才能；有些人热心工作，而有些人则懒惰，或难于驾驭。

这种制度也是建立在承认失败的基础上的。如尽管教师做了努力并交替使用了惩罚与奖励，可是有些人还是落在后面，不想办法，或仅仅作出部分努力以吸收教师讲解的内容，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划入没有才能、懒惰或不勤奋的坏学生之列。

在我们这个时代，教育的这种概念，不论是从狭义上讲，还是从广义上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内容与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往往把重点放在内容上，而现在则逐步转向方法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正在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冲破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阻力与惰性。

就方法而言，革新的首要因素是教育界内部思想的进步。尽管教学上的习惯作法具有不可渗透性，几个世纪因袭下来；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知识的成就，不可能永远拒之门外。弗洛伊德、皮亚杰和他们的忠实门徒或不太忠实的门徒所进行的研究，杜威或罗杰斯以及他们在美国的追随者所从事的研究，巴甫洛夫学派所进行的研究，最终都对于教育所采用的方法和概念产生了影响。一个教育家只要不闭目塞听或顽固不化，他就再也不能无视人类的复杂性或与个性发展有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当中，有一些是知识方面的，但大部分因素的根源和基础则在生物学，情感和社会的本能上。性格、气质和职业的多样性都已充分地显露出来，这主要是由性格分析学各个学派研究所得出的成果。随着认识的加深，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动摇。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文明进步的作用，这种作用偶尔也还或多或少是自相矛盾的。在对待成年人的权利与个性方面，全世界都能看到一种倒退现象，但同时，儿童们却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对象了。正象文件、小说和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状况与一个世纪之前盛行的道德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孩子们被看作不能轻率对待的宝贝，必须避免给他们在心理上造成损伤。经济思想也不是与教育运动格格不入的。传统的制度适用于选拔天才学生，事实证明，这是对人的力量和精力的极大浪费。

至少在某些国家，校外教育的实际经验，特别是成人教育的经验，已经产生了新的观点和贯穿于整个教育之中的新关系。正是在这部分活动中，产生出和发展了小组学习的方法，小组长逐渐取代传统教师的地位。

最后，先是在大学，尔后在中学，已经出现了各种反抗运动，一般来讲在教育方法上出现了不同观点的挑战，这在打乱传统秩序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一种新的方法论的作法

在这些不同的影响和压力之下，一种新的教育方法论正在逐步发展起来。

从课程到学习环境：

这种新的教育理论的第一个原则是，在学习环境中重视教育的基础——小组或个人，年轻人或不太年轻的人。就中小学学生或大学生而言，课程往往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或不管怎么说都只具有相对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有别的需要传授的知识和需要掌握的技能。但是，教育的任何方面，不管是学习、练习或实践，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整个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人类变成了他本身的教育内容。这种内容、这种“原料”，通过教育而形成，通过教育而使人掌握和学会过去感到玄虚的技术和能力。

强调这点的结果就是：教育主要的动因不再是校长、教师和导师了，而是处于受教育过程之中的个人。正是这种个人获得发展，也正是这种个人改造自己，正是这种个人通过对自己来讲是独特的而不可由别人来替代的一种过程来发挥自己的潜力。

因而，自我教育是培训的主要目的。

自我教育经过了一段悲怆的历史。它所产生的悲痛多于欢乐，经历的失败多于成功。直到如今，接受自我教育的仍是那些打算获得知识与技能，但是未曾接受过只有特权阶层才可从中受益的正规教育的人。由于被剥夺了参考资料和传统的智力工具，他们就打破常规，去探索文学的、哲学的和科学领域的某些角落。比较有才能的人在他们的事业中取得了成功，甚至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发现，但这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人没有找到自己追求的东西，或者是因为他们走进了死胡同，或者是因为要求他们付出的努力的范围和强度使他们沮丧。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与这种自我

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现在我们讲的是用使人追求知识从而永远前进的原理和手段，无论教育过程是在中小学还是大学，把每个人都武装起来的问题。

动力和功能的性质：

根据前面的论述，在有关教育的著作和陈述中，常常提到的动力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在旧的教育制度下，内在动力并非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它仅存在于少数人之中，而这些人就是那些因为气质、遗传的原因或受到社会的与文化的压力，而自然地被迫作出那种努力的人们。而对多数人来讲，动力通常都是来自负责指挥行动的人们——教师。评分、奖励和惩罚、表扬和批评的制度，用来使学生保持努力而不发生动摇。只有靠这些传统的刺激，他们才最终在学习上奋斗到底，最后是考试说明他们是否有资格跨入成人世界。就主要方面来说，这是一种盲目的努力，重要意义并不明显。然而，受外部规律的支配和通过长期受支配的经验来学习自由与独立的价值，这难道不是童年时代的命运吗？情况既然如此，对于多数“学生”来讲，教育在过去一直就是表面的和不正常的——而且在传统模式不改变的地方，现在还仍然如此，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教育如果不能深入到人的心灵，那么它就是表面的，其余的全都被冷漠和对抗（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根据受教育者的气质而定）混杂在一起的作用所抵消。这就是造成大量文盲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厌恶读书，即使书本摆在眼前，也不愿意去读它。只要它使人们对于与一种文化教养上的努力相类似的某种事物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有时甚至是一种厌恶，那么这种教育就是不正常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化和学校这两个概念是连在一起的，两者同样令人厌恶。

所以教育和教学不能逃避支配人类活动的重要规律，那就是兴趣。如果学习使人有兴趣，就必须能满足某种欲望。如果学习

者乐于做出努力和拿出其全部力量，那么目的就必须是明确的，结果也必须是值得通过努力取得的。

在激发动力，或与之相反压制动力时，要涉及相当多的因素。个人化有其作用。使某个人感到高兴并吸引他的那些东西，不但不适用于另外一个人，反而会使另一个人感到厌恶。当然，个别教育的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分得过细，那么，教育就无从谈起了。然而，没有一位教育工作者可以忽视或无视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每个人的不同进度的重要性。两个最重要的时刻是在不同工作的开端和结尾。在开端，它是引起注意的阶段，为工作做准备；在结尾，则是清楚地看到要达到的目标，它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目的：消遣、游戏、财富、名声、对事业的忠诚、集体的建设等等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必须考虑以下两点：

(a)当实现教育过程的个人化时，决不能与集体目标发生矛盾。与此相反，倘若个别人的努力并不是由集体的或社会的所有人的努力所鼓动与支持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取得圆满成功。学习的最大动力保持在重大的社会变动时期，或者保持在一个阶级或全部人口共同前进的时期，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b)教育的功能为学习提供了最大的动力。教育在抽象的真空中是不能有效地起作用，以便追求对其本身的目标，而必须与对日常生活、职业生涯、政治、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产生强烈兴趣联系起来；这些情况已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被许多教育学家所注意，并且用理论的方式作了表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计划，给这一原则增添了新的光彩。正如大家所知，在对许多国家先前开展的试验加以分析批判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清楚地认识到：对群众进行扫盲训练的性质极为重要。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功能的因素是经济因素，它与生产的改善有密切联系。然而，它并不排除诸如国家建设之类足以加强和支持经济竞赛的其它因素。

小组学习：

旧制度完全建筑在竞争的基础上。从两个基本的原因看，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没有从个人与学习的实际关系中产生出真正深刻的动力，竞争就是保证把小组的成员联结在一起的便利的手段。而且，确实想表现才华出众，要成为最杰出的人物，要压倒其它人，这些都是每个人最强有力的本能。第二个原因是传统教育的本性所固有的，传统教育把重点放在选拔上，而不是放在训练上。一旦目标不再是选拔最优秀的人物，而是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机会，方法也就不能保持老一套了。现在重点是把每个人的才智、技能和知识都集中起来，以达到共同获得知识的目的。这正是鼓舞和支配从事小组学习的各项试验的精神。迄今为止，这种教育方法有机会应用于最广泛的场合，并且具有最大活力的领域便是校外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在其它地方，小组学习还只是采取零星分散和作为别的活动的一种陪衬的方式来进行的，竞争的传统还根深蒂固。但当成人教育对于照搬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的制度感到不满意，并且不再关心考试和奖励时，它就表现出对小组学习的一种偏爱。有组织、有控制的讨论，就是这种教育过程采用的自然方式。

也正是这种教育结构才会造就新型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被人们看作并且实际上也是组织者，他们鼓励并创造了有益于交流的条件，而严格说来，他们本人并不是以教师的身分出现的。

创造性和非指导性的方法：

这两个术语并不是同义词，但它们常常发生联系，因而，还是把它们同时加以论述为宜。

要研究创造性，还是从考虑人的地位与职业谈起。

人天生就是要遵守、服从和执行别人的指示，并且要走别人的老路吗？这么做能使他得到满足或完成他的使命吗？或者与此

相反，人生的成功是存在于坚持每个人的独特性上，存在于想象力的充分自由表现上吗？第一种情况是保险的；第二种情况则是要冒险的。一方面是要寻求保护，而另一方面则是承认并热爱冒险——各种各样的冒险，冒自欺和被欺之险，冒发现、被发现和尝试人生最大快乐——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征服者或人心征服者的快乐之险。对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来讲，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肯定地说，创造性的代价要高得多，因为为了坚持创造性，一个人必须施展出自己的全部能力和特性；然而保险的代价则是只要按规矩做就行了。

两种本能——寻求安全的本能和寻求冒险的本能，在大多数人身上共存，尽管根据气质、年龄、性别的不同，所占的比例有大有小。因而，鼓励这个或鼓励那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能够打破平衡而倒向冒险一边，为什么人们承认并乐于与它打交道，其原因就是他们认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对整个人类来讲，任何安全都是虚假的安全，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它是一种人造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脆弱的，它不断地受到人们的怀疑。任何安于某种类型安全的人，不管是由于金钱而得到安全还是由于地位而得到的安全，都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和不断的威胁之下。这类人的心理状态和按照这种模式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文明的状态，就是永远担忧和采取守势。在这个战争、革命和危机盛行、各种价值都在下跌的世界上，公认为一般规律的事物，往往被人们看作是真理。

传统教育的方法就是属于上述的第一种选择，即属于安全的一种选择。再者，这样的选择也符合家长的明显希望，以及各种各样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威所提出的期望。很顺利地建立起来的竞争性考试和奖励制度，使大家都根据各自的成绩和对于这种模式遵奉的程度，来取得他应得的报酬。把学问分成课程、计分、教师以权威的口吻讲课和传授已编排整理过的知识，都是保护一定秩序的手段，其基础是对等级的尊重，竞争中的获胜者心安理

得，而失败者则只好认输。

正是这种秩序受到了一些人的挑战，他们把创造性看成是教育过程的本质。确实，创造性的概念特别广泛，特别复杂，以至让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它，让每个人都对它的内容有同样的看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和正视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轻视消除某些幻想与混乱的必要性。创造性并不需要所有的个性都得以自由表现。对已选择过的模式加以模仿，这也是在创造与发现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否定训练的作用和不承认任何规则，也决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只有那些与创造相一致的训练和规则，才是各个人为本身的应用而确定下来的训练和规则。十分突出的是，今天通常进行的学校教育和一般的教育，都极大地扼杀和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处于先行者地位的罗杰斯和他的小组在美国正从事心理和教育的研究，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产生了一系列的训练方法，它们在概念上相似，而在使用上则各不相同。人们给它们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非指导性方法。它们的共性是，把教师的直接干预降到最低程度，但教师的作用并没有被取消。对于在小组成员之间建立联系方面，教师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能够使那种常常被例行的手续或清规戒律埋没在无意识之中的精神力量发挥出来。

恰当地评价这种训练的结果，还为时过早，它还处于试验阶段，几乎没有超出某些成人教育的范围。然而，事实证明，非指导性方法对某些正在试图认识和表现自己的人们来讲，是一种最鼓舞人心的答案。可以预见，这种研究所产生的精神和所采用的某些手段，将会传遍对智能和人格怀有敌意的整个教育界。

另外，我还要说，讲授科学对创造性也是有益的。它要求教师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提供资料和领着学生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把他们的智能引导到科学方法上去，也就是培养学生探索、调查和考证的精神，而绝不是想当然行事。

方法和手段

选择的标准：

前边各段描述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作为使各种现代教育制度得以不同程度实施的基础。手段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负责教育的人们所选定的基本政策和使用者们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但是，只有在可能进行选择时才有选择的余地，换言之，采用和推广专家们所认可的方法，即专家们对其功效和应用范围表示赞赏的方法，一般说可以具备充足的自然手段和资源，或者更具体地讲财政手段或财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选择的余地。

言语和形象：

关于教育方法，当前在人们脑海里占主要地位的是思考和感觉的两种主要工具——言语和形象之间关系的剧烈变化。言语可以用多种方式出现，或者在讲课中说出来，或者由电台广播，或者通过其它传播媒介，诸如电视。形象也是以多种不同方式出现，从标语广告到纪录影片皆是。

形象的作用是给人以信息或激励。但在教育上，早在十六世纪，在词语信息，特别是以书写文字为主要形式的信息出现并随后处于统治地位之后，形象的作用就退居到第二位了。“博学的人离不开书本(Doctus cum libro)”，成了关于知识的普遍公式。脑力劳动的基本技能，特别是修辞学和逻辑(logos：字词、道理)，都与恰当掌握言语和句法上的连接关系密切相关。人们认为寻求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确运用判断和推理，而判断与推理的建筑材料就是那些连贯地和系统地组合在一起的字词。中小学和大学教学几乎完全建立在这样的交流的基础之上。但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遇到了挑战。现代人往往从书本以外的途径取得他的大部分信息。有关物质和非物质世界的信息和资料，是以纷繁多样的方式，通过字词（以记

录下来的或没有记录下来的)，而且是越来越多地通过形象传播给人们。在现代生活方式影响所及的地方，形象表述已打入到每个人的小天地。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它取决于人们对于获得知识的条件、学习的性质和这个逻辑游戏的传统规则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看法。支持主张搞形象教育的人们认为，那种书卷气十足、一切向后看的文明所造成的危害很大，它墨守陈规、把死抠书本当成时髦；他们认为这样的交流工具才有优越性：它依赖直觉，其信息具有直接的意义，用不着象掌握书面信息那样需要长时间的准备阶段。

另一方面，有些人只相信书面的传播媒介。他们极不相信视觉信息，他们把它看作是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是在现代精神的各种表现当中他们谴责与反对的东西的工具，以及可以概括为思索能力减退的表现。形象是摆在眼前的，是对知觉的侵犯（不能说是激发情感的）。他们认为，人们是被标语广告、电视、电影和有插图的周刊所左右，而且在这些传播媒介对想象力所施加的极为强大的影响之下，由许多世纪以来的书面文化所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堡垒和防线正在土崩瓦解。

这两种论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看来，对于努力阐明世界上各种复杂的事物并从中找出一条路的人来讲，使用词语的、以书本为主的方法和使用形象化方法一样危险，这两者都会引起人们的幻觉，最好对之事先有所准备，这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如此，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症结之所在。与其使两者互相对立倒不如把这两大类传播媒介一起使用，看看它们给知识和教育提供什么办法，以及研究一下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它们（时间的选择、使用的条件等等），以便向人们提供他们所希望提供的服务。这样做是更公平和更有助益的。

在这方面，要考虑两点：

(a) 在多数情况下，在可能的场合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两

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这样做可以相互补充，弥补各自的缺点和不足：例如，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一位作家并鼓励人们阅读他的作品，或是一本介绍某一国家情况的书，书中插图与文字阐述同时使用(插图并不仅仅是文字阐述的形象说明)，插图表达了文字阐述所不能充分表现的内容；而且文字阐述则表达了插图所不能充分表现的内容。现代教育的先进形式，向人们提供了这种方式的令人瞩目的范例。

(b) 对任何传播媒介所作的批评，在它发展的后期都可能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电视的情况就是如此，过去由于它不能适应灵活的时间表而且其信息又不能重复，所以人们对它的批评是正确的。近年来，磁带录像技术的出现，就满足了时间灵活性和信息重复性这双重要求。

革新与传统：

某些教育界的人士认为，象教育其它方面的革新一样，教育方法上的革新本身也是好的，其论据是：需要新的手段来适应新的条件，传统的手段从其性质与范围上讲，对于必要的进展都是一种障碍，倘若教育所走的道路仍是多少世纪前一代一代专业教师所走过的老路的话，那么，教育的实质就绝不会受到触动。

当然，这种论据是颇有分量的，不容否认在作出革新的努力时，必须把实质与形式二者相互联系起来。然而，在现在，新生的事物既不当受到自动的承认，也不应当排斥使用现成的方法。唯一的准则是看手段能否适用于目的。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方法论，也就是总的精神和重点的安排。正是这个地方需要与合理化密切相联系的创造和想象。在许多情况下，所选择的手段或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某种倾向，只是通过使用它们的态度和方式，才能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和力量。

范围和深度：

只要教育仅仅是为了少数尖子人物，这些传播媒介的范围就不是一条特别重要的依据。一旦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世界广大民众都可以得到，传播媒介的严格的教育方面的价值与它的渗透力量之间的关系，就很有必要加以考虑。根据逻辑推理，从这种观点来看，一个立即就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广播节目，就要比一个小组讨论更为重要。从技术和经济上考虑都会有利于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教育节目。人们不能脱离其它因素，孤立地考虑范围和渗透力量的依据，其它的选择依据也同样如此。人们总是要回到基本的问题上来：就一般的或具体的方面来讲，教育的目标到底是谁呢？人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和结局呢？（例如，是迅速传播肤浅概念呢？还是彻底训练学习、思考以及判断的能力呢？）教育要沿着哪些阶段（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呢？其中各个阶段又要使用哪些传播媒介呢？

现有手段的分析：

必须根据上述的方法论并使用前文提到过的选择依据，对现有的手段进行检查分析。

若用教育这个词的真正广度与范围来理解教育，那么就十分明确：教育和训练各种年龄的人可以采用无数种方法，这些方法都不能加以严格的分类。此外，倘若职业教育家满脑袋都是要吸取生活的各种源泉和各种形式的经验的这样一种教育原则，倘若他能清楚地认识他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知道如何获得知识，以及人格是如何发展的，那么，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会利用各种机会和他可以得到的各种物质与技术手段。如果必要，他将创造新的手段或找到使用旧手段的新方法。

尽管形势易变，对教育来讲尤其如此，但是，根据教育机构和教育家积累的经验，已经产生了许多相当稳定和巩固的教育方

式，这些方式已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是不能忽视的。现在存在着大批的手段、技术、辅助手段和工具，如果人们能了解和使用得当，那么，它们就会向我们提供许多不可轻视的办法。

传统的方法：

课堂讲授：许多世纪以来，这一直是人们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教育方法。当然，终身教育的道路与它们大相径庭。但是，假如把它们使用在更广泛的范围、恰当的时间，并使之成为教育工作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讲课在教学中还是有其作用的。相隔相当一段时间，具体相隔多长时间，要根据不同的科目和学生的年龄而定，用开扩思路和激发学生对寻求更多知识的兴趣的系统讲解的方式，来描述一部分已经了解的事物或知识的某个特别的部分，这是有价值的。然而，在任何一组特定的中小學生或大学生中，这种智力的和艺术的活动都不应当是一个人所独占的领地，只有小组内的各个成员或迟或早都被吸收进来发表意见，它才能体现出教育的真正的重要意义。进一步讲，课堂讲授将不再是教育的核心，但将发挥一种间歇性的和辅助性的作用；由于在整个教育计划中居于合理的地位，因而，它们也将变得富有意义。

小组活动：交流的方法论原则在小组活动的形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过去三十年中，对于小组学习问题，包括小组的职能、日常活动、教育效果、不同的组织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十分明显，把一些单个的人组织在一起，不会象变魔术那样，使教育过程得以进行。事实上，人们已经发现，错误地组织起来和组织得不好的小组，可能产生有害的结果。障碍会出现，笨拙地或过早地使用某些小组技术会造成困难，对于特别敏感的人们来讲，甚至还可能是特别危险的，他们个性的平衡可能被打破，几乎会达到失去个性的地步。

这些弊端对于任何方法来讲都是固有的，了解这些弊端十分

重要。然而，经验已经表明，小组活动具有别种方法所不能替代的价值，特别在非正规教育上。在指导得法的小组活动中，个人提高了对自己、对组内其它人的个性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与其它人之间的关系。原来常见的竞争因素在小组中往往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往往让位于通过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来共同交流与共同提高的因素了。

为了使小组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极为重要的是不仅要使全体成员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而且要遵守若干规则。规则是在对成功与失败的观察与解释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形成出来的某种方法的实质，它们涉及到参加者的人数、房间的安排、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活动步骤，例如小组内各个成员的作用、小组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观察员的职能和作用（他们往往从小组成员中遴选后轮流担任）、各种讨论如何组织、如何开展、如何分段进行等。系统的研究揭示了这些不同的方面，这种研究的总名称叫小组动力学，它正在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地盘，并且在教育心理学的领域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小组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组成员必须学习的智力材料，以及更广泛地说文化材料。这就说明了小组负责人所作的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例如，提供有关学习科目的文件材料，就是他们的任务。同样，小组工作也与合理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有密切关系。

不管方法论的这个方面多么重要，但有一点还是要特别注意的。人们不能希望小组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小组去干。与小组学习并行的，还有自学，它同样是重要和必需的，这是因为个人就其生命的大部分来讲是独自一个和孤立的，因为练习判断之类智力活动的关键方面，只能在自己的头脑之中得到体验。

特殊情况：正规教育

当人们考虑教育活动加在各国财政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时，当人们考察在教育上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时，人们不禁要对教育进行研究，弄清它是否符合目的的要求，也就是说，它是否充分地所有的挑战作出反应。它的效率高不高？它的投资与效益的比率有多大？它是否帮助人们完成他们的人生使命？作为一种推动平等和民主的力量，它是成功的吗？这些都是我们在以下各段要考察的问题。

教育与实际工作

多数教师只是勉勉强强地承认，他们的活动与国家经济方面的需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说来，他们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作用：在一种对制度不重视、教育与生产和行政管理只存在纯粹偶然联系的抽象环境中，来教育和训练各个学生。为了达到这样的“功利主义”的目的，在高等教育水平上，就有了技术教育，当然还有对社会上专业人员（医生、工程师、律师和教师）的培训。实际上，经济界和教育界的联系不仅是密切的，而且是十分牢固的，它们互为因果：国家的经济活动向教育机构提供所需要的财源，首先是所需要的校舍资金和教师的薪金；回过头来，经济的健康和平衡的发展，又有赖于人口中不同人员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的种类。

在这方面，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a) 除了技术培训（与高等教育的某些部门）以外，未来的成年人并不是由于教育的培养，才能够应付他自己所处的实际环境的。这种实际环境在本质上讲就是他注定要成为一名工作者。

文化教养和实际工作被认为是彼此不相干的，好象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似的。在正规教育的那个世界与多数人日常生活的那个世界之间并没有连续性，这两者之间的沟通仅仅是偶然的和断断续续的。

(b) 即使教育确实以提供职业训练为目的，但教育大部分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许多地方，人们接受职业训练时，教育当局（在他们上面，则是财政当局）并没有弄清年轻人工作出路是什么。例如，在法国，大约在每一百名文科学生中，只有六名肯定在他成年时能找到对口的职业，例如当教师。在诸如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情况甚至更令人震惊。与此同时，工业界又缺乏所需要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印度，空有文凭而无处效力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有成千上万，不仅文科学生如此，理科和工科学生也不例外。除去人身的折磨和由此而引起的明显的心理痛苦与打击之外，这样的形势既不正常又危险：说不正常，是因为它意味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另外，这种状况对于社会的稳定也是危险的，因为受害者并不会逆来顺受地接受这种处境，而会试图用各种暴力手段来求得解决。

可能正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问题最为尖锐。其原因很简单：在多数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教育制度还是近年才诞生的，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还都是继承了原先统治这些地区的大国的那一套。教育制度与人民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距离，要比原先的殖民国家的更大。在原先的殖民国家，不管教育结构多么过时，它们至少是这些国家历史的产物。但在第三世界，就根本不是这种情况。因此，尽管取得了我们已在前边提到的引人注目的进步，但是，这些国家的中小学和大学仅仅成功地培养了很小一部分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人材，这一点是毫不令人吃惊的。典型的情况是：一方面缺乏管理人才，而另一方面毕业生中又有大批人失业。

现有结构不适用，在农业地区尤其突出，而这些国家人口中

的绝大部分还仍然生活在农村。偶尔也作出努力使教学大纲面向农业地区，但农村居民却常常发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与他们地区情况相隔甚远，而且也与他们社会的、文化教养的和心理的水平相距甚远，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都是与城市的环境有关的。在这里，教育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也被隔断了，其结果便是文化教养经验的枯竭和引诱受过教育的人离开农村。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学校教育的一个近期结果就是鼓励人们离开农村，使城市人口大大膨胀。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象许多国家的情况那样对发展是个障碍。总的来看，教育与实际工作和经济相脱离，也使成年人中的扫盲计划大部分落空。大体上说，意图是可嘉的：要满足人们受教育的愿望，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证实政府多么重视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等等。但是，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一阵热情过后，对读和写的兴趣也就消失了。单是“文化”方面的动机，并不能促使个人和小组承担一种持久的义务，对于他们来讲，生存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即使取得良好的结果，它们的基础也是不稳定、不可靠的。只要脱离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去开展扫盲工作，回到文盲状态就是一种普遍规律。

教育与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的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闲暇是某个社会阶级的特权，然而，今天它正在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工作人员享受较短的工作日和一周，以及数周或甚至数月的假期待遇。与决定闲暇时间如何使用的这些物质和经济因素一起，教育要发挥一种决定作用。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城乡居民由于所受教育而准备充分利用为他们提供的便利？经验表明并非如此，一般的人为要从事活动而接受的教育和训练是何等之不足！这一点，从他们与随时均可得到的消遣之间的关系上看，尤为明显。也可能缺乏某些社会和文化设

施，但是，某些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在工业化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有任其支配的相当丰富多彩的娱乐。例如，在法国、美国、苏联，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或一台以上收音机。抛掉成见，人们必须承认，在一周的时间当中，有许多时间可以收听收看高质量的节目，不是音乐、戏剧、故事，就是娱乐活动。电影的情况也是如此。许多电影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还代表了今天文明的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今天只需付出一盒香烟的代价，就可以得到世界文学经典著作。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对许多国家所进行的调查一定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考材料：好节目的听众或观众是不多的，即使有若干种频道，也自然是播放那些艺术上最平庸和最低劣的节目的频道才博得了最广大听众或观众的欢迎。主办节目的单位，假如希望继续在其广播中加上带有成人特点的节目以使整个播放内容活跃起来的话，那么，它们就需要有一点勇气才行。一旦他们这样做了，那才真是不顾一般的公众的口味，而一般公众是对陈腐的老套、庸俗的内容、以及对空虚作品有所偏爱的。

在这种情况下，责备主办节目的单位是不公平的，而更确切地说，真正的责任并不在这一级，而在教育水平，在一个人形成兴趣、习惯和文化修养的那个阶段。正是在五岁、十岁或十五岁时，人们就开始学会与人交往，掌握表达的技巧，发现绘画、诗歌和音乐所表达的美和力量，并经历悲喜处境。对于我们中间的天才人物和具有最大毅力的人来讲，良好的开端并不重要，即使有障碍，真知灼见表现出来的时刻也肯定会到来。但对多数人来讲，如果教育仅仅满足于模仿现存的模式，其目的不在保持和发展每个个人的创造本能和创造能力，那么他们的真实本性就会被过早地扼杀。

这些思想是由广播电视听众观众的表现引起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电影观众。他们在选择和赞赏最佳影片时，也同样地表现出

无能。

对于阅读要讲些什么呢？正是在这方面，学校教育所宣布的意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最大。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西欧国家所作的调查，已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根据经验所作出的推测：在这些国家里，阅读是少数人的活动，有一多半人家里连一本书都没进过门。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口头交往和文字交往的相对优点加以讨论，我们只希望说明，一个坐在学校课桌旁度过了宝贵的十年光阴的成年人，可能学会了拼写，可能学会了某些语法的基本规则，可能知道了三人挖两条沟要花多长时间，但是，他还没有得到学校应该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即阅读的兴趣和习惯。然而，对几乎所有严肃的和意义深远的学习和获得信息来讲，书却是关键：个人经验毕竟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那些不向书本请教的人，往往不能超出一孔之见，不能获得那种建立起知识的连贯体系的手段。也正是通过书本，人们才从庸庸碌碌（以及感情用事）的桎梏之中超脱出来，不受具体事件的约束，进入独立思考阶段，并产生文化方面的远见。

假若学校不能把人们提高到这个水平上，那么，在完成其最迫切的任务上，它就明显地失败了，因为学校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不管在工作和闲暇时间里都过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

教育和政治

政治在教育中并没有取得适当的位置，这也是实情。但不要误解：我指的并不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根据人们自己的兴趣和选择，是有它的时间和位置的；在这里我讲的是为政治而进行的教育。确实，某些国家开设公民课或公民权利与义务课，但却通常都是学校课程中最单调的部分，最没有说服力，学生对它的反映是极尽冷漠之能事。这种课程通常包含对国家政府机构的阐述和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一系列的讲解。事实上，多数学生直到成人时期还从未有人指导或鼓励他们去考虑他们社会与私人生活

中最重要的问题——和平、战争、正义、社会各阶级与阶级关系、工会主义、发展，以及更为重要的如国家性质、地位、职能和结构等。由于从事教育职业的大部分人都缺乏政治意识，因而整个教育都变得软弱无力。几乎所有负责教育儿童的人们，都把政治看作是一种低贱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文化和个性的发展之间，仅仅存在着不密切的、非直接的联系。他们的观点是：一旦他们设置了公民教育课程，使“恺撒的东西归恺撒”（此语引自《圣经》——译者注），那么，他们就可以自由地专心致力于他们自己的领地——智育。

对公民的全面教育，不但是通过正规教育，而且也通过其它途径来达到，这是千真万确的。正是通过努力挣钱养家糊口、争取言论自由、争取自己的权利、反对非正义、以及通过广泛参加政治活动和紧密团结一致，个人才发展了他的政治品格，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成人。然而，即使是在政治活动领域里最有决断力和最有能力的人当中，也还常常缺点什么：对政权性质、它的组成成分以及通过体制结构和人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等等，缺乏一种公正、充分和长期的思考。

如果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们为其一生的工作做准备，并教会他们解释和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结构，以便使他们不会盲人骑瞎马般地走过难以理解的人生历程。如果充分重视防止人的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发生那种不良的、不应有的相互脱节，那么，教学工作就会有新的含义。重点一定要放在为民主而教育人这点上。他们必须要为选择、职责、信息和参与生活作好准备。正象前面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目标与文化的总目标的联系是何等紧密！判断的能力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使自己随时了解新情况并保持警惕的能力也是如此。

所有各种水平的教育计划和方法的原动力都应该是对于唤醒

政治意识和发展民主个人的美德的关注^{【注】}。这一关注应当在教育的内容上加以反映。讲授文学、历史和地理的目的，不是仅仅用事实和评价塞满学生的头脑，而是向学生表明人类的精神是沿着什么道路发展演变的，以便使他们冷静克制，并认识到什么是自由。再也没有更好、更迷人的故事，能如此清晰地展示出文化历程的真正意义。没有什么学科是与这种类型的教学水火不相容的。肯定地说，科学教育的作用，是培养人们研究、调查、讨论、客观评价、承担风险和从事智力冒险活动的智能——简言之，使人们获得一系列的态度和能力，而这些是所有现代民主的坚实基础，离开它们，公民则一事无成。从文化和跨学科的角度来看，缺乏这样的政治训练是一种最突出的缺陷，正是产生最有害后果的问题之一。它构成了发展成人个性的主要障碍。

构成个性的诸方面

在多数教育系统中，成功或失败的模式，是在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发展演变的某一特定时期建立起来的。对欧洲(和与其相似的)教育系统来讲，这个时期就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全盛期，即十七和十八世纪。在那些年代，在影响和声誉上都占支配地位的行业是使用语言的行业：牧师、文人、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上流社会人士、律师和地方官员。其结果是教育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灌输优美语言的规则和使用能力上。灵活而熟练的记忆，装满了与过去有关的事物；天赋的头脑、精通文学创造的巧妙语言——这些就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以中小学和大学作为产物和表现的社会是靠教养和礼仪以及任何教育所办不到的一切而兴旺发达起来。学校与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在当时是得到保证的。从那时起，社会进化了，条件、态度和风俗习惯也变化了，但是学

【注】构成古代城邦的各个公民道德基础的公民美德，已逐步贬值并让位给一种对存在的神学和道德概念所规定的美德。

校却还依然故我。

当有必要向一般民众提供教育机会的时候，初等教育模仿贵族教育。但这些都是降格的模式，它们都缺乏产生原来那种教育的精神。因而，这种教育的价值与目的根本反映不出劳动阶级中的最有生气和最自觉的分子的形象，于是，他们就到别处去寻找，这是并不令人奇怪的。

当前，教育所强调的总方针和学校活动方式与人民实际需要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大了。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不再是社会本来面目的表现了，它们也不再是适于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的个性发展的手段了。

成功的模式不再是适当的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假如它们对什么事物是适合的话，那么它们就适合于复制出负责搬用这些模式的那类人，即教师。对多数人来讲，生活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使用言词的工作已变成例外而不是一种通例了。现在多数人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客观世界的各种结构建立起联系。构成个性的新的各个方面，在解释人类的状况和建设未来方面，开始发挥作用：工作的范围(和它的必然结果——闲暇)、我们在前面已论述过的政治方面、还有情感、艺术和体质方面。

正象教育划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一种人为的、有害的差别一样，它还造成了头脑与身体之间、情感与社会的内容之间危险的隔绝。它的目标在于造就抽象的个人。

某些哲学家对于教育与现实脱离这个十分突出特点津津乐道，他们把超脱看作是一种优点，甚至把它看作是基本教育的主要优点。他们把它当作在所有人中间产生平等的一种手段，因而，就把它当作是民主的来源。无疑，某些平等是由于使用这些手段而产生的，简化到抽象存在方式的平等就属此种情况。然而，人们不难看到，在我们眼下这种制度中，是有许多不平等因素的，因为有强、有弱，在班级中有优等生也有劣等生。鼓吹者们求助于一种使人消除疑虑的观念形态，这就是荣誉思想，而这

种思想更加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人感到安慰，教会那些接受能力差、成绩不好的学生听天由命，而使那些在竞争中拔尖的学生心安理得。

在这种所谓的秩序之下，受益者是自然、社会与文化条件对他们十分有利的那些学生。这是在鼓励一种不公正现象。

因而，这种制度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首先，它有意无意地忽视人的复杂性和性格、气质、志向以及职业的多样性。这是一种反对人性的粗暴行为，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人一生当中处于无防备状态又不能提出反对的时期之中，这一事实就使得问题更为严重，更不能饶恕。



着眼于企业管理的 学校教育 with 终身教育

在维持和保证社会运转的机构当中，最难以改变的当属学校。军队正在寻求新的道路，国防上的准备，现在并不在营房中进行，而是在试验室内、在科研人员的头脑中和在工厂中进行。在所有国家中，农业，尽管仍然是人类各种行业中最古老的形式，但也正在出现新面貌，经历着深刻的结构变革。但是，学校和整个教育，除极少数明显的例外，却还是在继续奉行我们过去若干世纪以来祖先们所确定的路线。

中小学，还有大部分大学的作法，好象我们仍旧生活在驿车和沙龙的时代、家长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的时代和妇女被关在家里的时代。对于学校生活来讲，还从未存在过资本主义的结构，工作还从未成为文化教养的主要特点；书本和教师的话，即使不是学问传播的唯一手段，也还是主要的手段。

这种对变革的对抗并不特别令人奇怪。首先，因为教育不可忽视的功能之一就是传授知识。教育的任务就是保持当代人与前辈人的联系，不管革新和紧跟世界的发展步伐的需要多么迫切，而要切断与过去、与远古的联系，那就是犯了错误。我们今天的一切，正是祖宗万代劳动和努力、斗争和征服的结果。无视于此，就根本不能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无视于此，就是给对我们时代的征服加上了脆弱性；无视于此，就是使我们自己丧失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使命的一个基本方面；无视于此，就是放弃了快乐的不竭之源。

因而，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那些把教育及作为其工具的文化当作保护被他们称之为文化遗产的手段的人们为什么持这种态度。但是，他们正犯着一个根本性错误。他们忘记了这种过去的经验和这种传统已失去了价值和生命力，除了可以构成彻底献身于安排现代人命运的活着的人的部分经验之外，它们甚至已不复存在了。不论是什么样的过去，它的主要特点都是它本身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别人也不能使它起死回生，甚至已被人们遗忘。

传统的教育是当局手中的有力工具。当局所要求的是容易管教的顺民，这些民众要驯服地、毫不怀疑地接受别人分派给他们的地位和任务，无论是生产者、公民，或者是社会各种结构中的成员；当局所需要的是那种只让别人去考虑并为他们作出决定的庸人，当领导人、指导者或圣贤叫他们干什么或不要干什么、叫他们讲话或保密、叫他们爱或恨、叫他们去接受或拒绝时，他们只能唯唯诺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靠别人指示活着的。这样的人，使用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陈腐答案，并乐于屈从于各种各样的强制力量——时尚、舆论、广告、集体的感情和热忱的强制力量。只要教育是在对人的民主概念产生以前时期的遗产，它的目的和活动就是继续使人保持在人为延长的幼稚状态之中，阻止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成年人。教育负责传递思想意识、观点理论与态度，在世界的现实与真理精神之间建立了一道由偏见、清规戒律和现成观念构成的屏障。

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造就这种类型的人——自己没有任何见解，其观点、兴趣和决定都由外界强加，那么，就没有理由对现状做任何实质的改革。传统教育是有某种完美之处而且也是绝对合乎逻辑的，在对大部分负责教育的人所持态度加以解释时，没有必要怀有恶意：他们维护一种对他们有利的制度，他们要表达在这种制度下使他们自己得以产生的那些人和世界的理想，这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是特别真诚的，例如，当他们相信荣誉观念的

时候，因为他们看不到击败了比较迟钝的同学的那些聪明学生所得到的所谓荣誉，实际上是掩盖了诸如出身与金钱这类特权的冠冕堂皇而又明目张胆的不公平现象。

但这种制度，尽管其种类如此完备，尽管它用既得利益和偏见对自己保护得如此牢固，但是，它也开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于现存的步骤是否得当提出尖锐的质疑，这已不是新鲜事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之中，各种主要的思想学派，从卢梭时代到存在主义时代，其中包括黑格尔、尼采、当代的皮亚杰，都提出过改革的建议，他们都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过异议。但是，只是在过去几年，这种对教育制度的反对才扩展到学术著作和专家的书斋之外。今天，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街道上和在大学里，在青年人的头脑里和心目中，他们为数即使不够百万千万也有成千上万，他们的反抗代表了他们这般年龄所特有的天真无邪与聪明智慧的那种结合。他们有时被指责是思想混乱。人们在谈到他们时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要推翻什么东西是易如反掌的，但应该懂得在那个地方该建立什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关切，在许多情况下表达了他们的不幸。他们所反抗的这种制度，是建筑在非正义的基础上的。在这种制度下，缺乏对人的尊重，天才被非人道的社会所利用，有力量的和幸运的人得意、软弱的人倒霉。某些可疑分子乘机表现他们的破坏性和虚无主义的精神，并不能成为对这种改革要求继续充耳不闻的口实。

这场从本质上讲是革命的和自发的运动，恰恰与许多学科上的一大批专家的见解和结论一致，这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家，他们谴责那种把精力集中在教学大纲上，而对胡乱选择来的学生采取漠不关心态度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危害；社会学家，他们对教育结构的陈旧和倒退进行了揭露；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花费在教育上的资金是得不偿失的，认为人力被浪费掉了；还有哲学家，他们的观点是，现在这种方式的教育，在使人脱离他们的真正

的天职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认为人的真正天职是承认人的价值、充实地度过人的一生，并通过贯穿人终身的教育过程来揭示人的真正本质。

第一批问题与进行教育的年龄有关。从传统上讲，人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准备阶段，它比较短，因为它与人的幼年期和青春期恰恰吻合；另一个是实际活动阶段，它比前一个阶段要长得多，因为它要延续到人的生命终结之日。这两个阶段用考试和对幸运者发放毕业文凭等与原始社会的典礼相类似的一系列仪式划分。这样的划分，尽管其本身是人为的，但在社会稳定的时期，就是说当社会还被一种农民型的文明所支配的时期，还是可以保持的。直至最近，人在结束其一生时所处的世界的形象和特点与他在出生时的世界，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多数人在他年轻时就能获得使他平安地度过一生所需要的知识和自我表达的能力。生活和学校这两个世界的连续性是有保证的。教育里缺乏的东西，社会可以提供：传统、风俗习惯、前辈的教训和榜样、周围的人的见解和压力。人们按部就班地依次经历各个阶段，走过自己的生命之路，在继承了前人的衣钵、扮演了成人时代的所有标准角色之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但是，现在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一个人从睡摇篮到进入坟墓，其间经历着一种全新的文明。我们的生活，在物质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这一代与下一代之间，而且有时是逐年不同。现代国家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国家了。整个地区的人口都正在离开那里而流入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人口的膨胀。继工业发展和收入增加之后出现了以青年人为原动力的消费社会。没有必要强调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道德和礼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你们都亲自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些变化。但是，还有其它更严重更有决定意义的情况。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人口中的各个阶层，在文化方面和精神方面都生活在一整套的信仰和信念所作出的坚

定的、稳定的和明确的解释之上的。应当承认，这些信仰和信念仍然存在，它们根深蒂固。但是，现在与仅仅二十年前相比，形势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啊！对于人们从中得到支持与鼓舞的每个主要的信仰来讲，今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和不同的思想流派。让自己一步一步地得到一位无可争议和无人匹敌的权威教师的指教，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每个人现在都被迫作出选择，因而，这种选择对我们所有人的经历是十分重要的。看来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被迫取得独立的，被迫成为自由人的。即使是在距离这种风暴式和火山喷发式的威胁最远的科学部门——数学，我们现在也亲眼看到它已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剧烈变化。能够对这一现象做出更有学问的说明的数学教师，会证明我们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至于物理、化学以及它们在工业、农业和医学上的应用，也同样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之中，经常不断地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变化加快了。对无数专业产生影响，使我们必须不断地增加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才行。

在这种条件下，就再也不能提文化上的和知识上的什么资历了。在人一生中的任何阶段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迅速地变得过时，失去了它的价值。今天，希望赶上时代的步伐、赶上形势发展的任何人都要不断地接受人们所熟悉的“知识更新”教育，不论是普通教育、专业教育或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必须“更新”。

这就说明成人教育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由于人们在幼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不再能够使他们过着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了，因而，成年人也不得不抽出时间和花费精力继续接受训练、进行学习、取得新的技能。人们会说，这很难做到。成年人没有多少时间，他们很劳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各式各样的烦恼事情和所承担的义务上了。毋庸置疑，这些异议有某些道理，但是，经常作为理由而被人们提出的经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事实上，我们社会中成年人的空闲时间，比他们所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请想一想人们耗费在咖啡馆、看

电视、阅读无聊的杂志上的时间有多少啊！据说是精疲力竭的成年人，只要他们感兴趣或愿意的话，实际上是能够作出巨大努力的。

然而，在我们时代，还有另一个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闲暇时间的增加。在世世代代作为少数人的特权之后，现在闲暇已成为亿万劳动者都可得到的了，这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天地。人们公认，不久的将来，我们社会的成员将把比他们从事工作要多得多的时间，用于休息和娱乐。这便提出了他们要用闲暇时间干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其答案就有一部分在教育上。第一点是必须要有为了闲暇而进行的教育，这就是说，人们必须作好准备并接受训练，以便有价值地使用这种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二点是在闲暇时间必须向人们提供教育，这就是说，人们空闲的夜晚、周末还有几周或数月的假期中的一大部分时间，能够而且应当用于智力活动，用在学习和研究上，用在可以引起他们的求知欲和使他们从事各种艺术活动上。这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确保使闲暇变成一种宝贵财富，而不至于变成厌烦和与世疏远的根源的唯一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处于什么地位？它要发挥什么作用呢？我向你们当中为人师表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会同意这种意见，即教育的作用，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下降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却又提高了。倘若教育要延伸到人的整个一生，那么，学校教育，与整个教育过程相比，将只占一个较短的时期。从教育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讲，它占用的是人的成年时期，这时，人在自我教育中，既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又扮演受教育者的角色。学校教育将成为充分的完整的教育过程中相当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序曲。

但是，与此同时，赋予学校教育的使命也大大增加了，因为，它将要针对着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把精力只集中在知识的传播上。

在这个关键处，你们很可能要问我对教育是怎么认识的。我马上就可以作出言简意赅的回答：教育就是利用人在其形形色色的全部经验中表现出来的智能来发展人。这个定义可能还不完整，但是，鉴于所涉及因素的复杂性，我怀疑能否找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定义。无论如何，这个公式考虑到以下几点。

重点是放在人上。真正的教育过程，不是集中在随意确定为教育内容的知识体系上，而是集中在人的需要、他的愿望、和他与由客观物体和人构成的世界之间所保持的活的关系上。教育包含可以向人们提供知识的、美学的、精神的营养，并成为他生命组成部分的一切内容。反过来说，任何教育的内容，不管它的重要性和价值有多大，倘若它是外向的，倘若它并不适用于受教育者的能力和反应，那么，从教育上讲，都是毫无意义的。因而，生活及其需要、条件、节奏和表现方式，应被看作是我们教育事业上的最高指针。

重点还放在发展上。因为我们谈到的人并不是某一天或某一时刻的那个人，而是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之中的那个人。他在其生命过程的每个时刻，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用自己的成绩，用成功和失败的判断、交替和同化，来说明他的行为，说明他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他来讲，真理并不是一种现成的事实，而是他必须要奋斗争取的。正如我们从许多艺术家工作的实例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果在开始时他并未脱离创造性的源泉的话，经历了许多困难阶段之后，正是在道路的终点而不是起点，才进入了创造的繁荣时期。

把重点放在人上，还意味着把重点放在差异的重要性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即使他和别人是相似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创性、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恰恰是通过他的特殊性，假如特殊性受到重视的话，他才能具有成年人的普遍性，才能与其它人建立起真正友爱的关系。

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绝没有仅此一种的教

育，而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教育过程。使各级教育个性化，不论是对成人的教育也好，还是对年轻人和儿童的教育也罢，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教育要适合人的需要，它就必须适合作为整体的人类的需要——其中当然包括智力方面，但其它方面尽管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却也是同样重要的。情感和智力一样，可以训练，而且，这也同样必要。与别人交流的能力和愿望，也必须给以重视。这些是社交能力的主要基础。使各种艺术天性，不管是在音乐上的，还是在形象艺术上的，都以各种形式得以发挥，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对情感、社交和艺术的无知，必然给人的平衡造成威胁，说到底也是对社会平衡的威胁，其严重性丝毫不亚于人们了解得更清楚和更容易识别的其它类型的无知。使认识能力片面发展，从而牺牲理解现实和控制个性的应变能力的其它模式，结果会造成心理上反常的人，这种人不能轻松自在、胜任愉快而体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讲到人的身体时，问题就更突出了。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到今天，人的身体也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在教育过程中首先被遗忘的事情。“了解你的身体”，这是许多自称唯灵论者出版物的标题。今天，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了解自己的身体，以便去掌握它、发挥它的表现力以及和别人联系的力量、并控制它的越轨行为。体质的下降，难道不随之而出现智力上的和情感上的衰退吗？这里，平衡是关键字眼，要当心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使各个方面互相支持。

任何名副其实的教育能不考虑这些要求吗？现在，你们了解了这种形势。教育结构和传统课程与方法的专横，使教育带上多少局限性和压制因素呢？学校教育的目的应当加以彻底的重新审查，以便考虑个性的所有方面和性格、气质、志向以及天生的爱好上的差异，难道不应该如此吗？在现在这种严厉的制度之下，只有那些通过其气质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而能够符合流行模式的

人，才能从中受益。而其它人则或是勉强够格，或是用梦想来逃避现实，要不然就甘居“坏学生”的舒适、保险、而最终则是一败涂地的地位。

我们不用课程这个词，这个词总是使人联想到某些严厉的和固定不变的事物，还是让我们讲内容和发展趋势吧。正如前文所述，这需要对各种要求作一番分析。但是，要求必然随各人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有人还可能会提出：应该经常设法保持社会的要求与个人的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这常常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这种二重性——人的发展和生活这两方面的互为补充关系，具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意义。很清楚，只要哪里有人在学习、在获取知识、在训练自己、在塑造自己的个性，哪里就有教育，因而，教育是在许多不同的形势和条件下进行的。换言之，教育发生和继续于工作之中、夫妻的生活之中、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之中。（顺便说一下，假若家长真有象孩子要向他们学习的那么多东西要向孩子学习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双向过程。）情况一直就是如此，但是，现在它成为一件紧迫的、常常又具有决定意义的现实。这一点在各种公民的、政治性或工会的义务承担上是屡见不鲜的。做一个成年人而不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国家生活，是不大可能的。这些情况当然都是矛盾而模棱两可的，这也无须赘言。它们既可以形成性格，又可以改变性格。因而，习惯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基础是在人生的最初几年奠定的。你们可以想象，这绝不是企图缩小学校作用的重要意义，而是想阐明人们在家庭里所接受的教育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方法这个大问题，它是我们议题的中心，因为它涉及到人。方法是技能、习惯、反应能力和组织。每个名副其实的教师的奋斗目标，就是使学生发展并牢固地养成学习及推论的能力，以及对智力工作、练习和训练的兴趣，离开了这些，就不会有真正的教育。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实际上也有责任问一问：我们一直在教育一代又一代学生时所采用的这些方法、这些传统的技巧和从过去沿袭下来的种种办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目的呢？我们还能继续使用迫使每代人中间都有一大批人对于教育制度丧失信心的方式吗？他们已丧失信心到永远也不想参加任何类型的教育的程度了。我们还能按照旧的办法来维护其公开和隐蔽的淘汰率比其它任何行业都高的这种教育制度吗？谁又会同意这种意见，工程师建造的桥梁刚刚通车，两座之中就有一座，或是三座之中有两座便倒塌了？认为人不见得比石头和动物更应受尊重的论点，这在我们的心目中并不是令人极度反感的。因为，我们对此已司空见惯了。战争、革命、对劳动者的剥削，都证明了这一点。教育是又一个例子，尽管它更难以捉摸、伪装得更巧妙些。引起我们对此反感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改变这种形势，割除耗费社会这么多资财、毁坏这么多人的前途的痼疽，已成为当务之急。

只要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帮助人去生活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新方法的规则：

- 强调学生，而不是课程。这是前文所讲过的前提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 把教育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看作是知识的传授。
- 把在个人之间人为地分成等级的数量上的评价，换成对儿童作为个人所作的质量上的评价。
- 把竞争减少到最低限度，用一种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其才能、运用其切身经验、并通过好奇心和疑问对于共同探讨知识作出贡献的小组学习制度来取而代之。
- 把孩子当成带有他们那个年龄阶段的特殊问题的孩子对待，而不能把他们当成小大人来对待。一个孩子在童年、一个青少年在青春期，生活得越充实越和谐，他们就为长大成人准备得越充分。否则，他总要怀着对被损害的童年的遗憾和留

恋的心情回首往事。

- 尽可能少作鉴定，因为鉴定会使一种实体停止前进并使其误入歧途。
- 尽可能广泛地把教育与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要为工作阶段的生活和为闲暇时间作好准备。在我看来，在学校使用收音机、电视和电影，正和教给孩子们如何理解高乃依的悲剧作品一样重要。
- 孩子们应当在早期就学会选择和辨别好的、有用的东西和坏的、有害的东西。正是通过认识的实践，而不是通过训诫或布道，他们才能学会如何做到举止得当。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信息。今天的孩子们就是明天的公民。他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接受训练，以便从被传授的知识中和从所得到的口头与文字材料中汲取建立在批判性判断和科学方法基础上的真正的信息。

这些仅是教育以及生活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几个实例。每个人自己都能找到更多的实例。

对于所有的教师来讲，获得心理学、性格分析学和集体与环境社会学基本原理的知识的时机已经来到。这些广泛而充实的知识有助于了解他们负责照管的每个学生。教育工作者再也不应该是多少有些天才的知识传授者，而是培养个性的专家。正因为如此，他需要知识，而且需要实践经验和技巧。对象医生这样的人体方面的技术专家有这样的要求，难道我们能对一位在人的智力、情感和精神方面的专家降低要求吗？

尽管前面所阐述的各种看法适用于形势的一般情况，但是，很显然，它们首先最适用于企业界。

传统教育训练未来成年人所用的方法，就好象人的活动主要是由修辞学组成的。因为如前所述，在十七、十八世纪中等教育结构刚刚建立的时候，在权力和声誉上都很突出的职业，是那些与掌握言词有关的专业，即律师、牧师、文人、军人和政治家。其

它职业都是被人看不上眼的，带有经验性与随来随干的性质。然而，世界已经变化了。社会的职能分工和等级制度已经改变，而中小学和大学的精神实质，虽在细微之处作过一些必要的改进，但基本上还依然如故。

现代社会各行业所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人，因而，也就需要一种新型的教育。今天，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训练，以应付现代世界实际的、具体的任务，其中，首先和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和技术的任务。这就必然要对各级教育的目的、课程和方法加以根本的和彻底的改革。

头等重要的是使文化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倘若真正的文化确实反映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特征，以使自然具有人所希望的外观和特点的努力，那么很明显，从事生产的人就是按照自然规律而参加改造自然活动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这一点恰恰为我们学校的所有教师们所遗忘，并且还在继续忽视。他们把人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与精神的崇高、愉快和自由有关，专门用在文学、艺术和理论科学上。根据他们的思维方式，这是生活的文化部分。另一部分则集中在谋生的需要上，文化被抛弃，个性萎缩。他们说，这是所有各种各样劳动者的命运。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因为，人的个性根本就没有这种分界。至于说到文化教养，也同样是极为荒谬的，因为它包含着人生的所有方面，而首先是专业活动。现在该是教育家们了解现代社会的这些基本事实的时候了，这使人正确认识个人和社会个性的结构和发展。

其次，现代教育的基本任务将是使人们为变化作好准备。探险、冒险、研究、试验和改革的精神，是科学和历史发展的核心，因此必须使它们深深地渗透到教育系统的结构和课程之中去。无论如何，教育不再是传授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用适当的手段来训练每个人，使他能从事于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才是那种脚踏实地、在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概念上都是现实主义的人，这种人才能够保证我们社会的工业、商业、行

政管理的结构得以正常运转。

这正是终身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人。倘若他从幼年起就接受了适当的训练，那么，他就永远也不会停止学习，停止研究，从而停止自我教育。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达到了他可以止步不前的知识顶峰或尽善尽美的程度，而是永远孜孜不倦地用事实和变化中的情况来检验他的知识；同时，在建设更加和谐、更加公平、不会浪费人类资源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这也意味着，企业管理不能把自己本身当成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其它方面无关的一种目标。企业管理的目的必须与社会的总目标一致起来，并且要考虑今天世界上人们的基本愿望。

那些负责企业管理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即使他们有更大的权力，负有更大的责任，但他们也是和其他人一样的公民。全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和共同的命运的事一旦被人们所领会，并且在实践中反映出来，那么，企业管理就能产生出深远的意义，那就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为一种抽象的和贫乏的虚妄目标服务。

石头和人

人体并不单单是由骨头和肉组成的，它还是由石头组成的。因为，正是在房屋、街道和城镇的石头里，我们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生活着，繁衍发展。我们在其中发挥作用，并且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人类从他借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中得到了大部分概念和感情以至理解力。

在现代化的住宅区或公寓大楼里度过一生，或在都市郊区度过幼年与青年时期的普通人，能在生活和行为方面得到什么教训呢？所得教训是由于没有社交，与别人不来往，结果与世隔绝，不信任和受到限制。个人的自我变成了特殊的占有，它的钥匙和秘密都藏起来不让外界知道。这是门、插销、栏杆和看家犬的语言，也就是“深居简出”、“与邻人老死不相往来”。

这就是现代社会里许多人的生活情况。他们住在监狱里——由他们的房间、他们的公寓、他们的交通工具、他们的办公室或工厂和分配给他们的那一小部分任务所构成的监狱，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并且须臾不可离开的个人意识的监狱。

难道一个孩子接受知识和度过他大部分青年时期的地方本身，不就是一种监狱吗？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由，他要完成别人强加给他的任务，他必须服从一位其职业就是一直不断地对他进行评价的权力极大的教师的决定。此外，学校的建筑，除少数例外，不论其内部还是其外观，都是模仿监禁成年人的建筑，即监狱或兵营。

这种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中小学教师给我们讲述一般常识。通过它们，尽管被歪曲和很难认

出其原来的模样，我们却得到了许多诗人的信息，了解到许多小说和传奇文学的创作者、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探索者。讲授的都是有关友谊和兄弟之情的课程。学校校长的话虚构了一幅人类团结统一的图景。牧师们也谈到我们的共同命运。他们讲到爱与和解。但是，一离开教堂，他所讲的这位“友邻”却原来是我们乘地铁时身边的一位乘客，他的气味和外观都是我们所难以忍受的。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生活的物质结构的改造会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能设想只要生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依然如故，我们就会有阳光灿烂的城市和房屋。语言之间的冲突，反映着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冲突。在我们城镇和住宅建筑中间可以看到的混乱，反映着文明的混乱。正是由于轻视人的因素，才发生对劳动力使用和住房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倘若我们希望解决建设上的混乱，不管这种混乱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就必须朝着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秩序和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向努力。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现象，想象着有一个由死去的灵魂所建立、所生活、所激励的和谐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乌托邦罢了。

难道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改造地球面貌的伟大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可能干出和敢于干出些什么事吗？这是某些人的想法，人们能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见解。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尽管文明是不可分的，尽管世间的事物和超越市俗的事物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各种因素却并非齐头并进。

某些国家已进行了经济革命，但还保持着传统的政权和权力结构。即使是在已建立社会主义和已消灭阶级制度的国家，在创造与新的意识形态相称的生活物质结构方面，也还缺乏想象力。在不同的工业社会，不管其社会是红色的、粉红色的还是近似于白色的，工人的日常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唯一而又十分重要的例外是社会的闲暇时间结构的发展。在苏联和在一般说来学

习或努力学习苏联的国家，都有大批的图书馆、体育场、少先队俱乐部和文化中心。

除非人类具有和解态度，愿意相互交往，并且充满了人性，否则物质环境是决不可能有人道主义的特性的，而且这样的情况决不可能象变魔术似地一蹴而成——这种认识使人逐步摆脱了走极端的想法。只有通过大量的逐步变化才能达到双重目的：第一是为特定问题提供特定的解决办法；第二是与其他方面协作，为重大的全面改革作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为重大的决定性变化铺平道路。每项革新，不论是在艺术、音乐、道德和风俗习惯以及在男人和女人的地位上的改变，都具有双重意义，教育也不例外。

现在越来越明显，教育再也不能走旧传统所开辟的老路了。现行的制度和习惯作法，把对人的教育限制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使我们祖先的目标和方法永远一成不变，而不考虑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方式或人性的多样化，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无效的和不公平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和见解，以及最敏感的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也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必须把教育看作是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与人的发展各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坚持这种立场的意义是无限深远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加以审查和思考：教育结构、课程的内容、作用与地位、初等教育的目的、在各个年龄段（童年、青春期、成人期和老年期）各种教育类型之间的关系及相互联系、教师的招聘、作用及培训等等。

然而，投身终身教育领域中的革新事业的人都充分认识到，在生活的体制、法律、经济、物质各个范畴中存在着障碍和矛盾。倘若人们都生活在一个高墙与栅栏所构成的世界之中，那么，教会他们去交际或与别人彼此友好相处，又有什么用处呢？倘若人们既没有能与别人见面的地方，又没有种种体现富有诗意天性的设备，那么，教会他们通过戏剧、歌唱、绘画或体育来表现他们自己或向自己和向别人显示身分，又有什么用处呢？

因而，教育工作者在寻求新的教育方式中孤军作战，这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他们从一开始就与那些负责建设城镇和房屋的人们——政治的和行政的管理机构、城镇规划人员、建筑师、建筑工人等，建立起一种有力的充满生气的联盟，他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相反，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于这些与建筑有关的人们来讲，与所有那些能够把个人、小组和社会需要（持续的或我们时代独特的）告诉给他们的那些人建立起合作关系，并不断地为他们所用，岂不是特别重要吗？这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开化世界奋斗目标的不可分割性。

与作者的谈话

问：在终身教育政策的短期目标中，你建议采取措施建立成人教育结构。为什么你要优先考虑成年人呢？

答：因为成人教育在整个终身教育体制中是“火车头”。

有许多情况可以对此加以解释。首先，我们可以指出这样的事实：理性和常识并没有通过它们自己的是非曲直而取得任何进展。例如，历史表明使工人、妇女和青年的地位得到所需的改善的，并非理性，而是与此有关的那些人们不能容忍现状的情绪和反抗行动。上学的孩子可能感到不自在，甚至感到不愉快。他可以通过捣乱的方式来表现他的不自在，但他没有条件造反，因为他还没有成年人关于独立的经验。孩子们自己并不去想教育应当如何改进。做这件事的是成年人。因而，看来成人教育是促成整个过程趋于成熟的决定性因素。

另一个情况是，现代教育理论强调独立观念，强调教育学生自己靠自己。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新的，但它却为解决当代问题提出了某种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就是个人和社会都不得安宁的思想意识冲突。现在，要能独立，就要是成年人才行。教育的真正对象也是成年人。教育的对话也只能从基于生活经验（例如专业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生活经验）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来开始。另一方面，学生是由别人把教育加在他们头上的，⁵至少在我们现在这种教育并不对任何疑问都作出回答的制度之下，是如此。

至于国家对教育投资的开支，成人教育是收回部分这类非生产性投资的一种办法。只要选择制度仍然摒弃某些可能受教育的人，那么，在他们成人后加以挽救，这就补偿了在他们上学时国

家在他们身上花费教育资金的总量。

最后，一般说来，教育与它所发挥的传递社会价值的作用，离得越来越远了。作为一种生产手段，人的才能（或者说，教育的一般水平）发挥着与任何类型的资本同样重要的作用。这正是成人教育发挥它的最重要作用的机会。另一个情况是，它要比学校教育更快地产生效益，因为它把某一地区或区域的最积极和最知上进的人们，可能训练成为发展的动力。

问：你说终身教育能够帮助补救现代社会最急迫的一种形势——由于世代隔阂出现的形势。终生教育在这方面如何发挥作用呢？

答：很明显，并不是说目前青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关系危机的所有问题，都能用教育的手段来解决。例如，学生们对制度的不满，就是主要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前途丧失信心。它是一个投资问题、也是劳动力组织的问题，说到底，则是个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问题。事实上，这等于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但是，它们也并不是与教育不相干，因为，必须先建立起全人类的概念，并且进行结构改革，使文化生活的较高形态成为可能，也容易达到。

终身教育精神如能在成人中加以传播，这些关系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和新的姿态获得发展。

没有人会否认由成年人向青少年传播知识和经验的必要性。人们不可能把各代人所创造的一切都重新再发明一遍，但是，要使这种知识和经验继续传递下去，就必须有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因而，如果成年人使用的言词是采取一个人在和别人的关系中，处在父亲、教师、官员宣扬真理的那种优越地位，以独裁专断的方式加以传达的话，那别人就接受不了。然而，如果长辈（不管是谁）能与青年人平等相处，如果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要与青年人共同追求知识，那么，就可能进行交往。采用科学方法和认真直率地承认评价与意见的相对性，就能使不同年龄的人们和好共处和进行真正的交往。此外，我对青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适用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如男人与女人、不同种族的人、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各类人间的交往。至于谈到青年人，他们可能要考虑他们情况的相对性。青年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当然应该充分和毫无保留地享受，但是这一特殊时期的正式名称是成年期，而且成为名副其实的成年人是一种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拿出他们所有的热情和决心来奋斗一场是值得的。

问：你把终身教育当作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对此你作何解释呢？

答：那是因为它是实现平等的手段。因为要求平等的愿望是多数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本性。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每个人都要承受全人类的负担。当他发现自己由于地位上的原因而被贬低、受轻视和受羞辱时，整个人类都会遭到由于他而引起的损伤，就会加以反抗并要求恢复他的尊严。当然，这是在要求正义，然而，为实现平等而奋斗的结果远不止于此。它的目的最起码是要创造或再创造若干条件，这样我们就是“伙伴”或变成“伙伴”。我认为这里没有必要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通过它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各种矛盾的影响，它已大大促成了这种人类“伙伴关系”的丧失殆尽。我们彼此都已变成了敌人。由于受到人与人之间，不同集团、宗派和阶级之间竞争法则的支配，人就不再承认自己与他的伙伴有共同的命运了。

现代人试图用各种方式恢复这种被毁坏了的伙伴关系，各种方式大体上是相互补充的。通过改善劳动组织、提高生产力、合理的规划和技术革新，工业社会正在稳步地增加财源，使有特权者与非特权者生活条件上的差距缩小。因贫困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数，年年都在下降。

社会要求的各个方面的有益作用(从平等、实际正义和重新创造承认我们的“伙伴”的条件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劳动阶级对一种较好的生活具有强烈的愿望，对消灭资本主义的有害影响怀有本能的或自觉的决心，他们正在为人类的整体利益而奋斗

管。

但是在生产和分配水平上的这种行动，不管它多么必要和带有多大的文化价值，都使人抱有一种幻想——即相信它将满足重整人类秩序的需要。事实上，它仅是解决问题的两个关键之一。第二个关键是教育。教育应该在现代社会发挥过去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作用。看来，迄今为止，教育还一直存在于史前状态，只有到了今天，它才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因为人通过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注定要变成他自己教育的优先对象，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使教育强加在自己头上。当然，在过去，教育已经发挥了很有力的平衡器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教育不仅教授基本原理，而且还向人们灌输共同遵守的准则以及国家社会所依据的神话。

然而，它同样有力地破坏了确认“伙伴”关系的条件。它已经使我们之间的差别制度化。它把竞争变成支配人们之间关系的法则。按照学校的制度，每个学生都被安放在梯子的某一个特定的梯级上，要比某一些学生高，而又比另一些学生低。在学校里（不算天然的雷同所起的规范和矫正作用），每个人都已经在朝着一种敌视的状态前进。

用于教学和形成智能的模式强制化，更加深了这种敌视态度。这些从过去多年继承下来的模式，是特别令人难以忍受的。首先，它们已经有许多世纪的历史了，它们的正确性却从未受到过人们的怀疑。第二，它们是建立在人的本性被缩小的基础上，它们所谓的人的本性只包括人的知识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认识的）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或和谐的组成成分）。那些由于性格或天然的兴趣适应这些模式的人们，并没有从中吃到特别大的苦头。他们在经过同意的课程、方法及附设部门中，似乎看到了他们自己个性的一种反映。由于这种适应给了他们在学术竞争上的一种自然的优势，因而，作为一种惯例，这些人就通过淘汰和竞争作用而变成制度的主人和发号施令的人。而其它人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构成自己的特性和表现自己的，他们就被归入另册。这就

导致不平衡、紧张状态和失败。这正是毫无疑问地增加我们社会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在荣誉这种冠冕堂皇的伪装下，这种做法的后果就尤其严重。

另一方面，在终身教育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种类的适合各人个性、独创性和职业的教育和训练。

这里，我们再回到我们在开始时讲到的问题上来。在贫穷不再是难以忍受的、生活的物质条件正在变得一致起来的现代社会里，终身教育可以被看作是实现真正平等的手段。

随着终身教育概念逐步扎下根来，对结构和机构发生影响，人与人之间人为的差别终将消灭，从而让位于真正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把一个人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特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逻辑，有他自己清楚无误的创造性，有他自己所从事的独特的职业。当一个人不再把另一个人的成功当成是对自己成功的障碍时，那么，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也将排除。通过终身教育，人的天生的进取精神将会找到它的正常的用武之地。这种教育的目的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消灭他的“竞争者”，而是要继续进行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身上和自己展开的斗争。终身教育鼓励人们投身于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来反对偏见、陈旧观念、陈规陋习和使本身不断定形的趋向。在这方面，终身教育与生活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它遵循生活的节奏，注重生活的教训，并开辟人生的道路。

当一个人把自己从虚伪的竞争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才依靠重新找到的伙伴，这个伙伴与他有相同问题、承认与他有共同人性、与他具有同样生活目的。这里，真正的平等、人在地位上具体的平等才与真正的自由，或更确切地说，与解放的过程完全一致起来，因此，假若当他看到真理时并不怕正视它的话，假若他能从与伙伴的交流和联合中汲取必要的力量的话，他就能终生认识自己。

问：你不认为终身教育是发展中国家负担不起的一种奢侈品吗？

答：我们经常在第三世界听到这种说法。那些国家的教育负责人都认识到教育加在国民经济上的负担是越来越重了。在许多国家，开支已达到极限，若再超过，财政平衡就不可能保持，经济就不可能维持正常运转。当我们与他们谈到终身教育时，他们脸上立即出现担心增加开支的愁云。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对终身教育不热心。

这种恐惧初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对它进一步加以考查，就会发现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争论焦点是什么呢？不必节外生枝，我们只是要在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些教育负责人承认他们的中小学和大学并没有满足他们人民今天的实际需要。在许多国家和许多方面，现在这些形式的教育是发展的一个障碍。倘若终身教育明确表示并反映出一种愿望，使教育适应于形势和物力财力状况，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任何使他们恐惧的理由；反之，他们应当从这个概念上得到启发，并优先应用于实践之中。对于这类社会来讲，避免由传统制度所引起的灾难性的浪费，难道还不至为重要吗？这些国家不胜负担的奢侈品，其实只是给一小部分人口的训练和教育投资，而结果培养出来的却是虽然受过教育但却仍然愚昧无知或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问：这么说，你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成年人再回到学校里去吗？

答：根本不是。这正是人们的误会和曲解。现在连儿童是否应该上这种形式的学校还肯定不了。但是，我们必须找出适合当地条件的新途径，以便保证不间断地传授基本概念，并使人取得技艺与技能。因而，终身教育意味着：坚持不懈努力造成团结的局面，调动可以得到的资源与人力，以及开辟教育思想的新路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终身教育引论

作者= (美) 郎格郎著；周南照，陈树清译

页数=145

SS号=10836475

出版日期=1985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SSLIB-JPG=http://image1.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b60
&pid=56F0E57F2263490E866E99FE6B0FD42EC3A0D79E967D6DF0D52
3F3BE99D06B9B95E26D72993992501CBF25BE6DAEA0E11E8DE168A1A5F
5EEDF9B28C1027685ECD6BB3433720B37F7CBF98CBE0CC092DA678FB0
130BD8FD87152DA31058D2C6437CD996C3E5B559B3EB8310E431FD5C83
2&jid= /